

# 中日关系:2018——回归常轨 蹀躞前行

胡令远 等

## 弁 言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在相继推出《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趋势——多层面和中长期战略的视角》(2014年)、《中日关系:2015》、《中日关系:2016——低位徘徊与嬗变》、《中日关系 2017:战略对峙中的转机》四本年度报告书之后,《中日关系 2018:回归常轨 蹀躞前行》今天又面世了。

2014、2015 两年的中日关系战略报告书,课题组成员清一色为复旦大学学者,主要是出于时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的林尚立教授立志于打造国际关系研究之“复旦学派”的宏愿。但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在军事、商贸等实践性很强的领域,如有国家军事研究机构和商务部专家加盟的话,则对日本安全保障方面的军事态势、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变化,可以考察和认识得更加真切和清晰。所以,自 2016 年起,特别邀请了中国军事科学院江新凤研究员、商务部宋志勇研究员加盟课题组;另外,要深入了解日本社会的变化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也需要近距离感知与分析,复旦大学校友、旅日资深学者汪鸿祥教授加入课题组,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2017 年新加入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团队的王广涛青年副研究员,为课题组注入了新鲜血液。今年,我们又特别邀请复旦大学校友,上海外国语大学武心波教授加盟,便于从国际体系的变化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的高度,强化对中日关系的考察分析。

东京大学川岛真教授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和热情参与这一工作,做出了独特贡献。庆应大学加茂具树教授、早稻田大学青山瑠妙教授皆在中日关系研究领域卓有建树,他们的加盟使报告书增色良多。

这五年的中日关系报告书中,都包含有一个重要观点:即直面日益崛起的近邻中国,虽然日本在经贸领域总体上视之为使自身走出经济低迷期的战略机遇,但在安全保障、特别是作为海洋国家的海上通道安全方面,却产生了严重的战略性疑虑和担忧;而中国宣示和践行的和平发展理念,对日本来说,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印证。从近年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实态来看,这一战略疑虑,正逐步衍化成在战略上与中国相拮抗的日本的国策。如何化解日本战略疑虑、防止其最终成为“自我实现”的目标。就需要中日两国共同探求新的历史条件下两国新的战略平衡点何在?两国根本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何在?在持续深入的交流和共同探索过程中,不断积累共识,冀以趋利避害,平稳度过战略失衡期,谋求新的历史条件下中日关系的长足发展。

基于此,2016 年的报告书提出以机制化的智库交流为探索和积累这种共识的主要平台

之一，并具体阐述了其成立的理由。我们殷切希望和期待中日两国学者共同参与撰写这一《中日关系战略报告书》——能成为一种因缘，在此基础上，构建与打造上述平台。

2017年的中日关系，出乎人们的意料，战略对峙中出现了转机。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的回暖与转圜，是不可逆的根本性质，还是一时的战略需求所致？人们依然疑虑重重。李克强总理在2018年3月份举行的中国“两会”期间，一方面表示将于5月访问日本，同时也以中日关系“乍暖还寒”表达了他的担心。本报告书，对前述人们的疑虑，做出了分析与解读，在总结和评估2017年中日关系的基础上，对2018年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的面世是必要和适时的。

2017年度的报告书依然采取了请日本学者对中国学者所撰写的内容做评论的方式。其间，两国学者“不谋而合”、“所见略同”的共识，与2016年度一样，可以说所在多有；同时，不少地方意见相左也是自然的，甚至一些歧见比较大而尖锐。其间，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从认识论上，基于民族立场的单向性思维很难全面客观把握认识对象，作为学者需要换位思考，才能深刻把握认识对象的本质。第二，中日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是复杂的，如何把握其中的主要因素至关重要，所谓纲举目张。第三，日本是一个多元社会，不能一概而论或以偏概全；中国不再是过去的中国，从理念到实践，需要对中国有全新的认识。

2018年，对中日关系来说是一个重要年份，关键词是两国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其标志，是时隔多年李克强总理与安倍首相正式访日访华，并为习近平主席2019年正式访问日本创造了条件。中日关系的转寰改善，或意味着日本精英阶层对华认知发生了正面变化，如此则其意义非常重大。中国的崛起，改变着地区和世界格局，如果日本能从正面的积极意义认识与对应，无疑是中日关系从根本上得以改善的认识与理念前提。2018年，中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对中日关系的改善意味着什么？中日关系能否行稳致远？报告书都进行了详细考察与分析，在此基础上，做出了评估及预测。

与前面4本报告书一样，中日两国学者对2018年中日关系的总体评估，意见并不一致；对于转寰改善的原因，亦有不同解读。在安保、海洋等问题上观点相左之处也所在多有。虽然热衷于“美国第一”和单边主义的特朗普政权加大了中日关系的不确定性，但中日两国学者都认为保持良好的中日关系，符合彼此的根本利益。

“兼听则明”——善于倾听对方的意见，本就是中国的古训。正是在仁智之见的碰撞和辨析中，中日关系的症结与出路才能真正明晰，良方才能从中获取——这从两国学者对中日关系如何建设性发展的具体建言献策中，可以得到印证。

复旦大学年度中日关系报告书，由林尚立副校长的初心初志，在尝试中不断前行，积累经验，不断成熟。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吴心伯院长一直致力于推动和指导本课题组的工作，期待在学校和研究院领导、各位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使这一工作能够日臻成熟，达成预期目标，为中日关系的真正转寰和长足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中日关系年度报告书今年是第5本，计划结集出版。其间既可展现中日两国学者对中日关系发展之认识的轨迹，也可窥探之所以形成此种认识的底奥所在。

## 总 论

### 一、2018 年的中日关系：回归常轨——求新求变

#### (一) 迎来冷战后第二次重大调整期

2018 年,中日关系迎来冷战后的第二个重大调整期。

冷战结束, 恰值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和“55 年政治体制”解体, 日本陷入“失去的十年”乃至二十年, 国家一片迷茫; 与此同时, 中国的发展进入快车道。一方是江河日下, 一方是一日千里, 巨大的落差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使战后以来相对平稳的中日关系, 面临历史性挑战。遗憾的是, 小泉纯一郎政权选择的是联美制华的基本方略。其 5 年任期内 6 次参拜靖国神社, 即为明显的表征。这是战后的中日关系史上所没有的现象, 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冷战后的第一个重大调整期。其间待到 2010 年中国的 GDP 超越日本并迅速拉大距离, 随着综合国力的消长, 在非老牌保守政党自民党执政时期, 发生了以“购岛闹剧”为标志的中日间领土与海洋权益矛盾激化、连带国民感情急转直下、两国关系陷入战后以来最低谷的状况。安倍首相 2012 年梅开二度重新执政后, 通过“俯瞰地球仪外交”、解禁集体自卫权等, 进一步力图全面制衡中国。尤其是以其保守的政治理念推行所谓“价值观外交”, 使两国在政治、安保领域关系紧张加剧的同时, 在意识形态、价值理念等形而上领域, 也使两国处于裂痕加深的境地。

然而事有固理, 物极必反。自 2017 年始, 安倍首相通过各种方式, 明显开始调整中日关系。本来对日本一直奉行睦邻友好理念与政策的中国, 对此也积极予以回应。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2018 年 5 月李克强总理利用赴日出席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议之机, 作为中国总理时隔 8 年正式访问日本, 取得了包括加强两国政府及民间各层级联系、进一步扩大经贸关系、启动中日海空紧急联络机制一系列成果; 李总理还远赴北海道访问, 希望进一步推动两国地方间的合作。在此基础上, 去年 10 月, 安倍首相正式访问中国。两国正式确认: 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 安倍首相强调: 日中关系已从竞争走向协调。标志着中日关系在冷战后迎来了第二次重大调整期。

#### (二) 2018 年安倍首相正式访华成果评估

首先, 通过这次访问, 双方在增强政治互信方面取得了诸多共识, 主要表现在: 1、再次确认四个政治文件作为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作用, 特别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地位。2、特别重申和强调了“互为合作伙伴, 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这一共识对当下的中日关系而言, 不仅具有“形而下”即现实层面的重要价值, 也具有“形而上”的观念性意义。也即, “互不构成威胁”, 实际上首先是一个观念性问题。一方面虽然“国强必霸”并不适用于秉持和平发展理念的中国, 但“中国威胁论”在日本依然有较大市场; 另一方面, 中国对日本近年强化与美国军事同盟关系的种种举措, 毋庸讳言也充满疑虑。因此, 强调“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 不言而喻是增强政治互信的前提。“互为合作伙伴”, 狭义上主要指经贸领域彼此合作、力避恶性竞争, 广义上应指在所有可以合作的领域彼此都应视对方为伙伴。这一政治共识, 无疑是增强两国政治互信的抓手与平台。3、安倍首相借此次正式访华之机, 以强调“将日中关系由竞争转向协调并推向新时代”的方式, 正式表示将前此制衡中国的战略转向与中国进行协调的国策的意愿。果真如此, 则为中日之间重建政治互信, 提供了基础性前提。4、就敏感领域如何建构政治互信, 达成重要共识并有相应举措。如就旨在避免日本自卫

队与中国军队偶发性冲突的相互通报机制“海空联络机制”尽快开通热线达成一致。双方还签署了《海上搜寻救助合作协定》(SAR)等。

第二,在经贸合作的重要理念、新合作平台的打造等方面,取得重要共识和重大成果。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在与安倍首相的会谈中,双方表明,在当前国际情势下,作为世界第二、第三经济体,中日两国有责任也有义务共同坚持自由贸易原则,反对单边主义。同时确认了在进一步强化传统的经贸合作领域之外,同时以“第三方市场合作”为新平台和试验田。在访问期间举办的“第一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吸引了 500 多位日本企业界代表和中方代表 1000 余人,共签署了多达 52 项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金额超过 180 亿美元,同时还签署了十余项政府间合作协议。为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需求,双方还共同确认和强调了进一步推动旨在便利开展高科技领域合作的“创新对话机制”,使其成为未来两国合作提质升级的重要平台。此外,双方还签订了升级版的货币互换协议,规模为 2000 亿元人民币(约 300 亿美元),为 2002 年版的 10 倍,这也是日本迄今为止与外国签订的同一性质协议中的最大一笔。

第三,官民并举,深化交流,改善国民感情。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只有有了坚实的民意基础,中日关系才能真正健康发展,行稳致远。特别是在信息时代,双方国民对两国关系的参与度非常高、非常深入。习主席在同安倍首相的会谈中强调指出,“要开展更加广泛的人文交流,增进相互理解,鼓励两国各界特别是年轻一代踊跃投身中日友好事业”。安倍首相在“第一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的致辞中,特别强调了两国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意在说明中日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文化基因。两国政府共同决定明年为“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安倍首相还特地赶赴北京大学进行交流。这次访问,必将成为促进和深化两国交流的助推剂。

这次访问的主要意义在于:它表明中日关系回到邦交正常化以后,特别是世纪之交以来的“常轨”,也就是“经常性的状态”。本报告之所以使用“常轨”而不是“正轨”,是因为“正轨”通常指的是“正确的状态”、甚至是“满意的状态”,而中日双方无论是政府、国民、舆论实际上都不认为中日关系已经处于这样的状态,并且都在试图对中日关系进行新的建构。

但是,这次访问的成果是有限的。首先,双方处理中日关系的立场和做法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就安倍政权而言:第一,在影响首相访华的两大直接因素方面,并没有做出新的让步。2013 年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导致中方中断双方高层交往的直接原因。在中方的强烈抗议下,安倍没有继续亲自去参拜,而是改用了私费供奉名为“真榊”的祭品这一替代性做法。此次,在临近访华之际的 10 月 17 日,安倍首相还特意再次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真榊”祭品。第二,在围堵中国的问题上,尽管近年来日方改变了策略,从原来可以用其“俯瞰地球仪外交”一语来形容的全球范围内的对抗,转而更加注重在中国周边以及印太地区构筑围堵机制,降低了音量,但是其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并没有变化。第三,日方领导人关于上述背景下处理中日两国领导层交往的基本主张也没有发生变化。10 月 25 日,安倍首相在登机前往中国访问时发了一条推特,内容是:“羽田机场碧空千里,这是时隔七年对中国的访问。虽然两国之间存在着种种问题,但是正因为如此两国首脑更应该敞开心扉,坦率地讲出心声。我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将日中关系推向新的阶段。”这段话既是对日本国内说的,也是对中国说的。在这段推特中,安倍首相重申了其一贯立场:不应该因为日方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对中国的崛起提出质疑、进行围堵而中断两国首脑之间互访。日方有关首相互访问题的上述基本立场,实际上在小泉纯一郎担任首相期间就已确立。

第四,日方在中日海洋与岛礁权益争端方面的立场也没有改变,当然,就日方来看,迄今为止,这一问题并没有成为妨碍两国高层互访的实质性因素。

就中方而言:第一,中方关于海洋权益争端的主张和做法没有改变。当然日方从未因此而拒绝与中方首脑进行交往。第二,中方关于两国首脑互访需要有“合适的氛围”的主张没有改变。就中方在这方面对安倍政权的态度而言,这一条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历史认识问题,二是在全球范围内公开诋毁中国的问题。如前所述,2013年以后,安倍首相没有直接参拜,2015年之后,安倍首相没有在重大时间点和重要场合公开发表将侵略者奉为国家英雄的言论,可以说基本上满足了最低限度的要求。在围堵中国方面,2016、2017年以后,安倍政权更加注重跨国围堵机制的建设,降低了公开喊话的调门,虽然此举甚至不能说是最低限度地满足了中方的要求,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变化。中方显然注意到了日方的这一变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这一变化。

### (三)中日关系重大调整的原因、直面的课题及其前景

首先,从中日双方的主观因素来看,尽管双方国家领导人的互访长期停滞,但是两国领导人发展双边关系的意愿从未消失。中方搁置领导人互访的根本原因在于要求安倍政权遵守维护和发展双边国家关系创造必要的基础性条件,在此过程中,中方并没有改变对中日关系重要性的认识以及维护和发展中日关系的决心和目标。即使在中日关系最困难的时候,在日本领导人诋毁中国国家形象之时,中国依然没有将日本排除在“周边外交基本方针”适用对象之外。<sup>①</sup>就日本来看,邦交正常化以来,其一直视中国为最重要的市场和外交的主要方向。日本虽然将中国的崛起视为自身的威胁,并采取一系列对抗和遏制举措,但是其态度有时是矛盾和踌躇的;长期中断两国高层之间的来往并未成为日本的选项,因为无论在外交还是在内政领域,日本统治集团从不认为这样做是符合自身利益的。

其次,制衡的无效性与代价之间的巨大落差是客观要素。自小泉时代特别是安倍执政的前5年,事实证明日本联美制华的基本方略了无成效,徒然失败,并为此付出惨痛代价。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际威望日升,GDP已经是日本的2.5倍。安倍首相上台之初,以东南亚国家为重点,在围堵中国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但中菲关系的快速改善对安倍政权的南海战略形成重创,中越经济关系紧密,政治关系难以出现破局,缅甸也没有成为其围堵中国的战略支点。在印太地区,日、美、印、澳等国军事联系的加强虽然对于日本而言,虽然具有长期的战略意义,但却不足以在短期内对中国的崛起形成有效遏制;而一味地强化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的話,不仅未必能够得到相关国家的支持,而且会损害日本在其他方面的利益。

第三,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使日美畸形关系的固有矛盾深化与激化。即美国在双边贸易协定方面,一味按照自己的偏好打压日本,损害了日本的现实利益;同时更为严重的是因为日本作为资源匮乏的岛国,贸易立国一直以来关乎日本的生存之道,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理念与举措,从根本上损害了日本战略利益乃至带来生存危机感,这是日本难以接受的。与此同时,也使日本对日美军事同盟架构中,一方面美国不断加大对日本的要价,另一方面对现在这样一个美国的可靠性未免不产生疑虑。针对发生重大变化的美国,改变对其过于倚重的一边倒政策与其及时调整对华关系,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第四,长期与近邻大国中国处于持续紧张状态,对于任何一个日本的政治家来说,都不谄无法承受之重。战后初期的吉田茂另当别论,安倍的叔祖佐藤荣作长期执政而一贯敌视新中国。但1972年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对于长期阻碍这一进程的佐藤来说,则以凄惨的境况

结束其政治生涯,并成为其人生的败笔。前述小泉纯一郎 6 次参拜靖国神社,对中日关系造成巨大冲击,连当时几乎所有的“首相经历者”,都共同联名指责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截至去年,安倍已经执政 5 年有余,其对华战略事实上的失败,使其在国内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适时进行调整,不过验证了东亚地缘政治的一个典型命题而已。

在以上背景下进行的这次调整,是低层次的,即所谓从低谷“回归正常轨道”而已。中日之间包括历史问题等在内的旧有的结构性矛盾并没有真正解决,而更直面的课题与挑战,则在于海洋问题,特别是海上通道问题这一新的结构性矛盾。所以我们看到,安倍政府近年处心积虑解禁集体自卫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热衷 2+2 模式;同时连年增加军费、解禁武器出口三原则、购买新锐武器、搞变形航母等等,其目的不外为将来在不依靠美国的前提下,为实现近海与远洋的军事目标进行法律与军事力量的准备。而中国出于自身发展的自然需要,近年海上军事力量有所拓展。地缘政治中的系统效应,使两国由此形成一种“安全困境”。未来中日关系能否顺利发展,不言而喻,这是一个棘手的、难以回避的重大要素。

因此,要使中日关系行稳致远,首先必须要高屋建瓴,将中日关系的定位置于新时代的背景下进行擘画。安倍首相 2018 年的正式访华,后续效应上也可以说为习近平主席 2019 年利用出席大阪 G20 会议时访问日本创造了一定条件。如能实现,届时就新时代中日关系的相关理念、发展方向等进行讨论,待时机成熟时,进一步使其规范化、机制化乃至法律化,由此深化两国的政治互信。其次,要强化军事交流,最大限度了解对方战略意图,减少误判,舒缓安全困境。

2018 年是战后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一年,其中最重要的,是从形而上的概念高度来,日本首相时隔 7 年的这次正式访问,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日本高层在对华认知方面的转变,是理性应对中国和平发展的一个标志性开端。正如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所指出的,这次中日关系的改善并非权宜之计。

另一方面,中日关系虽然峰回路转,但要达行稳致远之途,还会经历蹉跎蹒跚的荆棘。对此,需要有清醒的认识,更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

## 二、深度分析(1):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框架中的中日关系

把中日关系放到“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框架中看,可以帮我们看清中日关系中的许多重大的问题及未来走势。

### (一)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习近平关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其核心是一个“变”字,其本质是重塑世界秩序。

大变局是发生在世界权力转移这一时代大背景下的,世界权力自从公元 1500 年从东方开始向西方转移后,权力便出现了在西方世界内部由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波浪式梯度转移“自娱自乐”,但从上个世界八十年代,世界权力的转移出现了东方转向,日本首先开启了这一进程,尾随而至的是亚洲四小龙,再后来是中国的迅猛崛起,今后还会有印度越南等相继参与进来,实现亚洲的整体性崛起。

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的快速转移,终结了世界权力在西方国家间相互“倒手”的局面,西方国家主导世界的格局开始出现倾斜,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出现裂痕、松动甚至是局部性的坍塌,直到当下世界终于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前的世界形势，可以用两个字来描述，一个是乱——可以说是乱象丛生，一个是变——人类正处在一个大动荡大变革时代。这种变乱交织的局面，首先或主要集中体现在大国关系的深入调整，尤其是独霸世界的超级强国美国的变化上，有人说美国一家独大的时代一去不返。

## （二）美国发生深刻变化

美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及始于 2008 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的不断深化，美国治下的世界危机重重，沉痾积弊，积重难返，尤其是随着作为老牌超级大国其相对衰弱趋势的加速，美国已心力憔悴，体力不支，扛不动这个世界了。

为此，美国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试图改变（或不得不改变）迄今为止的各种游戏规则，这种“变”因为特朗普的横空出世，已经演变成了一场震撼世界的革命，即所谓的以“美国优先”为口号在全球层面实施战略大收缩的“特朗普革命”。

特朗普的全球收缩战略在 2018 年表现得十分刺眼——接连退群。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万国邮政联盟，到终止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再到扬言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和猛烈抨击北约甚至联合国，退出“中导条约”，特朗普又突然宣布从叙利亚撤军等等，美国似乎在十分无奈地放弃自己精心打造的战后国际秩序。

如果说特朗普上述的自主退群是现在进行时，是显在的“硬性退群”的话，那么美国还有一个正在精心策划、且很难为人察觉的将来时的潜在“柔性退群”。显在的“硬性退群”更多的表现在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上，而潜在的“柔性退群”，则更多地表现在历史遗留下的难度较大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问题上。

美国似乎是早已充分地评估了在进行全球战略收缩时所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即如果收缩失当退得不好，会带来如同当年的苏联一样的一连串负面连锁效应，即会因美国的突然“退出”或“不在”而引发世界秩序的大面积坍塌，出现混乱，引发冲突和危机。为此，美国在做全球战略收缩时，虽然让早已习惯于美国治下的世界感到美国的做法十分唐突和混乱，甚至让建制派人士认为特朗普是个怪人和疯子，但总体上看特朗普还是掌控住了进退的节奏，给退出和行将退出后的国际社会预留了填补空白和解决遗留问题的时间。当然，美国也会边退、边看、边补救（如从叙利亚撤军等）。另一方面，美国的退出过程也是一个讹诈和敲竹杠的过程，因为在商人特朗普的逻辑里，美国总不能从自己苦心孤诣经营了七十多年的地盘上白白退出吧。

美国的全球战略收缩无疑于是在给世界松绑，让长期存在于地区和国家间的许多问题因为去美国化而再次浮出水面，这客观上为各地区和各国重新定位自我和解决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一个机遇窗口。

## （三）中日关系发生深刻改变

在此背景下，中日关系也发生让人意想不到的快速而深刻的改变。在 2018 年上半年中日密集互动的基础上，2018 年 10 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中国。此访是时隔七年日本领导人再次访华，是走进中国的“务实之旅”。2019 年 1 月 1 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新年感言，称 2019 年将是日中关系新时代的到来。

应当看到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是其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日本正在试图进行回归自我的自主性提升，这表现在许多方面。

首先在政治上,日本强调新国家主义。日本国内政治节奏正在逐渐地进入了“新国家主义”的第五期。第一期是中曾根康弘时期(1980到1990年);第二期是小泽一郎时期(1990到2000年);第三期是小泉纯一郎时期(2000到2010年);第四期是安倍时期(2010到2019年)。而以日本2019年5月改元为象征,日本的新国家主义政治进程或将进入第五期,其国家自主意识有可能全面抬头,国家重建步伐将会大大加快。

其次在经济上,可能再次崛起。据日本共同社12月20日报道,经济再生担当相茂木敏充在相关阁僚会议上表示,从2012年12月起持续的经济扩张期到2018年12月已达73个月,很可能并列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现的战后最长纪录。有人预测,随着美国对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持续不断打压以及美国在全球的“松绑”,由此而释放出的许多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将会更多地被日本所捕获,实现经济上的再次崛起。

第三在外交上,试图左右逢源。安倍首相在外交上力图左右逢源,除了中日关系,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周旋中,也长袖善舞。日本在国际舞台上,抢占先机,在各国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已开始战略布局。

第四在军事上,突飞猛进。日本政府去年12月18日举行内阁会议,正式批准新版防卫计划大纲,今后将进一步大幅增加军费、全方位扩充军力,并加速日美军事的一体化进程。这会进一步架空日本和平宪法中有关“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加剧地区局势的紧张。此外,日本政府将继续推进和强化陆海空自卫队的一体化作战能力;计划在非洲东北部的吉布提建立首个海外永久性军事基地;拟于未来五年继续加大军费开支,投入的军费总额达27万亿日元之多。

#### (四)中日关系的明与暗

对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中日改善关系的明的一面,也要看到中日关系的改善并非一蹴而就,也还存在着许多结构性问题的暗的一面。

一是日本外交中存在两面性问题。中日关系发生转圜是我们一直所期待和所乐见的,并对其未来发展坚定不移地持细心呵护和倾心打造之态度。但与此同时,也应对安倍政府对华外交的两面性有深刻认识和充分心理准备。安倍政府的外交往往两头下注、双向博弈,以期同时获利。为此,对于在东西之间时进时出、战略定位飘忽不定的日本,我们既要看到它走进中国的一面,同时也更要看到它随时有可能随着大环境变化而走出去的另一面。而这“另一面”,对中国的伤害和对亚洲乃至世界的破坏往往是最大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二是新世界格局的挑战。美国的全球战略收缩,某种意义上是在放弃一些领导权。日本反应敏锐,在日欧一体化、CPTPP等重大商机上先声夺人。随着日本自主意识的增强,以及国家再造进程的不断深化,日本不仅只想走进中国、回归亚洲,而且更想深度地走进世界。为此,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条件下,中日两国能否把握历史契机,在全球治理与双边关系方面相向而行且行稳致远,把两国关系塑造成新型国家关系,无疑对双方都是重大考验。

### 三、深度分析(2):中日关系调整变化中的美、俄因素

正如田中角荣当年指出的,“中日关系从来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确实,中日关系历来受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全球外交多种因素影响,尤其是美国以及俄罗斯因素。

#### (一)在中日关系问题上,美国从未“缺位”

“历史是最富有哲理的教科书”。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在中日关系史上,美国始终是重要

乃至决定性因素,这是我们在认识当今中日关系时应该确立的基本判断。甲午战争,如果没有美国在《马关条约》最后换文时刻的斡旋,或无法生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华盛顿体系,遏制日本在华扩张,是核心议题之一。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美国的《中立条约》对战争进程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具有根本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51年9月《旧金山和约》对领土问题的模糊处理,埋下了钓鱼岛问题的“种子”。同时由于中国和苏联等主要对日参战国没有签署和约,使日本的安全保障不是以多边的《旧金山和约》,而是以双边的《日美安保条约》为基础的,其具体实施细则,由日美行政协定确立。1972年尼克松访华,同年田中角荣首相访美。因为美国总统卡特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进行斡旋,1978年8月中日和平条约签署、10月生效。当年12月17日,中美同时发布公告,宣布建交。

就近年的现实来看,2006年10月,安倍晋三首相刚上任即展开“破冰之旅”,使中日关系迅速解冻,但是为什么2012年底再度执政,按照中国外长王毅的说法:“日本为什么处处和中国对着干?”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那就是2009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提出了“重返亚太”(后改为Pivot Asia)、2012年美国防长帕内塔提出了“再平衡战略”,主要目的就是遏制中国。按照前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在《选择》杂志上的说法,美国为了自己战略利益的需要,最怕东亚国家团结把它挤出这个地区。因此,亚洲国家间存在适度摩擦符合美国的利益。也就是说,在中美关系趋恶之际,中日关系难以走近。

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确:中日关系与日美关系,存在联动性。中日关系恶化,客观上美日同盟必然强化;民调显示,只要中日关系紧张,日本认为应强化美日同盟的支持率就会上升(2010年9月,中日“撞船事件”发生,《读卖新闻》公布的比率是71.4%;2013年1月中日“军机对峙”,这一比率是75.9%)。同时,也必然改变亚太经济结构——中日韩自贸区难以建立,和当时美国力推TPP直接相关。同时,中日交恶必然助推俄罗斯东进。日本强化日美同盟,客观上也必然强化中俄关系。

如何在重视不可忽略的“美国因素”的前提下,理性处理中日关系,寻求两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这实际是中日两国长期未能回答的问题。因为,中国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时,很多情况下还难以占据主动地位;而中美关系的摇摆性,连带中国在处理对日外交政策时,难以保持连贯性。日本在处理中日关系时,更是处处受美国掣肘。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其中可以做的关键是:日本如何在中美间寻求战略平衡,而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也需要顾及日本。

## (二)影响中美日关系的两大要素

美日关系与中日关系密切相关的,主要有两大关键要素,一是防务,二是贸易。就防务关系而言,日本所以注重日美同盟,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如上所述,中俄两国均没有签署《旧金山和约》,而日本又恰好处在与之既有历史恩怨、又有领土争端的中俄两大强国之间,同时中俄关系又处在“历史最好时期”,这使日本感到安全局势严峻。其次,强化美日同盟,同时也是“复兴强大日本”的重要抓手。安倍首相再度执政后,在2013年《国防白皮书》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独立强军”的方针。因为,维护日本安全固然是美国的责任,但日本对美国是否能切实履行这一责任,并不真正放心。2013年12月11日,原防卫厅长官、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在日本记者俱乐部公开表示,“许多人认为,一旦日本遭遇麻烦,美军会帮助日本。但我不禁要问,美军真的会帮助日本吗?”这番话耐人寻味。日本在致力于建立“日美+1”和“日美+1+1”的同时,还致力于和澳大利亚等加强军事合作,建立被称为“准军事同盟”的双边关系,

也多少显示这种担忧。因此,如何认清中日两国对安全的关切,摆脱“安全困境”,是中日两国间的重大课题,甚至可以说是历史命题。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8月28日发表的日本《防卫白皮书》,仍在继续渲染“中国威胁”,并将“西部方面普通科联队”改组为“水陆机动团”。这支部队被称为“日本版海军陆战队”。按安倍政府的说法,成立这支部队的目的,是为了应对所谓“西南诸岛有事”。

在经贸关系方面,美国希望和日本建立“双边贸易”,而日本更青睐“多边贸易”。在美国退出 TPP 后,日本主导建立了“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同时,“日本-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已落地。日本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也在进行。可见日本主张“多边贸易”是有实际行动的,而日美在贸易方面的分歧也显而易见。但必须看到,虽然都主张“多边贸易”。但中日主张的“多边贸易”形似而实异。在世界贸易组织日趋边缘化、“经济全球化”正在重组的背景下,中日如何“求同存异”,是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最有效的应对办法应该是“借船出海”,即通过强化中日贸易,间接融入全球经济。

### (三)中美贸易战:契机还是挑战?

2017年初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指出“2015年以来,中日关系总体延续2014年底形成的改善势头”。有一种意见认为,2018年3月22日正式“打响”的“中美贸易战”,是改善中日关系的契机。例如,日本经济新闻社中国总局局长高桥哲史,以《贸易战下的中日合作》为题发表文章指出,“中日关系经过长期停滞,进入了探索合作的局面。推动中国走向对世界开放的方向,才能成为新时代的中日合作的出发点”。但实际上,中日贸易关系的加强,在此之前就已出现。2017年11月20日至26日,“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榊原定征、“日本商工会议所”所头三村明夫、“日中经济协会会长”宗冈正二,率领250人日本高级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和中国经济界进行了广泛磋商和交流。另据日本海关统计,2018年第1季度,中日贸易总额为764亿美元,其中日本对华出口额为340.48亿美元,同比增长14.2%,占日本对外出口总额的18.5%;进口额423.53亿美元,同比增长7.0%,占日本进口总额的22.8%。日本舆论认为,中日两国或将继1980年、1992年、2001年、2008年之后,迎来“第5次经贸合作热潮”。也就是说,即便没有中美贸易战,中日“政冷经冷”的局面已经结束。因此,很难说中美贸易战是“机会”,更可能是挑战。因为,历史证明,美国不希望中日关系持续改善,如何排除来自美国的干扰,才是真正需要研究的问题。

日本与俄罗斯围绕“北方四岛”问题的纠葛,对中日关系也有明显影响。2005年2月,以“第二次台海危机”为背景,日美建立了防长+外长的所谓“2+2”安全协商机制。以此为背景,2005年8月19日—25日,中俄举行了“和平使命2005”首次联合军演。日本媒体就此进行了大量报道。军事评论家坂井俊树的文章标题,最有代表性:《要警惕中俄军事同盟复苏的威胁》。2010年9月28日,以当月7日中日“撞船事件”为背景,中俄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和梅德韦杰夫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此后,中国将“北方四岛”改称“南千岛群岛”。2013年3月25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在领土主权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同时指向明确地表示“反对霸权主义”。

### ◆日方学者点评

#### 一、川岛真 教授

##### 1、2018年中日关系与国际政治

### (1)“从负向零”的关系改善

一般理解,2018 年中日关系大幅改善。但在实际上领土和历史等根本性的几个问题并没有着手解决并依然存在。即便是关系改善,也仅仅是摆脱了首脑会谈完全无法进行的状态,只意味着是一种从“负”转向“零”的关系改善。

安倍晋三首相上任前,民主党政权时期的中日关系已经处于恶化的状态。关于关系恶化的背景,中国方面认为是 2010 年渔船冲突事件和 2012 年围绕钓鱼岛(日方称尖阁诸岛,以下同)问题的所谓“国有化”,但是日本方面则认为是 2008 年 12 月 8 日中国政府船只首次出现在钓鱼岛领海内,以此为两国关系恶化的起点。安倍首相 2012 年上任后,在中日关系上继承了民主党政权时代的政策,并没有为此采取特别改善的政策,并于 2013 年 12 月参拜了靖国神社。这也是中日关系恶化的象征。次年的 2014 年 1 月安倍首相对中国表示了愿意改善对华关系的意图,通过高村正彦副总裁和福田康夫前首相访华,到同年秋天达成了四项共识,实现了中日首脑会谈。2015 年正逢战后 70 周年,历史成为焦点问题,中日双方间比较恰当地处理了历史认识问题,双边关系改善的基调没有改变。此后,中日间利用多边会议的机会进行首脑会谈,安倍首相也通过参与多边会议机会成功实现访华,双方多次实现了首脑之间的会晤。但是,中方首脑并未访日。中方首脑访日与安倍首相单独访华则要到 2018 年才得以实现。中国的李克强总理的访日不过是参加中日韩首脑峰会,而非单独访日。日本方面实现了首脑单独访华,但是中方尚未有首脑单独访日。在这点上,双方关系改善仍在路上,2019 年希望习近平主席在除了参加 G20 峰会外,能够实现单独访日。

2008 年中日之间实现了超过 10 次的首脑会见与会谈,或许现在尚不能说中日关系已经回到了“零”点,但双方关系改善确实是向着“零”的方向在展开。

### (2)中美对立这一要素

然而,中日关系改善基调与中美对立这一更大的潮流也发生了关联。美国方面何时开始对中国抱有戒备,各方意见不一。但是其背景,第一点便是霸权更迭论。19 世纪以来,世界的技术革新是欧美各国主导的,因此在战争中和秩序的形成中,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了主导。但是,此间中国的科技实力大幅增强,特别是中国企业在 5G 等领域开发出了先进的技术,新一代技术革新有可能会出现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无法主导的情况。第二点,从 GDP 的角度上来看,中国的 GDP 也已经超过了美国的一半,美国的焦虑感正在加强,在经济层面上批评中国在竞争中不能保证公正。第三点,中国干涉了美国的民主主义和自由,即面临着和俄罗斯同样的批评。在网络攻击和中国政府对在美中国留学生的影响力等方面,也有批评的声音。为此,美国的对华政策不能简单归结到特朗普总统带来的贸易和关税问题。而 2018 年 10 月 4 日彭斯副总统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演讲,反而更能够代表现在华盛顿甚至是美国的声音。彭斯副总统的演讲中,称中国挑战美国的民主主义,用非正当途径取得技术革新的知识产权和情报,并且提及中国制造 2025 和贸易问题,以及包括压制宗教在内的人权问题、台湾问题和海上扩张等,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对华批判。

但是,尽管美国对中国的批评正在变得强硬,但是其含义依然是多样的。也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强硬,其政策意义包括了①中美新冷战、②“接触”政策(engagement)的终结、③硬“塑造”(hard shaping)等多种定位。①是鹰派,②或是彭斯副总统周围幕僚,③是自由主义派和国务院。或者,在技术层面上是①等等,根据领域不同问题的含义也可能会发生变化。

美国的对华批判,中国大多聚焦特朗普总统,并重视贸易和关税等交涉;但是在日本,主

流看法反而认为这些交涉不过是今后长期持续的中美合作的切入口而已。也就是说,即便特朗普无法连任,这种情况也将会持续下去。主流观点认为,即便3月初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会有答案,一定程度解决问题,大状况仍然不会改变。美国的对华批判,是综合的、长期性的。并且,美国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同盟国,更倾向于要求同盟国采取与美国一致的强硬的对华姿态。第一个例子便是华为问题。

2018年安倍首相访华恰好在彭斯副总统发表演说之后,为此,日本“从负向零”改善对华关系,为了让日本行为不被美国误解为是日本靠拢和接近中国,日本需要对美国进行说明,并且必须要表现出理解美国意图的态度。

### (3)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

2018年10月,安倍晋三首相访华。安倍访华恰逢中美对立激化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围绕知识产权问题开展了中日间的对话,中止了对华技术合作等等,这些都是考虑到美国对华政策而释放出的姿态。但是,与安倍首相同行的经济界人士与中国方面签订了52项开启双方在第三方市场进行合作的协议。在美国放弃对华“接触”政策后,日本政府则好像是给了全世界日本将要继续对华“接触”的印象。当然,日本政府并没有如此大的构想,将2012年以来持续恶化的中日关系重新带回到原点,保证在一定条件下日本经济界能够有机会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中,这或许才是日本政府的目的。

另外,安倍政权也有必要去对美国和世界说明,为什么在这个时期日本要与中国改善关系。为此安倍政权准备的是中日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中“开放性、透明性、经济性、财政健全性”四个条件。日本向中方提出这些条件,并且在这些条件被遵守的范围内日方将会与中方进行合作。从结果上来看,这一点也是日本队中国实施“接触”政策。但是,中方对上述四项条件并没有并且表示接受。

实际上,这四项条件才是紧张的中美关系和改善中的中日关系连接的桥梁。从更高的视角来看,以上四项条件是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FOIP)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结合点。日本向中方提出这思想条件,在中日间围绕这四项条件的交涉能够继续的话,那么国际社会就能够理解日本对华的“接触”政策,并且中国应对这些交涉,本身也能够成为国际社会理解中国仍然重视既有秩序的依据。

但是,2019年到2020年,中日关系有可能面临巨大的课题,这一课题还是与技术问题相关。美国已经在国内采取措施,在那些能够转为军用的技术和先进技术管理上,实行中止对华交易的政策。并且,很可能在之后美国也会要求日本采取同样的政策。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国,日本与中国和亚洲各国之间建立了密切的供应链。仅仅从2018年年底的情况就已经可以看到,中国企业恶化的业绩已经波及了日本企业。但是,不仅如此,如果与经济和军事两方面都相关的技术层面发生问题,在技术层面进行制裁的话,那从之前华为的例子就可以看到,中日间的经济关系很可能会受到影响。虽然不能说要到冷战的地步,但是在技术层面上已经在选择了冷战的状况,“巴统”式的制裁也有可能出现。今后,为了不受到来自美国方面诸如此类的影响,中日合作或者与欧盟和东盟合作实有必要。

## 2、2018年的中日双边关系的课题与现状

### (1)多边经贸框架与中日关系

2018年,日本实现了CPTPP和日欧EPA两大自由贸易制度的成型,这对世界的自由贸易秩序有非常大意义。今后,日美贸易磋商也将进行。美国很可能会对日本提出比TPP交涉

时更为苛刻的条件,磋商达成妥协将会变得艰难。但是,这种趋向也将会在某种程度上为世界创造出新的自由贸易制度和贸易圈。

这些也与中日关系有关。世界也欢迎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能与自由贸易制度的成型发生联系。并且,特别像 CPTPP 一类,以 APEC 的框架为基础,一旦中国表示愿意加入,具体的交涉就可以进行。当然,CPTPP 并非是单纯的废除关税协议,更是一个包括投资制度以及修改国内各种制度在内的制度性很强的框架。单就这一点来看,中国的参加或许会很困难。但是鉴于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也能够参与其中,因此也不能断言中国没有加入的可能性。

与 CPTPP 和日欧 EPA 相比,RCEP 和中日韩 FTA 的自由化程度相对来讲较低。由此来看,对于已经加入 CPTPP 的日本,国内的壁垒并不高,日本反而会成为提高 RCEP 和中日韩 FTA 自由化程度的存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会阻碍磋商达成妥协,而是日本根据本国的国家利益,判断自由化程度低的协议将不会有很大的意义。这一点,特别是在 RCEP 上,日本与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立场一致。中日能够协力推进 RCEP 的话,对这一地区的自由贸易制度成型将会有不小的贡献。对于中日韩 FTA,日本认为其自由化程度将会低于 CPTPP 高于 RCEP。这一点中日双方的立场没有相差太多,因此首先有必要以 RCEP 为目标。中日两国原本就与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维持着紧密的供应链。单单就此而言,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制度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公共财产。2019 年,中日双方能够如何在此领域合作十分重要。

#### (2)安全保障问题(历史、领土、海洋)

在安全保障领域,美国的对华政策正在变得强硬,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摩擦正在增多。同时,特朗普政权在军费的财政负担和军购方面,对同盟国要求很多,日本也是其中之一。日本的防卫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便是基于美方的要求制定的。F35 的大量采购以及将护卫舰改造成航母等,可以说就是其结果。今后,围绕东亚的安全保障有三个论点。第一,美国继续向日本和同盟国大量贩卖武器,理由是由于中国的国防政策和应对朝鲜的威胁,反过来中国也以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威胁为理由强化国防。这就会造成一个典型的安全保障“囚徒困境”。长期来看,中日两国必须去考虑缩减军备的那一天可能要到来。第二,东亚的安全保障环境变化。特别是朝鲜半岛形势和台湾海峡的变化,使得二战结束到朝鲜战争前后形成的东亚安全保障体制面临重大转型的可能。与此同时,日美安保也可能发生质的变化。第三,重视财政支出的特朗普政权,弱化对东亚安全保障政策的关切后,美国的同盟国应该如何应对的问题。从这一点上看,印太战略是把美国继续留在这一地区的框架。但如果这样的尝试失败的话,东亚的安全保障环境会发生重大转变。中日两国必须应对如此多样的可能性,应当积极推进关于安全保障问题的对话和合作。

2018 年是有关海洋问题的对话比较多的一年,也是重要的一年。包括海空联络机制在内,最关键的是在海洋方面的对话机制成型。但是 2008 年围绕东海问题的共识,中日双方虽然都有迈向对话的认识,但是很遗憾并没有看到具体的进展。

关于历史问题,例如 12 月 13 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仪式等,相较往年,2018 年的举办规格降低,中日之间也没有发生大问题。此外,12 月中国政府船只没有进入钓鱼岛领海。中日双方如果能够都采取克制的行动,也能够一定程度上遏制中日双方国民感情的恶化。

#### (3)关于国民感情问题

中日关系中一个巨大的障碍便是关于国民感情问题。但是,言论 NPO 的调查,2018 年

的一个特征是在此方面出现了变化的迹象。日本的对华观感依然极为恶劣，中国的对日观感，表示对日持正面态度的已经超过四成。这是近年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当然，这个数字的可信度仍然存疑，但是这种观感变化的倾向或许是可以确定的。

中国人的对日观感变化，经常被解读为是与赴日观光有关。这种解读认为，大批中国人观光客访问日本，使其对日本产生了正面的观感，并通过 SNS 投稿，产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因果关系在统计上无法说明，倘若如此，中国或许可以通过控制访日游客人数就可以掌握中国人的对日观感。另外，日本赴华观光客增长乏力，而旅行也不一定带来对华正面观感。中国方面希望能够从日本吸纳更多的修学旅行等访华观光客，但是由于在中国既不能使用 Instagram 也不能使用 Line，在这种环境下前往中国的日本年轻人，只可能在中国收获烦恼。

#### (4)对 2019 年中日关系的展望

2019 年，中美关系继续紧张中，可以预测中日之间会构建起比较安定的关系。除了习近平主席参加 G20 峰会顺道访日外，或许还有别的机会实现习近平主席的访日。在此基础上，已经开始构建的合作框架则能够更进一步。

但是，这其中还存在着很大的悬念。第一，中美对立深化的情况下，在技术问题等方面美国很可能会对日本施加更大的压力。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问题，日本应该强化日美关系。第二，前述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四项条件等，日本对华关系改善前提条件如果难以实现的话，不仅仅会损害中日之间的合作，还可能会造成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与一带一路倡议之间的紧张关系。中日双方应该与欧洲等继续合作，将上述两点限制在可控范围内，寻找出最优解。

另外一点，不限于 2019 年一年的，便是两国之间对突发事件的应对。中日间的历史认识问题和领土问题等，存在很多问题。为此，一旦错误应对突发事件，就会严重损害双方关系。两国之间应该注意在处理这类事件的同时，继续探索构建一个不将问题扩大化的机制。

## 二、青山瑠妙 教授

2018 年时值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同时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程永华大使在东京举行的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中指出：“在中日关系 40 年发展的历程中，日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程永华大使的发言可以说完全契合 2018 年中日关系的基调。中日关系自 2012 年 9 月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岛之后急速恶化，随着 2018 年 5 月李克强总理访日以及 10 月份安倍首相访华又加速改善。

本研究报告对中日关系改善的历程高度评价，同时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四个方面对中日关系进行了缜密细致的分析。在学术分析的基础上，为推进中日关系向前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言。

本报告的总论认为，2018 年对于中日关系而言是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二次转型期。根据本报告的分析，小泉政权时代采取了接近美国、抑制中国的政策，因此中日关系进入了第一次转型期。2017 年以来，随着安倍政权的政策转换，中日关系也随之回到了“正常轨道”。

关于中日关系好转的原因，本报告从如下四点做出解读。两国领导人的强烈政治诉求、日本对华打压政策的失败、特朗普政权的对外政策、日本国内对改善中日关系的压力。当然，本报告认为中日两国的“安全困境”仍然没有解决，且依然会成为日后中日关系发展的一大障碍。

此外，总论部分还指出当前国际局势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即，“世界政治和经济

的中心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开始动摇”。在此“大变局”下,美国的政策、中日关系、日本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安全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

最后,总论部分还指出了美国和俄罗斯对中日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特别是中美贸易战与中日关系改善所带来的问题,如何有效避免美国给日本的压力等,对于中国而言也是当前应该解决的重要课题。

2018年中日关系的改善对于中日关系的和平与稳定而言是重要的一步。正如本报告书所指出的那样,2018年的中日关系是应该值得高度评价的政治决策。

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了日本。这是继2010年5月温家宝总理访问之后时隔8年中国总理的正式访问,对于中日关系的改善而言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在李克强访日之前的4月份,中日两国也时隔8年举行了高层经济对话。李克强总理基于高层经济对话的讨论议题,在正式访问期间同安倍首相就高新技术、少子老龄化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一致同意进一步推进旅游、文化、防灾等各个领域的国民交流。另外,在“安全困境”相对高涨的军事安全领域,中日两国也在海上联合搜救、海洋执法机关的信赖关系建构、海洋环境合作等领域取得若干共识。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中日海空联络机制得以缔结。

2018年10月安倍晋三首相访华所取得的重要共识是中日两国从“竞争走向协调”,中日两国互为邻国、互为伙伴、不能够成为彼此的威胁,日本方面所传达的信息也进一步增进了两国间的政治互信。

诚如本报告书的政策建言所示,当前世界秩序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同时,本报告书正确地指出,日美、中俄关系正在日趋强化,在“积极的和平主义”以及“积极的防卫体制”指导下的日本,其动向也值得特别关注。

当然,无论国际秩序如何变化,中日关系如何实现稳定才是两国需要政治智慧解决的课题。如何避免“日美 VS 中俄”这种“新冷战”的对立格局,稳定地推进中日关系也需要中国的智慧和解决方案。

### 三、加茂具树 教授

#### 1、关于“2018年,中日关系迎来冷战后的第二个重大调整期”的分析

①2018年日中两国首脑的互访对于两国首脑之间建立相互信赖贡献巨大。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的访日和10月安倍晋三首相的访华后,中国方面对日中关系的表述为“重回正常轨道”,日本方面的表述则为“从竞争到协调”、进入“新的阶段”。但是,这一变化的起点在于2014年11月安倍首相为出席北京 APEC 会议访华并与习近平主席的会谈(更准确地说,在于在此之前“关于改善日中关系的商谈”)。日中两国在此后花费了四年时间,才实现了关系的改善。我认为,在理解现在的日中关系现状时,有必要关注这四年的时间。因此,“2018年,中日关系迎来冷战后的第二个重大调整期”的分析或许对于2018年过于关注。

②此外,本报告分析认为冷战后日中关系有两个“重大调整期”。但是,我认为,冷战后日中关系的大的转折点在于日中两国确认的“构筑战略互惠关系”,这由2006年安倍首相在访华之际提出,并于2008年胡锦涛主席访日的“共同声明”中加以确认。但这至今尚未实现,目前可以说仍处于“从2006年到2008年的转换”过程中。换言之,“战略互惠关系”的目的在于“在认识到两国对亚太地区和世界肩负着庄严责任的前提下,在共同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过程中,彼此尊重对方关切并拓展共同利益,发展日中关系”,但日中两国间对于“彼此尊重对方关切并拓展共同利益”的具体内容仍缺乏共同的认识。日中关系尚未完成第一个转换。

## 2、关于日本对华政策的分析

①日中关系是通过中国政府的对日认识和日本政府的对华认识的渠道（对话）才成立的。但是，“总论”以及“专题 1、3、4”对于日本的对华政策分析不足（仅从中国的视角对中国的对日行动做了分析）。因此，从日本研究者的视角来评价，本报告所显示的分析并不充分。

②例如，报告指出了“中日关系重大调整的原因、直面的课题及其前景”以及“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际威望日升，GDP 已经是日本的 2.5 倍”等。但是，这些客观事实对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决策过程并无决定性的影响。中国的实际行动才是有着决定性影响的要因。

③以下两个例子可作为“中国的实际行动”。（1）尽管 2008 年 6 月胡锦涛主席访日期间，日中两国政府发表“关于中日东海问题的原则共识”，但是此后从 12 月起，中国公务船就开始进入尖阁列岛领海。（2）2013 年 10 月的周边外交座谈会后，11 月中国方面就设定了东海防空识别区，这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中方的行动，也对日本社会的对华认识产生了重大影响。

④“即使在中日关系最困难的时候，在日本领导人诋毁中国国家形象之时，中国依然没有将日本排除在‘周边外交基本方针’适用对象之外。”等表述不过是中国方面的“解释”。日本学界对于 2013 年 10 月周边外交座谈会的评价受到此后 11 月中方设定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影响。其结果，日本学界对于中国对外行动的评价是“言行不一”（这一点，在与日本学者的交流中应该可以感受到）。本报告不仅应该指出日方与中方“解释”的差异之处，而且应该分析其产生的理由。

## 3、关于“联美制华的基本方略”、“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

本报告将日本的对华政策阐述为“联美制华的基本方略”、“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等。但是，日本政府至今为止从未正式提出“制华”、“遏制中国崛起”的政策。在学术报告中，应正确使用和记述日本政府的正式表述。

## 专题一：政治外交：稳、缓、变

2018 年日本政治、外交总体平稳、波澜不惊，但稳中亦有所变化。在国内政治领域，安倍连任自民党总裁，其内外政策得以延续；在对外政策领域中日关系缓和，日本所面临的整体外交环境有所改善。回顾 2018 年、展望 2019 年，日本政治、外交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稳、缓、变。

### 一、内政趋于稳定

2018 年日本国内政治整体趋稳，其“稳定”格局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安倍晋三在 2018 年 9 月 26 日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击败石破茂，连任成功，安倍长期政权成立。2018 年伊始，安倍内阁因为“加计学园丑闻”而陷入危机，再加上此前“森友学园丑闻”持续发酵，内阁支持率一度跌至 30% 的警戒水位线。2018 年整个上半年，安倍政权都处于危机状态下，直到 6 月份自民党主要派阀（细田派、麻生派、二阶派、石原派）相继表明支持安倍三竞选自民党总裁之后，安倍在党内的支持率才趋于稳定。虽然在野党、舆论界追究安倍责任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是自民党总裁选举更重要的是党内的支持意向，从这一点来看丑闻本身并没有危及到安倍本人在党内的执政地位。从结果来看，安倍获得 553 票，而石破茂获得 254 票，安倍压倒性的优势奠定了“安倍一强”的格局。当然石破茂获得了 45% 的

地方票,从中长期来看依然是自民党内能够威胁安倍执政地位的重要力量。

其次,在野党重组“雷声大、雨点小”,难以撼动自民党在国会中的优势地位。2018年在野党重组加速,5月希望之党与民进党部分议员合并组成国民民主党,成为参议院第一大在野党,而当时众议院中第一大在野党则是立宪民主党(10月临时国会之后,立宪民主党跃升参议院第一大在野党)。这导致在野党力量的分散,更何况这两个在野党的政策主张差异较大,本来就难以合作。另外,无论是立宪民主党还是国民民主党,其优势地位并不明显,在国会中无力对抗自民党。整体而言,日本的国会政治呈现“一强多弱”的格局,在野党群龙无首,在国内政治以及对外政策领域的议题设置模糊,未能从根本上撼动自民党的执政基础。

最后,修改宪法等重要议题在国内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推进。安倍自2012年12月上台以来,围绕国家的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每年都会有重要的议程出台,但是2018年则相对平静。修改宪法对于安倍而言是一项长期的事业,2018年没有得到推进既跟安倍本人深陷丑闻、内阁支持率走低有关,同时也跟执政联盟公明党的牵制有关。安倍上台以来出台的很多政策多采用强行通过的模式,他本人也被批评有违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精神,而被塑造成“独裁者”的形象。但是就修宪议题而言,自民党内部以及自民党同公明党之间积极协商、寻求共识却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由于修宪等议题没有在2018年得到有效推进,所以整体上日本的国内政治以稳定收场。

总的来说,安倍稳定的执政基础、自民党的强势地位以及稳定的执政同盟是确保日本国内政治在2018年整体稳定的三大因素。

## 二、外交总体缓和

2018年日本对外关系整体缓和,但也存在较多的变数。比较值得关注的几组关系集中于中日关系、日美关系、日俄关系以及日本同朝鲜半岛两个国家的关系。

第一,对华关系改善是亮点。中日关系改善的契机始于2014年,在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召开前夕,中日两国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为两国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此后两国关系不温不火,但是两国领导人已经有了在国际多边会议等非正式会谈的积极基础。中日关系真正的转变发生在2018年,5月份李克强总理时隔8年正式访日,并受到了日方高规格的接待。10月25-27日,安倍正式访问中国,访问期间除了签署一系列重要协议之外,还出席了中日第三方合作论坛,这为日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打开方便之门。2019年中日关系的良性互动还将继续,对华外交可以认为是安倍外交政策的加分因素。

第二,对美关系不确定性仍在持续。这种不确定性并不是日本导致的,而是来自于“特朗普冲击”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信奉“美国优先”原则,这让日本在处理对美关系时面临被动的局面。受到“特朗普冲击”的影响,日本在2018年9月份出口意外下跌,其在亚洲的生产网络也因贸易摩擦而受到冲击。为了应对来自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日本一方面选择修复同中国的关系(中国也有相同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缔结巨型FTA/EPA的形式抵消来自美国的压力。2018年7月,日欧EPA签署。2018年末CPTPP正式生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日本对美经济外交的胜利。

第三,日俄关系出现新的转机。领土问题一直是日俄关系的硬伤,也是日俄关系的重点议题。普京是安倍执政以来会见次数最频繁的外国国家元首(包括第一任期),截止到2019年1月,两位领导人已经见面25次,而每次见面讨论的焦点都是北方领土问题。2018年9月在俄罗斯远东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上,普京表示有意年内签署日俄和平条约,这也意味着北

方领土问题露出了解决的端倪。此后日本政府与俄罗斯政府保持了高频度的交流与沟通,虽然目前日俄两国之间就领土问题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结果,但是安倍在任内“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决心已十分明显。

第四,与朝鲜半岛关系乏善可陈。随着朝鲜相继缓和同韩国、美国之间的关系,舆论一度认为同日本关系的缓和也在日程之内。但是,目前日本同朝鲜仍然没有高层次的互动,日本对朝鲜核武器研发以及核导弹试射的威胁仍然存在高度不信任感,且日本人绑架问题一直是横亘在日朝之间的障碍,日朝关系的缓和并不明朗。此外,同韩国的关系不升反降,虽然两国在应对朝鲜核危机存在共同利益,但是这种利益基础十分薄弱,反而是日韩之间固有的结构性问题(例如历史问题)严重削弱两国互信的基础。殖民时期日本对强征韩国劳工问题甚嚣尘上,2018年末发生的韩国军舰雷达照射事件更让日韩关系雪上加霜。

### 三、改元之年、恐有变数

2019年是日本改元之年,现任平成天皇将于2019年4月底退位,皇太子将于5月1日正式登基,这是2019年日本最大的国内政治。天皇作为象征性的国家元首,退位与继位本不应该成为敏感议题,但是改元一事所波及到的领域较广,作为重要的政治日程也会影响到其他相关政治日程的安排。此外,因天皇登基典礼而衍生的皇室外交,也是日本政府重点应对的工作。

除了改元之外,2019年日本国内的政治议程也是满满当当。4月份即将举行统一地方选举。统一地方选举是衡量日本各党派力量的风向标,执政的自民党所推荐、支持的候选人能够获得多少都道府县知事的席位会直接影响到自民党在地方的支持度,也会影响到今后的国会选举以及政权运营。4月的统一地方选举和5月的天皇继位仪式之后,就是7月份的参议院半数选举,自民党及其执政联盟能否继续维持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席是重要看点。而日本的修宪议程会受到参议院选举结果的影响。如此一来,2019年似乎并没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留给修宪等敏感议题。

除了国内政治日程之外,外交领域也有值得关注的内容。2018年6月,G20峰会将在大阪举行,这是G20峰会首次在日本举行,除了日常性的领导人会谈之外,日本需要利用这一场合提出符合其自身利益又能够平衡多方需求的议程。此外,多国领导人可能会利用参会之余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届时中日关系如何推进,能否产生确立中日关系发展方向的新政治文件也是日本政府考虑的事项之一。

此外,常规的外交日程中,与俄罗斯北方领土问题的谈判会贯穿2019年一整年。在此过程中,如何协调日俄关系与日美关系显然也是日本政府所面临的外交议题。日美关系中的同盟定位以及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会影响到俄罗斯对日政策的制定,而日美同盟又是日本外交的基轴,不容有损害日美关系的负面事件发生。

综合以上2019年日本政治外交的各项议程,外交影响(绑架)内政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譬如,近日安倍内阁的支持率有所提升,舆论认为一个重要的加分因素就是日本政府在韩国军舰的雷达照射事件之后所采取的积极反制措施。

2019年日本改元、习近平主席访日等政治、外交议程,无疑是我们关注的重中之重。

#### ◆日方学者点评

##### 一、川岛真 教授

当前,日本国内政治正以 2019 年天皇退位(新天皇登基)和 2020 年东京奥运会两大事件为主轴运行。总体而言,安倍政权的向心力和政策推进力正在不断下降,但即便如此自民党内以及在野党方面也并没有能够取而代之的势力,所以日本政治正渐渐陷入停滞状态。但是在人事和预算层面,“官邸主导”仍未改变。

内政层面上,由于所谓的“森友加计问题”,在野党对安倍政权进行了彻底的问责,尽管成功造成安倍政权支持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在野党针对下次选举的政策讨论均不充分,更遑论实现政权更迭。在厚生劳动省的统计问题上,在野党讨论和关注的重点也只是在于官邸是否有直接发去指示,对于出现统计问题这样的与发达国家地位并不相称的事态,在野党并没有尽力开展充分讨论。同时,在冲绳普天间问题上,即便冲绳居民的不满度不断地升高,不满的声音却仍不能够传递到政权的中枢。安倍政权获得一定程度的支持率,可以说是安倍经济学和外交的成果,但前者现在由于统计问题,已经发出了黄色信号,而 CPTPP 等协议的生效造成物价进一步下跌的话,对于摆脱通缩也是不利因素。

2018 年,国会通过了众多法案,其中有必要去注意到两个给国民生活带来重大影响的法案,即工作方式改革法案和入管法修正案。因为这两个法案不仅仅在安倍政权时期,即便是在今后,也有可能成为政治焦点。工作方式改革法案,对于获取休假、工作时间、工作形态等进行了规定,可以说是要对日本社会“工作方式”进行根本性变革的法案。然而,同工同酬、有薪休假的使用等是该法案的“焦点”,最终或很有可能无法实施,或反而有造成服务业加班时间增加的可能。另外,入管法修正案大幅度放宽了外国劳动力进入日本的门槛,是明治时代以来的重大转变。安倍政权作为保守政权,反而在接受外国劳动力上制定了积极的政策。但是要注意的是,安倍政权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日本迈出了构建多元文化社会的一步,其不过是在补充国内劳动力不足的逻辑下推动的。当然结果也可想而知,即在日本国内将会发生各种文化的冲突和摩擦。

而奥运会方面,原定的预算不断地超支,反映了东日本地震以来持续的劳动力不足和建筑材料不足。但是当前建设费高涨或会造成 2020 年奥运会结束后建筑业的经费骤降,在此意义上看,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安倍政权的政策实际上负担了很多长期的风险。

安倍政权在外交上有很多建树。2018 年实现 CPTPP 和日欧 EPA,与特朗普总统建立良好关系,并且和普京总统数度举行首脑会谈,搭建起签订日俄和平条约的基础,在这些成果中还应该要特别提到中日关系的改善。但是,纵观这些外交成果,还需应注意到其中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日美关系上,尽管首脑关系确实处于良好状态,但是由于美国政策的可预见性较低,仍旧是高度的不透明状态。包括对华为采取措施在内,美国要求其关系密切的同盟国在科学技术问题上,采取跟美国一样的对华政策,因而日本政府不得不面对艰难的抉择。另外,在日本军事实力增强和军购等问题上,美国也对日本施加了很大压力。日俄关系上,北方四岛的交涉绝非易事,和平条约缔结的具体路线也没有确定。中日关系上,尽管双方关系有改善的基调,但是在领土问题和历史问题上依然没有什么转变的迹象。在此基础上,日韩关系恶化,加上日本又难以参与朝鲜问题。对于安倍首相而言,即便是最终想要在外交上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但是从眼下看,这并非易事。

另外,安倍首相或许仍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使修改宪法进入轨道。但是 2019 年 5 月 1 日新天皇即将即位,夏天还将举行参议院大选。而 10 月日本消费税即将提涨。在此过程中,提议修改宪法可能会造成支持率大幅下降。在外交层面上,除了 2019 年有关天皇更替的仪式

以及 G20 峰会外,日本还将召开非洲开发会议(TICAD),外交日程安排非常紧凑。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安倍政权很难随心所欲地主动去推行政策。2019 年,对于安倍政权来说,单单在内政外交上完成这些课题,就可能已经是极限了。

## 二、青山瑠妙 教授

本专题以“稳定”“缓和”“变化”三个关键词来评价日本的政治与外交。根据本专题的分析,日本国内政治稳定,而中日关系、美日关系、日俄关系以及朝鲜半岛的局势趋缓,另外 2019 年 6 月在大阪召开的 G20 峰会、7 月份将要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以及目前进行中的日俄和约·北方领土交涉则是日本政治外交的“变数”。

考虑到日本政治和外交的日程,本专题所给出的三个关键词确实能够比较充分地定位日本的政治与外交。

对于笔者而言,我想要知道的是“变数”如何给当前的“稳定”与“缓和”带来变化,对此特别希望了解中国学者的见解。

## 专题二:平成时代的终焉与中日关系的好转

### 一、平成时代的回顾与启示

2018 年日本社会变化的最大看点是平成时代的终焉。已经即位 30 年的明仁天皇将在 2019 年 4 月 30 日退位,次日德仁皇太子继位成为日本第 126 代天皇。日本社会即将迎来重大转折,即改元换代。2018 年日本社会频繁出现“平成最后”一词,到处都在说“平成最后的 O O”。或许“平成最后”才是 2018 年日本社会更重要的流行语。天皇退位是约 200 年来的首见大事。根据日本宪法规定,天皇只是日本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并无实际政治权力。但是天皇不具有政治权力并不意味着天皇对日本社会无足轻重,天皇及其制度的存在对于凝聚日本社会力量和协调日本社会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平成的终焉将对日本社会产生各种重要影响。

“平成”年号来自《史记》的“内平外成”以及《书经》的“地平天成”。然而平成时代是否“平成”?平成时代日本社会到底经历了什么?2018 年 10 月日本电视台推出了三小时的重磅级节目,讲述了平成 30 年间日本社会的变化。1、政权更迭频繁,首相换了 16 位。2、国家发行国债高达 1087 兆日元(现已突破 1100 兆日元)。3、女性择偶标准变迁,从 3 高(高学历,高收入,高身长)变为 4 低(低姿势、低依存、低风险、低燃费)4、平成元年 4 月开始征收 3%消费税(现已涨到 8%),导致消费者购买欲的下降,进而导致物价下降,平成 30 年也是慢性通货紧缩的 30 年。2019 年消费税将涨到 10%。5、ATM 更加便利,手机全面普及,街头电话亭几近消失。6、老人护理等工作大幅增加,速记等工作大幅减少。7、城市风貌日新月异。1990 年东京都厅落成,1994 年关西国际空港开港,平成 30 年间东京 20 层以上的高层建筑增加了 20 倍。8、街头自行车摆放率大幅降低,从 80 万台降到 8 万台,城市环境得到改善。9、人们着装发生变化,出门戴口罩者大增,很多人戴口罩不是因为感冒,而是赶时髦。10、2003 年制定健康增进法,吸烟环境变化,电车里及马路上等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该节目从政权频繁更迭到市民生活变化、从城市面貌改观到社会环境改善,对平成 30 年日本社会的一系列变化进行了概括。

然而,平成 30 年日本社会的变化远非上述 10 条所能概括。平成时代日本社会的变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平成元年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仍然保持了强劲的经济

增长,因此被称为“平成景气”。然而没过两三年,日本经济泡沫崩溃,陷入长期低迷状态。因此平成年代也常被一些人称为“失去的年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日本经济实力相对下降,不但同美国的经济差距拉大,而且在2010年被中国赶超,日本GDP从世界第2位降为第3位,丧失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2011年发生东日本大震灾,造成福岛核电站泄漏,导致日本核电安全神话的崩溃。日本仿佛“失去”了昔日的辉煌。然而仅从“失去”的观点来看平成时代有失偏颇。平成30年间日本虽然受到内外各种冲击和压力,并没有停滞,而是进入了艰难的调整时期。这段时期不是“失去的年代”,而是日本为了实现经济软着陆并着手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年代。日本依然是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力和科技力的大国。平成时代21个日本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就是一个佐证。在日本国民的努力下,日本社会形成了生活方便,环境优美,秩序良好,内涵丰富的魅力社会。平成时代日本社会并非都是“失”、也有很多“得”!

平成时代留给世人什么启示呢?首先是要反战和平。在刚过去的12月23日,明仁天皇在其85岁生日那天发出由衷的感言:“没有战争的平成是最大的快慰”,不仅表明了他本人的和平主义志向,而且指出了平成时代具有重大意义的精神遗产,即日本必须坚持走反战和平的道路。据最新舆论调查,日本人最希望新元号使用的字是“安”与“和”。反映了日本民众向往安定和平的美好愿望。其次是要社会安定。平成30年间日本社会虽然历经各种风浪,但是维持了长期安定的状态。日本人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痛定思痛,走出虚幻的辉煌,逐步学会了如何回归淡然,回归本我。为构建安全、安心、安定社会做出了努力,这也是平成时代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再次是要谋求发展。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和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带来的巨大冲击,刺激着日本走出迷失已久的经济困局和政治怪圈,寻找符合国家特征、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发展目标。

## 二、平成终焉之年日本社会是“灾”还是“转”

如何认识平成终焉的2018年日本社会呢?2018年12月12日京都清水寺住持森清范大笔书写了一个“灾”字,这是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每年举办的“今年的汉字”评选投票结果。“灾”字反映了2018年日本社会的世态民情。与此相对,已稳坐6年首相宝座的安倍晋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则选用了“转”字作为代表2018年日本世态民情的汉字。安倍首相表示:能否使未来好转,取决于我们自身,日本将在明年迎来重大转折点,希望使之成为美好的一年。“灾”反映了日本民众对日本社会天灾人祸的担忧。“转”字则反映了日本当政者对日本社会转变的期盼。民众选择“灾”字,有其担忧的事实。2018年日本社会的天灾人祸接连不断。6月18日大阪北部发生震度“6弱”的地震,6人死亡,400多人受伤,500多栋房屋全塌或半塌。接着7月上旬西日本地区为中心,遭遇强降雨、河流泛滥和泥石流肆虐,220多人死亡,400多人受伤,6000多栋房屋倒塌。随后9月6日北海道胆振地区发生震度7的地震,40多人死亡,700多人受伤,400多栋房屋全塌,1300多栋房屋半塌,北海道整个地区一时全面停电。不仅自然灾害接连不断,社会丑闻也时有曝光。8月日本媒体揭露了东京医科大学操纵入学考试成绩,肆意降低女考生成绩,抑制考试合格者人数等,引起舆论的批评。一系列的天灾人祸成为人们选择“灾”字的理由。而首相选择“转”字,或许也有期盼的理由。2012年末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执政后,在“转”字上狠下功夫。以“安倍经济学”开道,以“俯瞰地球仪的外交”行事瑕瑜互见,褒贬不一。安倍政权经过六年的政权运营和纵横外交,日本终于在平成终焉的2018年实现了战后最长的景气时期,完成了国家发展战略的大体布局。2018年日本继续推进观光立国,访日外国游客首次突破3000万人次,在日居留外国人数达263万多人。2018年

日本通过《入管法》修正案,扩大吸收外国人劳动力,完成了工作方式改革和《渔业法》等时隔约 70 年的各种改革。不仅在国内大力推动各项转变,而且在国际舞台上积极作为。以日本为中心的 TPP11 协议于 12 月 30 日生效,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分别获得日本国会和欧洲议会批准,于 2019 年 2 月 1 日生效,同时积极参与由亚太 16 国参加的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在中日关系全面恢复正常的同时,日美关系上虽受制于特朗普的强势压制,但日本积极应对即将开始的日美物贸谈判。日俄关系上安倍首相与普京总统同意以 1956 年《日苏共同宣言》为基础,加速和平条约谈判。在半岛问题上,安倍首相对 6 月朝美首脑会谈持支持态度,日朝关系随着美朝缓和而进入平稳期。但是日韩关系陷入僵局,韩国因慰安妇问题而与日本彻底闹掰,2018 年堪称日韩关系的“灾”年。无论是选择“灾”字还是选择“转”字,其实都反映了平成终焉之年日本社会的担忧与期盼并存的状态,反映了日本官民对 2018 年日本社会变化的矛盾而统一的认识。

2018 年日本社会这个舞台上出现了许多令人炫目的变化。被誉为“平成歌姬”的安室奈美惠宣布引退,成为一个与时代共进退的象征。在平成最后的一个夏天,成千上万的粉丝都在欢送这位“平成歌姬”,这种场景表明这绝不是告别一位歌姬,而是告别一个时代,告别一个迷你裙+厚底靴+长冷杉的平成时代。体育界也有不少引人瞩目的变化。在平昌冬奥会上连续 2 届摘得金牌的花样滑冰选手羽生结弦已经成为日本的骄傲,日本足球在俄罗斯世界杯赛场上成为“亚洲之光”,而网球选手大坂直美、职业将棋棋手藤井聪太七段、乒乓球选手张本智和、伊藤诚美等新生代的快速成长,还有日本羽毛球的整体崛起,都在 2018 年有了惊世骇俗的出色表现。而另一方面,震惊世界的地铁沙林事件经过 23 年的漫长岁月,终于在平成终焉之年划上了句号。7 月 6 日,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以及 6 名(之后又有 7 名)骨干成员终于被送上了绞刑架,平成时代这一骇人听闻的惨剧终于完全落幕。

许多社会现象都在告诉人们,2018 年是日本旧时代落幕,新时代开幕的转折之年。从大局来观察,日本已经为新时代做好了大体的布局。日本已经窜起了近未来发展的十年黄金链。2019 年大阪举办 G20 峰会,2020 年东京举办夏季奥运会,2023 年以后日本的博彩设施陆续开业,2025 年大阪举办世博会,奥运会和世博会可能助力日本振兴,成为日本走出“失去的年代”的起爆剂。日本能否在新时代重新起航,虽然还存在着不确定因素,不过应该说改元换代给了日本一个改变现状和重新振兴的契机。

### 三、平成终焉之年日本人意识的变化

在日本社会新旧时代转换之际,日本人在想什么?2019 年 1 月 7 日 NHK 公布了“日本人意识调查”。这是每 5 年实施一次的调查,此次调查于 2018 年 6 月至 7 月实施。调查数据表明平成终焉之际日本人意识发生了新的变化。

1、参与政治活动的意识日益冷淡。调查列举了游行、签名运动、给媒体写信、陈情、抗议、请愿、捐款、募捐等多种活动的示例。调查询问了受访者参与政治活动的情况,回答“什么也没做”的人达到 80.8%,自 1973 年开始实施调查以来首次突破 80%,这一点备受瞩目。表明日本人参与政治的意识越来越冷淡。应当指出,日本社会出现了非意识形态化的现象,形成庞大的无党派,选民中无党派层占一半左右,表明民众渐渐远离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政治,但是当政治开始侵犯后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时,社会则通过选举和舆论等方式对政治家进行规范。这反映了后现代社会的民众对政治的制约。

2、对生活整体的满足度较高。在对生活整体的满足度的提问中,回答“满足”的人占

38.7%，是开始调查以来的最高值。回答“总体来说满足”的人占 53%，二者加在一起达到 91.7%，同样是开始调查以来的最高值，由此可见对生活整体感到满意的日本人在增加。这种满足度或许就是村上春树所说的追求一种“小确幸”，将自己的喜欢融在日常的有趣生活里，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不乏一种不求大欲的幸福感。

3、对结婚和生育等的意识变化。此次调查中，认为“不一定要结婚”的人达到 67.5%，认为“当然要结婚”的人只有 26.9%。2013 年调查中分别为 62.6% 和 33.2%，认为“结婚也不一定非得生育”的人达到 60.4%，2013 年调查为 55.2%。认为“结婚当然要生育”的人只有 32.8%，2013 年调查为 38.9%。从这个结果来看，日本人尤其年轻人的结婚和生育的意识日益低下，而年轻人晚婚或不婚以及晚育或不育的现状，将给日本少子化的困境雪上加霜。日本社会人口逐年减少，尤其是年轻人口相对减少，不但引起劳动力人口严重不足的问题，同时也对现有的社会医疗保险、学校教育制度等带来冲击和影响。平成时代不结婚的人越来越多，跟昭和时代人人都会结婚的「皆婚社会」相比，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4、男女平等观念日益增强。关于女性婚后继续工作的问题，回答“最好继续工作”的人为 59.9%，2013 年调查为 56.3%。回答“婚后最好专职持家”的人为 8.3%，首次跌破 10%，2013 年调查为 10.6%。关于男女的家庭职责，认为“丈夫帮厨和照看孩子理所当然”的人达到 89.4%，是开始调查以来的最高数字。认为“帮厨和照看孩子不是男性的工作”的人只有 7.6%，降到开始调查以来的最小值。调查表明，认为应该男女平等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反映了日本社会实现男女平等过程中的可喜发展。

5、内倾意识增强，不想与外国人成为朋友。调查询问了受访者是否“想与各个国家的人成为朋友”。回答“想”的占 58.2%，比 2013 年调查的 62.9% 降低 4.7%，回答“不想”的达到 38%。高于 2013 年的 32.3%。由此可见，不想与外国人成为朋友的日本人在不断增加。对于“愿意参与帮助贫困国家的支援活动”的询问、回答“想”的人虽然达到 68.1%，但低于 2013 年的 75.4%。回答“不想”的人为 26.9%，高于 2013 年的 19%，表明不愿意参与帮助贫困国家支援活动的日本人在增加。关于“有机会的话，想出国工作和学习”的提问，回答“想”的只有 33%，同样明显低于 2013 年的 37.1%。回答“不想”的达到 63.5%，高于 2013 年的 57.9%，不希望出国工作和留学的日本人越来越多。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看出日本人内倾意识的加剧。有人指出这种内倾趋势在年轻人身上尤其明显。有调查显示“不想到海外工作”的年轻员工高达 60%。

上年度报告书中提到的《低欲望社会》一书，已在中国翻译出版并引起关注。有人认为日本一些年轻人不愿意奋斗和打拼，也无理想和追求，以至于眼下的日本社会被称为“低欲望社会”。“低欲望”不只是反应在性问题上，也反映在社会各个方面。但是，关于的“低欲望社会”的看法见仁见智。有人认为“低欲望”就其本质而言只是改变生活方式而已。所谓的“低欲望”或许是对泡沫经济时期欲望过高、奢侈过度的一个反思，是对人类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一种纠偏，是转型后现代生活的一种尝试。看似无志向的社会，或许是要追求一种“轻”文明社会形态。

#### 四、平成终焉之年中日关系的好转

2018 年不仅是日本社会的转折之年，也是中日关系的转折和提升之年。日本华文媒体列举了 2018 年中日关系十件大事：1、安倍晋三首相正式访华，中日共创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新模式，中日关系全面恢复。2、李克强总理成功访日，启动海空联络机制，中日友好事业再起

航。3、美中贸易战影响中日经济合作,日本政府排除华为制品埋隐患。4、中国成功举办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日本企业组最大参展团成亮点。5、第14届东京-北京论坛发表东京宣言,联合民调显示民意改善。6、中国访日游客全年突破800万,80、90后成为访日主力。7、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访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正视历史事实。8、中国的支付宝、微信支付进军日本,加速推动无现金社会进程。9、上海-横滨纪念友好城市45周年,两市市长时隔20年实现互访。10、日本细川家族永青文库向中国捐赠4000余册汉籍,送文化归根。通过这十件大事可以窥见2018年中日关系的变化。反映了中日政治关系全面恢复正常、中日经济合作更加深入务实,中日民间交流和文化交流更加丰富多彩,还反映了中日关系发展仍有隐患。

关于2018年中日关系存在不同认识。有的比较乐观,认为“中日之间已经达成较全面的战略共识,双方在更为积极、主动地促进新形势下的合作,更加理性、稳妥地处理新老问题与矛盾分歧,特别是安倍的对华政策基调发生了较明显的转换。”有的比较谨慎,认为中日关系“总体上仍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导致两国间对立的结构性原因依然存在,双方战略互信尚未恢复,中日关系回暖的基础尚比较薄弱。”并进一步指出了日本民众对华亲近感在低位徘徊、安倍执政团队具有浓厚鹰派色彩等“牵制中日关系企稳向好的因素”。

中日关系历经数年艰难曲折,已经走出低谷,出现积极向好的新势头,呈现多年未见的新景象。中日两国都对中日关系改善向好给予积极的评价,对中日关系行稳致远表示积极的期待。中日关系回暖好转是内外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首先是经济利益的需要。2017年中日贸易总额为3000多亿美元,相当于日美贸易总额的2倍。日本海外企业的近半数约33800家在中国,40年来日本累计对华直接投资金额超过1100亿美元。安倍首相改善和中国关系,得到日本经济界的积极支持。其次是政治方面的考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构想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了实现宏伟蓝图,需要日本的友好合作。日本方面9月安倍首相赢得了自民党总裁选举,为自己执政到2021年铺平了道路。安倍就任首相以来积极开展外交活动,迫切希望访问中国,通过改善中日关系,为其增加外交得分。再次是“特朗普冲击”的影响。特朗普总统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的冲击效应是中日关系加快改善的重要外部因素。

虽然中日关系积极向好,但是需要保持清醒认识。中日两国在相互认知上还存在误区,在相互信赖上还存在差距。最新民意调查表明,中国受访者对日本有好感的比例在一年内由31.4%上升到42.2%,增加约10.8%。但日本受访者对华亲近感仅有13.1%,微升1.6%。认为中国是日本安全威胁的比例却比上年增加12.3%,达57.5%。日本内阁府外交舆论调查表明,对中国有好感的比例在80年代高达78%,最新的调查结果连14%都不到,没有亲近感的比例却上升到了83.7%,是1978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最低记录。表明日本民众对华亲近感回升乏力。

为了实现新时代中日关系行稳致远,对未来既不能过分悲观,也不可期待太高。在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发展中三个因素非常重要。第一,深化中日经济合作是新时代中日关系发展的“压舱石”。第二,维护和平安全是新时代中日关系发展的方向。第三,发展民间友好交流是新时代中日关系发展的基础。

1月28日安倍晋三首相在日本国会发表的演讲中说:“日中关系已完全恢复到正常轨道。通过深化各领域各层次交流,我将把日中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表明了日本领导人想要进一步改善中日关系的愿望。2月4日中国传统佳节除夕之夜,通过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作为

东京象征的东京塔披上了中国红的盛装，这一盛举表达了中日民众推进中日友好的美好愿望！期待着 2019 年习近平主席访日，中日之间签署反映新时代新特点的中日关系第五个政治文件，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实现新时代中日关系行稳致远，谋求中日两国的互惠共赢。

### 专题三：安全保障：新版《防卫计划大纲》评析

2018 年 12 月 18 日，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以下称“新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2019 年度～2023 年度）》（以下称“新中期防”）。这两份文件指出，日本将继续增加军费，未来五年防卫预算总额约 27.47 万亿日元，比上一个五年计划增加 11.3%。同时提出“多域联合防卫力量”构想，日本将进军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并发展进攻性武器装备，日本军事发展步伐明显加快，防卫政策外向性、主动性、进攻性趋势明显加强，日本将由此进入一个全新的军事转型期。

#### 一、日本政府主导，“安倍战略构想”色彩浓厚

与以往由防卫省主导不同，此次修订由日本内阁官房主导，安倍首相亲自确定大纲修改方向和重点内容，作出“不必停留在过去内容的延长线上”“要探索防卫力量应有水平”等要求，“安倍战略构想”贯穿其中。在安倍首相的主导下，日本自民党成立了讨论防卫力量建设的联席会议，首相官邸成立了由政界、学界、商界的 9 名专家学者组成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恳谈会”，防卫省设立由防卫大臣为首的“未来防卫力量讨论委员会”。可以说，“新大纲”是首相主导、防卫省承办、专家组出谋划策合力制定而成的，安倍内阁乃至安倍个人的色彩浓厚。

#### 二、强调安全环境发生巨变，突出渲染中国因素

“新大纲”指出，目前日本面临的安全环境正在发生剧变且日趋严峻，不确定性增加。声称因中国等国的国力快速增长引发世界力量格局加速变化，各国政治、经济、军事竞争加剧，“灰色区间事态”出现长期化趋势，“混合战争”“多域战”等新型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开始登场，各国竞相展开无人武器系统的研发；美国与中俄展开战略竞争，要求同盟国分担更多责任。其中突出强调中国因素。指中国缺乏军事透明度，军费保持高水平增长，加速增强军事力量，且重视确保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优势；称中国提出与国际秩序不相符的独自主张，在东海、太平洋和日本海频繁开展军事活动，在钓鱼岛方向公务船不断“侵入”日本领海，在南海实施军事据点化行动，试图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引起地区和国际社会强烈担忧。可以看出，国际竞争的加剧、军事技术发展带来的战争形态改变，特别是应对所谓“中国威胁”，是日本制定“新大纲”的主要依据，应对中国的指向性明显。

#### 三、发展进攻性作战力量，防卫政策积极主动色彩明显加强

“新大纲”虽仍称坚持“专守防卫”原则，但无论是在指导思想上还是在武器装备发展上，主动进攻色彩明显加强。首先是指导思想上积极主动色彩明显加强。“新大纲”指出，面对前所未有的现实安全环境，日本将“从战略上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其次是发展轻型航母，引进 F-35 战斗机。日本将把“出云”和“加贺”号两艘标准排水量为 1.95 万吨的“出云”级直升机母舰，改造成可搭载垂直起降型 F-35B 战斗机的轻型航母，并计划引进 147 架 F-35 战斗机，其中 42 架为可垂直起降的 F-35B 战斗机。为了淡化航母色彩，麻痹世人警觉，“新大纲”把航母

化改造后的“出云”级称作“多用途直升机驱逐舰”，日本政府也辩解称，“出云”级改造后将继续担负日本防卫、应对大规模自然灾害等多样化任务，平时不搭载 F-35B 战斗机，不属于“攻击型航母”。对于日本政府掩人耳目的做法，日本军事评论家前田哲男一针见血地指出，“出云”级准航母“搭载战斗机后就成为不折不扣的攻击型航母”，日本改造航母“意在进一步提高自卫队的远洋作战能力，加强与美军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合作”。<sup>②</sup>把“出云”级改造成轻型航母，将打破日本“不能拥有航母”的政策限制，并为下一步建造更大吨位的航母打下基础。第三，“新大纲”虽未写进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字眼，但明确指出要发展防区外打击能力。据“新中期防”和有关资料显示，日本将为 F-35A 和 F-15 战斗机装备射程分别为 500 千米和 900 千米的防区外联合打击导弹，提升防区外空对地、空对舰火力打击能力，并将获取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技术，发展用于岛屿作战的高速滑翔弹和远程反舰导弹。第四，强调在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加强防御能力的同时，将发展干扰敌指挥通信系统、网络及瘫痪敌雷达等进攻作战能力。这些均标志着日本在发展进攻作战力量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日本防卫政策已远远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在今后的军力建设和军事实践中，积极主动的一面将进一步突显，其外向性、主动性、进攻性趋势明显加强。

#### 四、提出“多域联合防卫力量”构想，谋求太空网络电磁新领域优势

“新大纲”在上一版大纲“联合机动防卫力量”构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域联合防卫力量”构想。这一构想与美军 2017 年以来提出的“多域战”“多域作战”概念有相似之处。“新大纲”指出，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和战争形态的变化，未来作战空间将由陆、海、空传统物理空间向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拓展，因而要有机融合陆、海、空、天、网、电等所有领域的力量，提升跨域联合作战能力，通过实施多域联合作战，弥补单个领域作战劣势，综合确保日本的安全。为此，日本将组建太空专门部队、网络防卫部队、电子战力量、海上运输部队等新型作战力量，提升太空情报侦测、网络攻防、电磁干扰等新型作战能力，并将与美国加强新领域的合作，开展相关联合演练。“新大纲”强调要加速进军太空、网络、电磁、海洋、人工智能等新领域，推动制定太空、网络等领域的国际规则，以谋求新领域优势。同时还提出要建立对陆基、海基反导力量和陆海空自卫队防空力量进行统筹运用的综合导弹防空体系，以综合应对敌弹道导弹、飞机和巡航导弹，进一步提升一体化防空反导能力。争夺新领域优势成为“新大纲”的一大亮点，新型力量建设将成为未来日本军事力量的新增长点。

#### 五、推行“印太构想”，建立海洋安全联盟牵制中国

“新大纲”提出，将根据“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从战略层面推进多边多层次安全合作。安倍自 2006 年执政后，先后提出“自由繁荣之弧”和“亚洲民主安全菱形”构想，并形成了美日澳印“大菱形包围圈”和日越菲印(尼)“小菱形包围圈”构想。2016 年，安倍在“双菱形”战略构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在安倍的积极推动下，美国特朗普政府作出积极响应，在 2017 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印太战略”构想，并于 2018 年 5 月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日美联手推动“印太战略”的实质是，在印太地区建立美日澳印海洋安全联盟，并试图联合东盟等其他部分国家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联手遏制中国快速崛起，阻止中国向远洋拓展海权。尽管安倍 2018 年 10 月访华后，鉴于中日关系得到改善，将“印太战略”改称为“印太构想”，但其遏制中国崛起的本质并未发生改变。日本“印太构想”指导下的多边安全合作基本思路是，以日美同盟为基础，与澳、印、东盟、韩、英、法、加、新西兰等所谓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安全利益的国家加强合作，特别是进一步加强日美澳、日美

印、日美韩等“日美+1”“日美+X”三边或多边军事安全合作。同时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行动规则,提高军事透明度,并声称将冷静而坚决地应对中国在日本周边海空域的活动。这表明,日本欲在印太地区建立“民主国家海洋联盟”,对中国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海权的拓展形成遏制。

总的看,“新大纲”的出台,标志着日本防卫政策又一次作出重大调整,以“专守防卫”为名,行“积极防卫”之实,积极主动趋势明显加强。日本在发展进攻性作战力量的同时,强化了对中国快速发展的牵制,这将加剧中日两国在安全领域的矛盾和竞争。安倍提出中日关系已由“竞争”进入“协调”新时代,但“新大纲”表明,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对中国的警惕、防范和遏制丝毫没有减弱。中日关系要行稳致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日方学者点评

##### 一、川岛真 教授

新防卫大纲和新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是从围绕日本安全保障环境根本性变化这一问题意识出发的,即“国际社会力量的变化加速化、复杂化,围绕现存秩序的不确定性正在增多。此外,在太空、网络、电子等新领域的利用正在迅速扩大,重视海陆空这一类过去的、基于物理领域的应对,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国家安全保障的形态。”因此,目标是构建包括太空、网络、电子在内的多域综合防卫力量,以强化防卫力和提高实效性。为此,要将出云级护卫舰作为事实上的航母,引进 F-35 战斗机等具体工作也包扩在内。结果,最显而易见的是国防费用的增加。而这一点从中国来看也确实是敏感问题。

不过,分析新防卫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时,将安倍首相的个人政治倾向性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可以说不是十分准确。应该说,即便现在的首相换作其他人(即使在时期上有所不同),防卫方向也会大致按照目前的方向进行。另外,此次防卫大纲是由官邸主导的分析结果,可能仅仅说对了一半,并且即便是说对的这一半,直接将其与安倍首相个人政策倾向性相关联,也是很勉强的。此次防卫大纲,确实与上次不同,有识者会议的影响力被削弱了。但仍可以说是在首相官邸和国家安全保障局(基本上来自外务省和防卫省的影响很强)之下制定的。即便是因为首相官邸掌握了主动权,也不能说是政治家起草了这样的大纲。归根结底还是由官僚层起草为基础。

目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美国,日本并不能单独地策划制定新的防卫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日本的防卫政策归根结底还是在日美安保之下。因此,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对亚洲安保政策和美国对同盟国各种政策的影响。可以想见,多域综合防卫力是紧随美国的步调,而防卫力量增加以及预算增加也是美国方面的意向。特朗普总统要求北约各国提高防务费至 GDP 的 2%。与此相对,日本的防务费只不过占 GDP 的 1%。因此 GDP 增长 1%,防务费也会在相同比例上增长。但是,即便是这个 1% 的状态也很难维持。这是由于来自特朗普政权的压力非常大。此外,还有同样来自特朗普政权的强烈要求购买武器的压力。比如 F-35 的购买等,海上无人机的开发等,便是对特朗普总统的回应。

当然,防卫力量本身的增长,可以理解是正在直面国际力量变化的日本政府所必须要采取的措施。空中盾牌——F-35 的大量采购,海、陆、空之间以及同太空之间的协同行动成为可能,也扩大了战略的幅度。此外,F-35 的垂直起降性能,也使得出云级护卫舰作为航母使用成为了可能。

在日本,防卫力量强化的原因,一方面被解释为是美国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被解释

为是应对中国的军力以及来自朝鲜的威胁。在中国,这反而被解释为日本加强军备,被当做是来自日本的威胁,并且中国也以此为理由,说明加强国防建设的必要性。这很明显出现了安全保障上的“囚徒困境”。中日双方需要共同思考在某一个时机以什么样的方式缩减军备,或许才能够对整个东亚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 二、青山瑠妙 教授

本专题主要分析了2018年12月份发表的《2019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2019年度~2023年度)》。

根据本专题的分析,新一期《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具有强烈的安倍色彩,过度渲染“中国威胁论”。虽然新防卫大纲中有关于“敌方基地攻击能力”并没有直接指出其攻击的目标是中国,但显而易见的是,随着“出云号”护卫舰改造成轻型航母,日本所提倡的“专守防卫”理念已经成为空壳。同时,本专题还认为,“多域联合防卫力量”这一新的概念和“印太战略”的主张都表明了日本对中国的警惕感以及遏制中国的诉求,这可能会加剧中日两国在安全保障领域竞争的风险。

中日两国产生“安全困境”的原因之一来自于双方的“威胁认知”。其实本专题所呈现的正是中国对日本军事力量增强的一种“威胁认知”。同时,日本的防卫计划大纲以及中期防卫力量计划其内容本身也体现了日本对中国的“威胁认知”。

中日关系既然致力于建立从“竞争到协调”的关系,减少这种“威胁认知”必不可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方案在于日本国内的舆论,中国也需要了解日本国内舆论对防卫大纲以及中期防卫力量计划的评价以及认知,中国只有弄清楚日本今后防卫体制的动向之后,才能减少这种认知。

## 专题四:海洋问题:战略克制与模糊策略

2018年10月安倍晋三首相来华进行正式访问,中日双方表示将共同推动两国关系在重回正轨基础上取得新的发展。中日之间就海空联络机制、海上搜救协定等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为此,中日海上形势也出现了积极协商的态势,推动了中日关系进一步改善,但依然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

### 一、中日海上协调的进展态势评估

2018年是中日海上争端协调的关键之年,两国政府及时抓住改善的机遇积极合作,通过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会议等,推动海上安全合作,强化海上危机管理,取得了重要成果。

首先,2018年4月19日至20日,在日本仙台,中日举行了第九轮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会议。会议就东海相关问题交换意见,并探讨了开展海上合作的方式。双方就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的建立和尽早启动取得了进一步进展,同意加快有关准备工作。此外,双方同意继续加强防卫部门间的交流,增进互信;中国海警局和日本海上保安厅同意继续加强两国海上执法部门间的合作和交流;双方为尽早签署中日海上搜救协定进行了具体讨论;双方确认通过进一步深入磋商加强渔业合作,促进渔业稳定健康发展;双方同意就东海问题原则共识相关问题加强沟通交流等。

第二,2018年12月17-18日,在浙江省嘉兴市乌镇举行了第十轮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双方一致认为,以201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为契机,根据两国领导人

关于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共识,推进海洋领域的务实合作;双方欢迎 2018 年 6 月正式启动运行中日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双方对两国防务交流积极发展势头表示欢迎,就海洋科考交换意见,确认遵守双方关于海洋科考相互事先通报框架;双方同意以 2018 年 10 月安倍首相访华期间签署《中日海上搜救协定》为契机,继续推进海上搜救合作。双方就在双边和多边框架下积极推进应对海洋垃圾务实合作达成共识;双方围绕北极政策进行了有意义的交流;双方对两国涉海智库之间进行的合作与对话表示欢迎;双方确认坚持 2008 年东海问题原则共识,同意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等。

第三,2018 年 10 月 26 日,中日两国政府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海上搜寻救助合作协定》(SAR 条约)。《协定》的签署标志着双方在海上搜救领域合作进一步深化,将对加强中日海上搜救务实合作、提高海上搜救效率、保障海上人命和财产安全、促进区域海上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除了双边合作,中日两国还积极探讨在多边框架下的海洋合作。例如,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建立了地区合作的框架——西北太平洋地区海洋行动计划(NOWPAP),针对日本海和黄海等海洋环境保护,以及大规模海上废油污染等进行国际合作。2017 年 9 月,中国、日本、加拿大、韩国、俄罗斯、美国等六国的海上保安机关长官级人士参加了在东京举办的“第 18 届北太平洋海上安保峰会”,确认了在维护北太平洋治安和确保安全方面推进多边合作,并讨论在北太平洋公海进行渔业监测联合巡逻和多国多用途训练等活动。

此外,在中日高级海洋事务协议的框架下,2017 年 11 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中日海洋垃圾实施研讨会,2018 年召开了第二次中日海洋垃圾实施研讨会。2017 年 6 月,在东京举办了关于北极的中日韩高层对话(大使级)第二次会议,探讨关于北极相关的科学研究领域中三国合作的可能性等。

## 二、新特征与问题点:战略克制、模糊策略与海洋安全困局

如上所述,随着中日高级海洋事务协议的不断深化,以及中日海空联络机制的设立,钓鱼岛的争端局势相对缓解,但是中日海上军机对峙状况依然时有发生,海上安全局势存在许多隐患。一方面 2018 年以来中日政治关系在不断改善,另一方面依然缺乏安全互信。从维护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中日双方采取了战略克制与模糊策略的做法,但海洋安全特别是通道安全依然面临困局。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2018 年 5 月 10 日,中日签署合作文件,同意设立海空联络机制并于 6 月 8 日启用,共同管控海上危机。但备忘录没有就机制适用范围是否包含钓鱼岛周边领海和领空作出明示,也即对敏感的主权争议进行了模糊化处理。而海空联络机制的启用,对于化解危机,防范由于误判引发冲突的意义不言而喻。

第二,从“印太战略”到“印太构想”。2016 年 8 月 27 日,安倍首相在第六届非洲发展大会上正式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构想,一般认为是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抗衡。<sup>③</sup>为了推进“印太战略”,日本海上保安厅对东南亚特别是与中国有海洋主权争议国家的海上执法、以及海上交通安全等能力的提高,给予大力援助。例如,2017 年 10 月,海上保安厅设立海外支援专业部门,成立“海上保安厅移动 corporation 小组(MCT)”。2017 年 11 月,为了对菲律宾沿岸警备队进行技术指导,日本首次向海外派遣 MCT,利用日本政府提供的巡逻船及小型高速艇进行了船舶驾驶训练。2017 年 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日本向菲律宾派遣巡视船,在菲律宾沿岸警备队等相关机构进行了海盗应对训练。通过以上举措,日本进一步加强了与东

南亚相关国家的海上合作关系。

另一方面,随着中日关系的改善,安倍首相将“印太战略”改称为“印太构想”,强调这一构想的开放性,特别是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可能性。这虽然反映了安倍首相调整中日关系的意愿,但果否如此,仍需拭目以待。

第三,日本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依然存在强烈的针对中国的色彩。2018年5月15日,日本推出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sup>④</sup>确定了今后五年(2018~22年度)日本海洋政策的指针,重点方向是“新的海洋立国的挑战”,突出强调安保领域,提出所谓“综合性海洋安全保障”。新计划列举了日本海洋形势的变化,指出“新的海洋立国的挑战”主要包括来自朝鲜、中国、俄罗斯、韩国等因素。例如,朝鲜向日本专属经济区(EEZ)发射弹道导弹。为了加强情报收集能力迅速感知这种危机,日本将增强自卫队飞机和沿岸雷达,以及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的先进光学卫星等。此外,新计划强调,中国海警船不断进入“日本领海”钓鱼岛周边海域,必须加强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警备能力。此外,日本需要应对俄罗斯非法占领北方领土,及韩国持续非法占领竹岛等问题。其与新版防卫计划大纲相辅相成,重点针对中国。

### 三、政策建议:“新海洋立国的挑战”与中日海上合作前景

2018年以来,中国继续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的精神,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日本则根据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积极应对“新海洋立国的挑战”。这意味着中日两国海洋领域面临严峻挑战;另一方面,随着中日关系的整体改善,寻求新的合作机遇、开拓合作空间也成为必然选项。

2018年2月,中日时隔六年重启防务部门年轻干部交流活动,交流内容包括考察部队、访问研究机构以及商讨建立中日合作开展灾害救援的机制等。其他如中国国防大学代表团访日,中青年军官代表团实现互访等。通过此类交流活动的次第展开,促进了中日双方防务部门的相互了解。今后,中日两国在继续致力于改善整体关系的同时,建议采取以下措施进一步加强中日海洋合作。

第一,开展一系列持续有效的防务交流活动,增强安全互信。第二,继续推进两国在非传统领域的海洋合作,如在打击海盗、维护海上通道安全、治理海洋环境等领域,中日应积极开拓合作空间。第三,继续实施中日双方确定的“海空联络机制”,加强海上热线对话,避免擦枪走火风险。第四,继续探讨东海划界的具体办法。采取依据国际法与外交协调的双重途径,灵活处理双方不同的划界主张,争取逐步达成共识。第五,继续探讨在“6·18”原则共识的基础上,中日双方关于共同开发东海油气资源的具体区域与具体开发合作方案。

#### ◆日方学者点评

##### 一、川岛真 教授

2018年中日之间围绕海洋问题,有了很多的进展。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会议召开,海空联络机制的交涉也有了进展。但是,中日间的海洋问题,特别是关于东海问题,还是有着根本性的认识差异。中国方面认为,2010年的渔船冲突事件,2012年日本政府对钓鱼岛部分岛屿国有化(从私有土地变成国有土地)是双方关系恶化的根源。但是,从日本角度来看,日本认为2008年12月8日中国政府船只首次进入钓鱼岛周边领海内,才是问题的起源。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政府船只从未进入钓鱼岛周边公海,而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舶则是在领海内活动。因此,对于中国政府船只的活动,日本的一部分政治家会敏感地反应。

2008年,中日首脑会谈进行了十多次,中日关系往来在这一年非常密切,关于战略互惠关系的中日共同声明也是在这一年发表。并且在这一年,中日之间还形成了共同开发东海的共识(即“2008共识”)。但是日方认为,该共识是由于同年底中方政府船只的活动,造成共识最终搁置至今。而2008年共识,才是中日关系改善之际应该重视之处。为此,安倍首相数次在首脑会议中提起该问题,2018年10月访华和11月底G20峰会上的首脑会谈中,正如外务省网站所显示的,“安倍首相重申了改善有关尖阁诸岛情况,以及尽快重启双方关于‘2008共识’交涉的重要性。特别是关于‘2008共识’,为早日重启交涉,进一步强化意见沟通,双方再度达成共识”(参见外务省网站:[https://www.mofa.go.jp/mofaj/a\\_o/c\\_m1/cn/page6\\_000230.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a_o/c_m1/cn/page6_000230.html)),确认了中日双方尽快重启围绕“2008共识”交涉的重要性。但是,这一问题的解决尽管已经有了共识,但是在面向具体解决层面上,并没有实际的行动。2018年,中国还在不断推进在东海的资源开发,日本方面会在2019年如何对待“2008共识”,应该是一个注意的要点。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海警的活动,在2018年依旧活跃,日本海上保安厅和自卫队的警戒也没有松懈。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尽管中日关系改善,在围绕海洋问题在几个秩序的形成上,双方也形成了协商机制,但实际上海上的活动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是2018年12月中国政府船只没有一艘进入钓鱼岛领海内活动,应该如何看待这一情况,还有待讨论。

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范围广阔,日本海上保安厅对于扩大在这一广大的海域内的活动范围并不是很积极。但是2018年海上保安厅在印度洋上,与印度进行了共同训练,显示其活动范围正在扩大。此外,日本政府为了保证海上秩序和安全的训练以及使各国业务能力提升的支援仍在进行。这是对各国海上安保、管理能力提升的支持,已经在菲律宾和越南展开,今后想必仍将继续。从中国角度来看,这是刺激中国的行为,但是日本的逻辑来看,这不过是提高各国海上安保和管理能力的支援而已。

## 二、青山瑠妙 教授

本专题高度评价了近期围绕海上安全问题中日两国谈判的进展,同时也指出了在海洋安全领域存在的不确定性要素。

本专题的政策建议特别值得注意。本专题将中日两国都置于“海洋国家”的定位,具体建议如下:增强中日两国防卫部门交流,推进两国在非传统领域的海洋合作,继续实施中日双方确定的“海空联络机制”,探讨东海划界的具体办法以及中日双方关于共同开发东海油气资源的具体区域与具体开发合作方案。

笔者认为本专题所提出的政策建议非常及时且中肯。当然在上述领域关系强化的同时,也需要探讨中日两国在多边框架下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 专题五:经贸关系:重新起航

斗转星移,时光飞逝,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已经40多年了。其间,中日经贸关系起起伏伏,既有快速发展的阶段,也有跌入低谷的时期。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但是,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还是再度进入了新的起航时期。

### 一、近年来中日经贸关系回顾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日经贸关系取得了长足进步,两国联系日益密切,且呈现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的方向日益发展的态势。不言而喻,这与中日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

经贸关系的不断提升有关。

从 2010 年日本撞船事件开始,中日关系开始出现重大变化,特别是日本“购岛事件”发生后,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安倍晋三当选首相以后,参拜靖国神社并采取全面制衡中国的国策,对本已受到重创的中日关系可谓是“雪上加霜”。受此影响,两国经贸关系从 2012 年开始逐年走低,据中国海关统计,2011 年,双方贸易额达到 3429.9 亿美元,此后,逐年下降,到 2016 年,降至 2747.9 亿美元,5 年间下降了约 20%。据日方统计,2011 年,中日贸易额 3784.3 亿美元,到 2016 年,下降至 3016.3 亿美元,5 年间下降了 20%以上。从投资方面看,日本对华投资也大体呈下降趋势,特别是日本“购岛事件”导致中日关系大幅度下滑。受此影响,日本企业对华投资日渐谨慎,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2 年,日本实际对华投资金额 73.8 亿美元,此后,逐年下降,2016 年,日本对华投资仅为 31.1 亿美元,与 2012 年相比,下降了 57.9%。由此可见,中日经贸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密切程度。

虽然中日经贸关系受到严重影响,但是,两国关系向好应该是国民的共同愿望,特别是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下,双方需要共同应对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包括经贸关系在内,中日关系有了重大调整,迎来了合作的新契机。

## 二、2018 年中日经贸关系重新起航

从 2017 年开始,在双方的持续努力下,两国关系逐步改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APEC 岷港会议和马尼拉东亚合作领导人会议期间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要把握和平、友好、合作的大方向,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改善、向好发展,并就区域一体化、推进“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等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日经贸关系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中日经贸关系开始向好,当年双方贸易额重回 3000 亿美元水平,日本对华实际投资金额同比增长了 5.1%。中日经贸关系逐渐进入到正常的发展轨道。

2018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46 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这一年,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首先,两国政治关系进一步改善。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邀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 5 月 8 日至 11 日赴日本出席第七次中日韩政府领导人会议并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李克强总理任内首次访日,也是时隔 8 年中国总理再次正式访问日本。期间,中日签署了包括服务业、医疗养老、金融、节能环保等领域的一系列协议,并同意给予日方 2000 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10 月 25 日至 27 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访问中国,这是日本首相时隔 7 年正式访华。两国的政治关系重回正常轨道,经贸关系也随之日渐向好。

其次,两国经贸关系持续向好的方向发展。2018 年 4 月,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时隔 8 年重启,对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对进一步加强中日经贸合作、拓展合作空间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可以说,在中日政治环境不断改善的情况下,2018 年,中日经贸关系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据中国海关速报,2018 年中日贸易额 3276.6 亿美元,同比 8.1%,其中,中国对日出口 1470.8 亿美元,从日本进口 1805.8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7.2%和 8.9%。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8 年中国吸收外资额 1349.7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日本在华新设企业 828 家,实际对华投资额 38.0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40.3%和 16.5%。截止 2018 年底,日本累计在华投资设立企业 51834 家,实际始使用金额 1119.8 亿美元,继续保持我国累计利用外资

最大来源国的地位。2018年,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298.3亿美元,同比增长4.2%。其中,中国对日投资2.51亿美元。截止2018年底,中国企业对日本直接投资累计36.91亿美元,主要涉及制造业、金融服务、电气、通信、软件等领域。

第三,日本企业踊跃参加中日第三方合作论坛和中国进口博览会证明:加强经贸合作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于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日本是各国和地区中参展企业、团体数量最多的国家。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介绍,日本约有450家企业参展,占场馆面积约2万平方米。分为消费电子及家电、智能及高端装备、服装服饰及日用消费品、汽车、食品及农产品、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等七个企业商业展区,集中展示了日本企业及其创新产品。10月26日,在北京举行了第一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论坛并致辞。本次论坛有中日两国政府部门、经济团体、金融机构和知名企业的约1500名代表参加,与会嘉宾围绕交通物流、能源环保、产业升级和金融支持、地区开发等4个主题进行了交流,中日双方企业签署50多个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第三方合作为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为双方企业的合作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对未来进一步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将发挥积极作用。

### 三、2019年中日经贸关系展望

再度起航的中日经贸关系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展望2019年,双方应该有更多的合作空间和领域值得期待。

一是两国政治关系有可能会再上一个新台阶,将为中日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从2017年开始,中日关系持续改善,日本一直希望实现中国国家元首正式访日,目前看,中日良好的氛围仍在持续。就中方而言,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符合中方的利益,因此,2019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日本举办的G20,期间,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元首正式访问日本的可能性比较大。

二是两国经贸关系将会继续保持平稳发展,但因面临美国对华贸易战,双方的经贸合作面临一些挑战。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后,对华态度经常出尔反尔,特别是对华发动贸易战,持续加征关税,对中国对美贸易以及中日贸易都产生了不利影响。现在,中美正在就贸易等进行谈判,无论谈判成功与否,对现有的全球产业链都将产生影响。作为重要一环的日本企业必然会进行相应调整。当然,中国作为全球最具潜力的巨大市场,日本企业肯定不会放弃,中日政治关系持续向好,两国经贸关系保持稳定发展仍然值得期待,未来中日贸易仍会稳步发展,双向投资会逐步增加。

三是中日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拓展合作空间前景非常广阔。特朗普奉行的单边主义、美国优先的政策,不仅对中国,对日本同样也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中日两国在共同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对逆全球化方面有很多共同的利益。特别是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中日更应该加强合作,日本牵头的CPTPP已经生效,已签署的日欧经济伙伴关系(EPA)将建成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中日参加的RCEP在积极推进,两国都希望尽早达成协议,而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是坚定不移的,探讨加入CPTPP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中日韩FTA谈判也在积极推进中。因此,中日两国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加强合作的领域和空间非常大,双方应该加强沟通与协调,相信2019年中日两国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会有新的突破。

总之,2019年,中日两国经贸合作前景非常值得期待,双方贸易再上新台阶的可能性非常大,在政治关系持续向好的环境下,中日两国应该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前景。

## ◆日方学者点评

### 一、川岛真 教授

对于中日关系而言,经济是极为重要的领域。言论 NPO 的舆论调查中,日本人对华观感极为恶劣,而中国人的对日观感即便有所改善仍然不佳。但是作为中日双方国民的共识,认为两国关系重要的人超过了六成,在回答中大多将重要性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关系。即使在两国政治上关系恶化和两国间国民感情恶化的情况下,中日经济关系依然是支撑两国关系基底。这不仅仅是供应链带来的紧密联系,也可以说是由中国巨大的市场所连结的关系。

但是 2018 年的最大问题是中美关系恶化造成中国经济减速,这也成为一部分日本企业收益大幅度下降的原因。单是由于中日之间存在稳固的供应链,一旦某一方受到经济损失,马上就会对另外一方的经济造成影响。而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华姿态不断强硬,即便日本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美国的脸色,仍然显示出了比较中立的姿态。华为日本公司也开展活动,谋求日本社会的理解。

在技术层面上,中美对立也有可能使得中日关系出现问题。倘若美国将在国内强化的技术层面对华贸易制裁,推广到同盟国,要求同盟国采取相同措施的话,会造成巨大的问题。特别是美国对能够转为军用的技术,要求同盟国在对华贸易、技术流出的规定上仿效美方执行,会造成非常广的领域内产品以及技术的交流发生障碍。这可能会形成 21 世纪版的“经互会”或“巴黎统筹委员会”。在这一点上,有必要在中日双方不断推动合作的同时,同欧盟开展协作,尝试影响美方,使之不施加过分的限制。

此外,中日间经济关系还存在几个隐忧点。第一点,也是美国的忧虑点,即知识产权保护等国际标准能否在中国被严格遵守的问题。第二点,中国国内对外资企业采取强化管理的方针,这一方针今后将何去何从的问题。这两点日本与欧盟、美国的担忧是一致的,也是非常容易对中日经济关系产生影响的方面。另外一点,是中日间领土问题和历史问题关联的政治风险依旧存在。

2018 年中日经济关系上,相对来说有很多的正面信息,但鉴于以上几点,2109 年中日经济关系或许将会迎来相当困难的局面。另外,关乎到今后中日经济关系将如何展开,有必要让日本的经济界人士了解到中国的科技开发能力。日本的经济界对中国技术革新依然抱有不小的担忧,让日本经济界的的确确地了解中国的科技实力,将会有助于建立起新的合作关系。为此,今后中日双方经济界更需要平稳顺利地开展协作。

### 二、青山瑠妙 教授

本专题认为 2018 年是中日经济关系的转折点,因为在 2018 年围绕“一带一路”倡议,日本企业已经表明积极参与第三方合作,这为中日经济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当然,本文也预测 2019 年中日经济关系可能进一步发展。

长期以来,中日关系被认为是“政冷经热”。良好的经济关系可以稳定因历史以及安全保障问题而动摇的中日关系,因此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18 年是站在一直以来相对良好的经济关系的延长线上发展过来的。

对于 2019 年的中日经济关系而言,我认为有必要认真考虑中美贸易战争的影响。

## 专题六:2018:日本自由贸易战略的跃进之年

日本曾被视为一个在自由贸易战略上相对内向、谨慎乃至保守的国家,既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EPA)的“后来者”,在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上也鲜有独到的倡议和实践。然而,自安倍晋三于2012年再度执政以来,日本成为在推动“巨型FTA”上最为积极的国家,且频频收获阶段性成果。尤其是2018年,日本参与的“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日本—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日欧EPA)相继签署协议,实际生效亦接踵而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也保持了相对积极的势头。

### 一、当前日本在自由贸易战略中的核心国家身份

身份决定偏好,偏好决定目标,目标决定路径。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在自由贸易战略上所展现的国家身份定位经历了三个方面彼此关联的重大转变:在机制建设上,变消极追随者为积极引导者;在规则体系上,变后续接受者为前期塑造者;在议题设置上,变被动防守者为主动进攻者。这些转变并非一蹴而就,本身仍处于变化过程之中,远未定型,但从CPTPP、日欧EPA等阶段性成果来看已初现端倪。

在此进程的作用下,当前日本在自由贸易战略上主要存在三个国家身份设定:“核心”、“主导”及“桥梁”。其中,“核心”是指在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制定中居于“核心”地位,尽可能地参与主要诸边或双边EPA,从而在其国别重叠部分始终位于焦点。“主导”是指在各个EPA谈判中起引领作用,努力提高其一体化深度和市场开放的雄心水平。“桥梁”是指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在亚太等不同区域之间起到连接、中介、传导的作用,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协调、平衡各方的共同利益。这三个身份紧密交织:“核心”是前提和基础,“主导”和“桥梁”则分别是在政策议题设置和伙伴关系上的突出表现。

与欧美相比,无论是在全球议程设置还是在经济自由度上,日本要想实现真正的“主导”或“超越”仍具有相当的难度。因此,对日本而言,基于一定“主导”作用的“桥梁角色”事实上是最能体现其比较优势的身份设定,亚太地区则是检验和实践这一定位最为重要和临近的地区。考虑到与中国、印度、东盟等核心新兴经济体的地缘经济关系,与欧美相比,日本在发挥“桥梁作用”上确实更具优势。这在RCEP和CPTPP等谈判中已经有所体现。

### 二、日本自由贸易战略转型的成因与走势

传统的研究认为,日本的EPA战略从相对低调到更为激进的转变过程中,有两个因素尤其重要,即财界院外游说的强度大小以及贸易决策的集权程度高低。不可否认,这两个因素不容忽视,但在观察2010年之后日本自由贸易战略的纵深发展时可以发现,一系列新的因素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从安倍政府自由贸易战略中的国家身份演进来看,离不开下述三方面的特殊背景。

第一,国际贸易政治的风云变幻将日本推到前台。

TPP等“巨型FTA”起步之时,正值发达经济体试图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日关系震荡下行的时期,这些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要求日本在经贸领域更加积极有所作为。而特朗普执政之后国际和地区局势的剧烈动荡,使日本在经贸领域陷入前所未有的复杂态势,也使其战略决断面临着某种意想不到的“机遇之窗”。

早在美国尚存于TPP之际,日本国内就有声音,主张日本应跳出“脱离美国”或“以美国

为基轴”的传统二元悖论,从“全球参与者”的角度塑造更为积极主动的外交。特朗普成为美国领导人之后,相继做出了退出 TPP、暂停“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等决定。美国的缺位,不但对其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造成巨大打击,而且形成了某种“战略真空”和区域领导力的匮乏。在贸易、投资、物流、信息等各个方面成为世界的“核心”,由此成为“提高日本存在感的首要捷径”。特别是加入 TPP,使日本提高了在实践和推广经济自由化中的“可信度”或领导力,从而变身为一个 FTA 网络中的“支点国家”。而在从 TPP 向 CPTPP 转变的关键节点上,日本非但没有在原有条款立场上趁机退缩,反而力劝加拿大、越南等犹豫摇摆的国家。

第二,自由贸易战略是安倍政府大国志向和长期政权的重要体现。

首先,这一自由贸易领域的国家身份和角色定位是日本在与韩国等其他国家比较和竞争的背景下展开的。与韩国领导人相比,在推动 EPA 建设方面,日本领导人一度被认为缺乏决断力,在相应的行政机构设置上也乏善可陈,这是两国在 FTA(EPA)数量和质量上一度产生显著差距的重要原因。这一情况在安倍第二次执政后出现了明显变化,而且随着其政权的稳固和延续进一步得到发展。在经济领域,“安倍经济学”的成效是安倍政权安身立命的根本基础。其中,“三支箭”的第三支“增长战略”中除了创新、节能、创业等内容之外,以 TPP 为代表的市场开放也是核心要务。而在政治外交领域,安倍政府提出的“俯瞰地球仪外交”以及“积极的和平主义”等政策理念和主张同样与日本自由贸易中的身份设定相交织。

其次,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在自由贸易上主动塑造国家形象、突破传统限制的能力和意愿均有所增强。由于安倍长期政权的确立,日本政治决策中的“政官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首相及其核心团队的作用日益提升,“官邸主导型”决策体系逐渐成型。传统上,除了利益集团的作用之外,日本的自由贸易政策往往受到不同省厅之间“部门主义”或“势力范围之争”的困扰。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农林水产省等省厅出于各自部门利益的考虑,对于签署 EPA 的对象和条件往往意见不尽相同。这一牵制在“政强官弱”或“政主官辅”的时代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再次,日本政府试图在自由贸易政策上调和不同侧面的形象错位,提升“政策洼地”,塑造更为正面的整体国家形象。纵观日本现有的 EPA,可以发现表面上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仅就关税削减幅度而言,日本的 EPA 自由化率普遍较低,除了与印度尼西亚、东盟、越南、印度、蒙古等少数经济体的 EPA 之外,日本的自由化率往往低于对象国。另一方面,由于强调经济伙伴关系而非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日本的 EPA 在一体化的范围和水平上在世界各国中位于前列,仅次于美国、秘鲁等少数国家。但与韩国等直接竞争对手相比,日本的 EPA 伙伴国中长期缺乏全球主要经济体和本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这也是日本加速与美国、欧盟等建立双边或诸边 EPA 的重要原因。

一言以蔽之,在本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实质性解决、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速普遍放缓的“艰难时世”下,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有助于彰显安倍政府抵御利益寻租和保护主义的诱惑、寻求通过市场开放促进经济整体发展的有利形象,从而反过来支撑和延续其政权。

第三,国内经济社会变化的长期积累是日本国家身份跃进的根本基础。

进入 21 世纪之后,随着 EPA 建设的不断进展,日本社会正在经历某种“认知转换”,尽管自由贸易政策中的“利益集团政治”力量尚存,“公益政治”视角的地位却日渐提升。这种市场

开放的底气,需要有充分就业、适度通胀等经济“景气循环”的支撑,归根到底来自于国内的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基础设施、医疗、绿色经济等优势产业的巩固和进一步发展。

首先,以经济团体联合会为代表的日本产业界继续成为推动本国在全球贸易中国家身份转型的中坚力量。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日本企业以政策建议、审议咨询、政治献金等诸多方式,向日本政府施加了长期而微妙的影响。

其次,传统的抵抗势力出现了一定的弱化乃至瓦解。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农林水产业。农业从业者的老龄化趋势进一步加剧,且后继无人、收益低下的现象日益突出。长期作为日本农业保护代言人的农协自身也面临着改制的巨大挑战。为了推进“能动主义”的顺利进展,“以攻为守”“迂回突破”成为日本政府软化既得利益集团、打破其长期构筑的“岩盘规制”的重要方式。在人口等客观条件变化的前提下,这一方式进一步加剧了各个政策领域内部的分化组合,降低或中和了抵抗势力。

最后,除了业界和技术官僚的作用之外,经济学家的技术自决及其理念对于促进自由化等经济政策正当性、合法性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这对媒体舆论乃至社会共识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为国家身份转型提供了侧面支持。

### 三、展望

从世界各国来看,自由贸易战略背后的国家身份设定是一个“艺术”与“科学”兼修的产物。过于保守或平淡无奇,则泯然众人,无法起到指引和激励的目的;过于激进或遥不可及,则沦为空想,甚至徒增笑柄。放眼全球,两者都不乏鲜活的例子。

平心而论,近年来日本在自由贸易战略上的国家身份设定是相对成功的,有力地推动了相关谈判和政策的实际进展。CPTPP 在取得日本等六个国家的国会批准后,已于 2018 年 12 月 30 日生效。日欧 EPA 在相继取得日本参议院和欧洲理事会的批准之后,也于 2019 年 2 月 1 日生效。实现这些高水平谈判及其协议之间的“正向连锁”,成为日本扮演“核心”、“主导”以及“桥梁”等角色的重要基础。其背后体现的日本国家身份设定,也将对中日韩 FTA、RCEP 等尚在进展中的若干亚太 FTA 谈判以及中日经济关系造成微妙的影响。

当然,日本自由贸易战略所反映的国家身份往往不是一劳永逸的,也非静态成果。为了维持乃至进一步提升这一国家身份,日本在短期内至少面临三方面的挑战。

首先,无论是从“东亚国家”的地缘身份出发,还是为了实现日本与 FTA 伙伴的贸易比例目标,中国和韩国都是日本落实自由贸易战略始终无法回避的邻国。日本在“巨型 FTA”上的尝试及其成就,或可视为对域内结构性障碍的一时应对之举,但这一围魏救赵的迂回成果归根到底仍无法替代本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当前,东亚各国的经济下行压力使基于市场开放的区域深度合作前景进一步复杂化。在地区局势有所缓和的背景下,能否克服自满情绪和“制度疲劳”,一鼓作气推进中日韩三边 FTA、RCEP 等谈判,将考验包括日本在内的域内各国领导人的战略决断和政治气魄。

其次,CPTPP、日欧 EPA 等协议毕竟刚刚起步,在动荡的国际经贸环境中还面临诸多变数。特别是在全球自由贸易势头受挫、贸易保护主义乃至单边主义高涨的气氛中,主要大国间的贸易政策博弈及其外溢效应将深刻影响到日本的现实抉择。

再次,在全球“竞争性自由化”的进程中,如何真正处理好“先进”与“渐进”的平衡感,如何妥善应对身份和形象背后的成本收益矛盾,对于日本而言仍将是一个重大的命题。这不仅关系到在国际上有多少“志同道合者”愿意相向而行,也与维持国内的执政条件息息相关。基

于上述原因，对于自由贸易战略中日本国家身份变迁的内在机理和演变态势值得进一步追踪和研判。

#### ◆日方学者点评

##### 一、川岛真 教授

2018年是安倍政权围绕多边经济合作框架产出成果的一年，CPTPP是这些成果的象征，2018年7月签署的日欧EPA也不能被忽略。对于日本政府来说，认识到依赖WTO机制，以维持现存自由贸易框架制度，存在局限性，在调整国内环境后，日本决心加入到能够成为新的自由贸易秩序的TPP，尽管美国在中途退出，但最终日本自己主导实现了CPTPP。日本主导这样大型的多边机制磋商并不多，这一交涉的完成也为日本政府提供了很多自信。

此外，由于日本在TPP谈判中调整了国内的环境，使得日本在类似日欧EPA磋商的各类磋商中，都获得了优势地位。一般在多边贸易框架磋商中，政府必须要同时面对对内交涉和对外交涉两方面的任务，但日本在对内交涉层面上的成本大大降低了。

并且日本在CPTPP和日欧EPA上迈出一步，也让日美交涉提上了日程。2018年9月的日美首脑会谈，针对关税协议在内的贸易磋商达成了共识，并且共识已经得到了美国国会的同意，2019年日美磋商将会进一步进行下去。继CPTPP和日欧EPA后，日美磋商也顺利完成的话，将会促成一个世界规模的全新的自由贸易框架。但是，美国很有可能会对日本提出比TPP磋商时更为严苛的条件。而2019年对WTO的存废而言将有重大的转机。日本作为自由贸易秩序的拥护者，在WTO中也可以发挥一定程度的作用，并且日本又是G20峰会的主办国，因此在G20峰会上的外交值得关注。

日本通过多边贸易磋商中对国内环境进行了调整，在RCEP和中日韩FTA等地区合作框架中，也可以说占据了先机。然而，由于在CPTPP等一类框架中，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程度的贸易自由化，因此日本政府对自由化程度较低的合作会显得较为消极，并且会提出更多要求，以使他国达到更高程度的自由化。对于中日韩FTA而言，会实现比RCEP更高，而较CPTPP为低的自由化程度。对于日本而言，RCEP的交涉和中日韩FTA磋商将会是互相联动的。

2019年CPTPP和日欧EPA上的成果，将使进口日本的各种商品的关税下降。这对于国民生活而言大有裨益，对安倍政权的支持率也有影响。但是，关税完全废除意味着进口商品价格的下降，这将造成通货紧缩进一步加剧。这些协议对于日本产品的出口有利，在贸易层面上可以给予肯定的评价，也会使得国民生活更加富裕。但是，对于安倍经济学所提出的摆脱通货紧缩目标有什么样的影响，可以说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 二、青山瑠妙 教授

本专题以日本发挥主导性作用的CPTPP(TPP11)和2018年缔结的日欧EPA以及2019年势头良好的RCEP为例，重点讨论了日本的自由贸易战略。日本为何能够在自由贸易战略领域取得积极进展，在本专题看来，美国的政策变化、安倍长期政权和他的大国志向，以及国内舆论对开放市场的呼声等都是重要背景原因。最后，本专题也指出，中日韩FTA、贸易保护主义、国内国际动向等方面也是今后日本要重点关注的课题。

如本专题所示，日本的确在构建巨型FTA的潮流中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

日本、中国和韩国都是东亚地区重要的大国。经济关系密切的三国缔结FTA具有重要的

意义。另外，在贸易保护主义高涨的今天，RCEP 的缔结也具有特殊的意义。进一步而言，RCEP 和中日韩 FTA 的缔结也有利于规避中美贸易战给东亚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基于此，对于日本在 RCEP 以及中日韩 FTA 中的作用以及缔结过程中的问题点等领域，笔者能够有中国方面进一步的分析。

## 专题七：“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光与影

2018 年被称为中日关系“再出发”的一年。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 40 周年为契机，中日两国关系迅速回暖。继 5 月李克强总理成功访日之后，安倍首相于 10 月进行了时隔七年的正式访华，中日关系终于走出颓势、重回正常轨道。而其中的亮点之一，无疑是中日两国政府达成的“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共识。“第三方市场合作”，成为 2018 年度舆论界在描述中日关系时的高频词。

“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中国首创的国际合作新模式，也就是将中国的中端制造能力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理念结合起来，为第三国提供高水平、高性价比、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实现三方共赢的效果。早在 2015 年 6 月，中法两国就签署了《中法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合声明》，之后又相继与韩国、英国、加拿大、新加坡、德国等国家签署合作协议，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能源、环保、金融等优势互补领域。

中日两国政府达成“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共识始于 2018 年 5 月，在李克强总理访日期间，中国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与日本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共同签署了《关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双方同意设立跨部门的“推进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机制”，举办“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为两国企业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提供制度政策保障和有效的合作平台。

2018 年 10 月安倍首相访华期间，在北京举行了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约 500 名日本经济界人士前来参加盛会，中日两国的金融机构、企业和经济团体等签署了 52 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金额超过 180 亿美元，展现了中日务实合作的新起点和新气象。

### 一、“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潜力无限并值得期待

“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被视为新时代中日关系“再出发”的标志，反映了在中国新一轮深化改革开放之际，日本再次与中国合作、共同走向繁荣的意愿。众所周知，在 40 年前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初，日本政府高瞻远瞩，采取了积极支持与合作的立场，自 1979 年起对中国实行的 ODA 援助被视为中日两国全面经济合作的标志性政策，两国关系从此不断深化与发展，双边贸易额从 1978 年的 48.2 亿美元发展到 2018 年的 3000 亿美元，实现了互利合作的飞跃发展。

现在，中日两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不仅两国的经贸关系已经取得突破性发展，而且两国都在向地区和世界拓展。中国提出了“走出去”战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取得快速发展。而日本也在大力推进“走出去”战略，其目标是实现安倍内阁提出的“日本复兴计划”。

首先，设立各种机制来支持和保障日本企业向外部拓展。2013 年 3 月，日本政府设立了全面统筹和推进基础设施出口的最高机构——“经济合作与基础设施战略会议”，由内阁官房长官为议长，财务省、外务省、经济产业省等相关部门大臣为成员，综合规划日本基础设施出口、对外经济合作等重要事项。同年 5 月，该机构通过了“基础设施出口战略”，提出了将基础

设施的订单从 2010 年的 10 万亿日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30 万亿日元的总体战略目标。2014 年 10 月,日本国土交通省主持成立了“海外交通和都市开发援助机构”,由政府出资 585 亿日元,50 家日本企业参与融资,成为日本首个专门从事海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官民合资基金。其主要目标是为日本企业参与海外交通设施和城市建设的基建项目提供资金、技术、项目运营、人员派遣以及对外业务谈判等支持。2015 年 2 月,日本政府提出了 ODA 新大纲和新战略,并设立“日本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基金”,投入 1100 亿美元支持日本企业在海外开拓“高品质基础设施建设”,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和国际协力银行也全力以赴帮助和支持日本在海外的拓展与发展。

其次,日本经济界积极支持日本企业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2017 年 11 月,日本经团联会长榊原定征强调: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全球产业合作,对两国和世界的繁荣息息相关,两国以基础设施和环保领域为中心的企业合作有着巨大的潜力。驻中国日本商会于 2017 年成立了“一带一路联络协议会”,收集相关信息、聘请中国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从事“一带一路”相关业务的日企作为讲师举办研讨会,组织商会成员赴“一带一路”重点城市进行考察。2017 年 11 月,日本相关省厅发布了《关于在第三国的中日民间经济合作》的指南,并列出了可能的合作领域:1、节能环保、绿色电力开发 – 如太阳能、风力发电的开发和运营;2、产业化水平提升领域,合作建设工业园区等;3、中欧班列领域,改善在中国的日本货主、物流公司等利用中欧班列的制度,完善沿线国家的制度、环境等具体合作领域的指导性意见。

第三,日本企业更是先行先试,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抓住商机。例如,日本最大物流公司“日本通运”自 2015 年起就同中国铁路总公司合作,协助在华日企借助中欧班列开展通往中亚和欧洲的定期运输业务。2017 年 9 月,该公司宣布与哈萨克斯坦国家铁路公司合作,提供连接中日港口、中亚和欧洲的陆海联运服务。据日本媒体 2018 年 5 月的报道,日本通运公司已开通从日本经中国到欧洲的海路和航空运输服务,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使得覆盖亚欧的物流网得以形成,利用中欧班列可以将汽车零配件和电子设备运抵或销往欧洲的生产基地”,同时也扩大日企需求。在官方和民间交往的共同作用下,未来两国将进一步深化在中亚地区的第三方物流运输合作关系。

由此可见,中日两国共同向外开拓与发展成为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新特点,无论在东南亚、南亚或是非洲,都可以看到中日两国企业在热火朝天地进行高铁、工业园区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很大,投资市场广阔,完全容得下中国和日本。根据日本瑞穗研究所的估算,从 2015 年到 2025 年,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量将超过 14 万亿美元,到 2020 年,东亚所需的电力、通信、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占亚洲的比例普遍超过 50%。其中,电力和交通运输类基础设施需求最大,至少分别需要 2.3961 万亿美元和 1.2677 万亿美元。所以,只要中日两国携手共进、扩大和深化合作范围,那么不仅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注入新能量,而且对地区和全球的经济发展与繁荣也将带来无限的可能。

## 二、理性看待“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复杂性和两面性

虽然“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潜力无限、前景广阔,但在日本国内质疑乃至反对的声音依然不少,日本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内基础并不稳固,中方要充分认识到“第三方市场合作”可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首先,从日本政府层面来看,虽然安倍首相对于中国“一带一路”的立场有所改变,认为“一带一路”是具有潜力的构想,并提出了日本的“印太战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可以对接

的可能性。但是,他也多次强调与中国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必须满足四个前提条件,即“合作项目全面开放、具有透明且公平的采购程序、确保项目具有经济效益、不损害借款国家的财政安全”,并明确区分“第三方市场合作”与“一带一路”的不同。安倍首相在 2018 年 10 月访华结束后,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说:关于“一带一路”,包括日本在内,国际上有许多担心,所以我们同中方举办的是“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日本官员也多次强调,日方支持在第三方市场的中日民间合作,不等于参与“一带一路”。由此可见,日本政府从自身的地区战略出发,“以我为主”地推进与中国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并未附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其特点是确保合作的自主性、确保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其次,经济界被认为是推动中日新一轮合作的主要力量,但实际上即使在日本经济界内部,业务不同的企业对“一带一路”的参与热情也有很大差别。由于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常常面临投资周期长、收益低、风险高等特点,东亚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发展水平过低,无法为基础设施项目创造出相应的市场需求,从而令一些企业望而却步。例如,作为泰国“东部经济走廊(EEC)”重点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志性项目,就是将曼谷廊曼机场、素万那普机场和泰国东部的乌塔堡机场通过高铁进行对接,并以 1 小时连接全程 220 公里的铁路计划。该项目于 2018 年 3 月正式获得批准后,中国中信集团、日本伊藤忠商社和泰国正大集团签署了三方合作框架协议,但这一被普遍看好的三方合作项目最终因伊藤忠商社由于资金压力和预计“严重亏损将难以避免”等风险评估而退出。

第三,美国因素的影响。中日关系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他者”特性,美国一直是影响中日关系的最重要因素。特朗普上台后,日本经历了冷战结束后的最大风险。特朗普推行的“美国第一”战略、退出 TPP 和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令日本面临巨大压力。日美贸易顺差约达 690 亿美元,特朗普指责日本一直是美日贸易的赢家,要求签订双边贸易协定来消除贸易逆差。特朗普的施压政策迫使日本重新审视同盟关系,反思过度依赖美国的负面影响。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一是加快推动 TPP11 和日欧 EPA 等大型多边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主导了约占世界 GDP35%的两大自由贸易协定的诞生;二是推动由中日和东盟共同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三是改善中日关系,变竞争为协调,推进“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通过这一系列的反制措施,日本充当世界贸易自由化旗手的信心进一步加深。但我们也要冷静地看到,日本的最终目标不是与美国彻底闹翻,而是倒逼美国改变贸易孤立主义政策,迫使美国重返 TPP。对日本而言,如何维持和稳定对美经贸关系依然是日本对外政策的优先考虑,这一点并未改变。

由此可见,全球自由贸易协定正面临重新洗牌,日本的目标是通过增强外交的自主性来缓解外部压力,从而寻求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目前“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还处于起步阶段,走向良性合作的投资项目具体化的前景还不够明朗。中日两国如何发挥各自优势、避免恶性竞争,还面临很多问题有待克服和解决。有学者认为:相对于欧洲,亚洲的一体化仍然缺少以大国合作形成的中坚力量。根本改变亚洲的合作形态,改变亚洲在世界政治、经济 and 安全的未来结构中的地位,增进亚洲在全球和平进程中的作用,需要中日深化与发展合作。中日能否承担起重大责任,能否抓住新的机遇明确共同利益与责任,从而将“第三方市场合作”作为新时期中日关系发展的新起点,引领中日关系走向新的远航。

2018 年中日关系重回正轨,2019 年中日关系能否开启新的征程,令人瞩目和期待!

## ◆日方学者点评

### 一、川岛真 教授

中日双方在第三方市场合作，成为了 2018 年中日关系中的一个焦点，52 项合作今后的趋势，将会成为今后中日关系的风向标和试金石。但是，围绕第三方市场合作，中日双方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异，这会如何影响到这些计划的开展，仍然留有悬念。

从日本的观点来看，中日双方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基础，是 2017 年 6 月安倍首相在日本经济新闻社主办的“亚洲的未来”论坛的演讲。在演讲中，安倍首相对此前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进行了“修正”。安倍首相在演讲中提出了几个论点，显示出了日方的姿态，即如果能够实现开放性、透明性、经济学、财政健全性等国际标准的话，日本可以与中国合作。实际上，过去日本政府是将上述四点作为批判中国的重点，此次演讲只是更改了“表达方式”，即只要这四点可以解决的话，日本就能够与中国合作。2018 年 5 月李克强总理访日之际，安倍首相再次重申了这四点条件。当然，在同年 10 月安倍首相访华时，这四点又被提起。但是，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方面对这四点条件并没有显示出明确赞同的意思。而日本政府也在没有确认中方态度的情况下，开始了 52 项合作。日本政府将如何与中国处理这四条件，如何向中方要求实现四项条件，并检验落实四项条件，成为一个课题。如果四项条件被完全无视，那么就使得安倍政权对日本经济界和日本社会作出的说明与现实情况相差太大。

这个问题是国内问题，或者说不仅仅是中日关系问题。美国对中国展现了强硬的态度，并且在提倡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过程中，日本的对华政策被认为有“亲中”的一面。但是日本对中国提出了四项条件，并坚持反复地“干预”中国，并且这四项条件本身也是印太战略和一带一路之间合作的关键。也就是说，对于日本政府而言，是为了将中国限制在国际秩序中，并且让印太战略和一带一路不发生敌对冲突，才提出了这四条件。因此，这四条件如果在中日间不被重视的话，日本政府将会在美国以及印太战略相关国家面前失去信用。

综上所述，关于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中日双方的相互认识有偏差，并且考量不同。在调整这些差异点的基础上，如何推进计划的开展将会成为今后的焦点。

### 二、青山瑠妙 教授

本专题主要分析了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可能性，同时也指出了中日两国围绕“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合作存在的问题。

本专题认为日本抛开美国而推进的 CPTPP 其影响虽然尚不明确，但是对 RCEP 的缔结具有重要影响力。这和专题六有重合的部分，即中日两国在缔结巨型 FTA 的问题该如何更加接近。

如本专题所指出，“第三方市场”是 2018 年中日合作的一个重要关键词。同时也指出了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合作的问题点，即日本政府的四个前提条件，日本经济界对投资收益的担忧以及美国方面的影响，笔者认为这是十分中肯的见解。

当然“日本政府的四个前提条件”与“日本经济界对投资收益的担忧”二者互为表里。如果这一对互为表里的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那么中日两国在第三方合作的前景将会更加宽广。

### 三、加茂具树 教授

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

①在讨论“第三方市场合作”之际，应提及 2018 年 5 月在日本外务省、经济产业省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签署的《关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中并没有“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一带一路”等表述。(其正式理由并不为人所知),但这显然是日中两国政府有意为之的结果(两国政府决意实现第三国合作)。因此,应就此说明备忘录的意义。

②此外,2018年10月,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确认,两行应开展合作,在日中两国企业参与或涉及的第三国项目中,在开展金融援助时遵循开放性、透明性、经济性、财政健全性、合法合规等国际标准。由此可以期待包括“第三方市场合作”在内的日中合作的新的可能性。本报告或许也应对此有所提及。

## 附 录

### (一)课题组成员简介与分工:

胡令远: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中日关系、文化·文明与国际政治;课题组协调人、总论、统稿。

川岛真:东京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中日关系、国际政治;课题组协调人,总论、统稿。

臧志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日本政治、中日关系;总论,统稿。

加茂具树: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中日关系、中国政治。

青山瑠妙:早稻田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中日关系、中国外交。

武心波: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中日关系、国际关系理论;总论二。

冯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日本历史、中日关系;总论三。

王广涛: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青年副研究员;研究领域:日本政治、外交;专题一。

汪鸿祥:创价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中日关系,日本政治;专题二。

江新风: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研究领域:日本安全保障、中日关系;专题三。

高兰: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日本外交、中日关系;专题四。

宋志勇: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中日经贸关系、日本经济;专题五。

贺平: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区域经济合作;专题六。

包霞琴: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日本外交、中日关系;专题七。

### (二)几点说明

1、本报告书及《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趋势——多层面和中长期战略的视角》、《中日关系:2015》、《中日关系:2016——低位徘徊与嬗变》、《中日关系 2017—战略对峙中的转机》之版权属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2、报告书均载于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jsc.fudan.edu.cn>)。

3、如有引用,请务必注明出处。

4、本报告书日方学者的点评系由日语撰写,川岛真教授所撰部分由徐伟信翻译,加茂具树教授所撰部分由贺平翻译,青山瑠妙教授所撰部分由王广涛翻译。

5、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服务中心陶韡烁主任、课题组秘书王棣助理研究员参与了本课题报告的统筹。

6、对报告书如有垂询,请与课题组负责人胡令远教授联系:lyh@fudan.edu.cn。

(下转第 62 页)

# 安倍政府非洲外交研究

## ——基于现实主义的理论视角

寇建桥

**内容提要** 安倍政府上台后,以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为平台,高度重视并全面参与非洲事务,从政治拉拢、经济渗透、对中国“再平衡”等多个维度对非洲国家展开全方位的现实主义外交。安倍政府调整对非外交有着深刻的政治图谋,但是日本对非洲的关注具有短期的功利性,并无源自自身、发自内心的长期持续关注的动力,致使其外交战略及相关政策不可避免地陷入现实主义泥潭。

**关键词** 安倍政府 对非外交 现实主义

近年来,日本对非外交已成为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重要抓手,在日本对非外交的初期,主要考虑的是经济因素,且日本并未将非洲纳入重要外交对象。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73年的石油危机。这次危机使日本认识到非洲能源的重要性,显著提高了非洲在其能源战略中的地位。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政治大国”目标的提出,日本的对非外交已不再局限于能源、市场等经济因素,而是将其进一步纳入了“政治大国”战略的外交框架。

安倍政府上台后,日本借助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平台,高度重视并全面参与非洲事务,展开了价值理念和实用主义相结合的全方位外交,以助其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基于这一考虑,安倍政府通过政治、经济、制衡中国等多个维度对非洲国家展开了现实主义外交。日本对非外交的这一发展进程,归根结蒂是源于本国经济利益及政治目标的驱动,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

### 一、现实主义外交的概念

斯巴克曼提出,权力之争是“世界政治的核心内容”。<sup>①</sup>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最重要的现实主义著作当属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一书,他在这本书中指出,外交可以视为缓和、抑或是最小化国家间政治冲突的工具。<sup>②</sup>摩根索提出了“现实主义六原则”,此后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诸流派中长期占主导地位。他认为,人类对权力的追求是由其本性决定的,这种对权力的无限追求也导致了世界政治的混乱结果。可以说,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把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到了20世纪70年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现实主义开始崛起,“新现实主义”这一称呼是其批评者之一罗伯特·考克斯第一个提出来的。<sup>③</sup>“为权力而斗争”的现实主义在解释国际关系方面明显不足,于是,“结合权力斗争和世界秩序的新现实主义必定会出现”。<sup>④</sup>詹姆斯·多尔蒂和罗伯特·法尔兹拉格夫提出了新现实主义的四个特点,是一种综合性的理论。<sup>⑤</sup>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始于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在这本书中,沃尔兹提出,要把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区分开,他的结构分析强调“国家构成结构,结构造就国

家”。<sup>⑥</sup> 沃尔兹认为,国际政治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而国内政治体系则具有一定的等级制,这导致一国基于自身安全考量采取的行为虽然是为了生存,但是却在无形之中降低了其他国家的安全。

华尔兹认为,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最具代表性的两种理论,他为现实主义提供了一个更有力的理论基础。沃尔兹认为,国家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以及最重要的行为体,权力结构影响了国家的行为。这些理论对解释当代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戴维·鲍德温认为,沃尔兹的理论奠定了“新现实主义的基石”。<sup>⑦</sup> 结构现实主义“提供了全面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sup>⑧</sup> 著名学者保罗·施罗德指出,虽然现实主义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仍然占据着支配地位,但是以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则被认为是在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基础上取得的最新的重大发展。<sup>⑨</sup> 作为一种理论思潮,新现实主义在 80 年代发展得很迅速,“席卷了国际关系理论领域”。<sup>⑩</sup>

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实力在一国外交中起着直接推动力的作用。无论是小泽一郎的著作,还是日本《外交蓝皮书》中关于日本地位和责任的论述,以及安倍推出的“积极和平主义”,都主张日本应该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而在论证这一主张时的最基本理由都是,日本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sup>⑪</sup> 可以说,一部日本外交发展史就是日本国家实力变化的历史,日本正是基于国家实力的变化而不断对其外交行为进行调整的。二战后日本背负着战败国身份,在各方面对美国言听计从,对美国在联合国采取追随态度;随着经济实力的恢复,日本经济地位大大崛起,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成为西方经济的“火车头”之一,日本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之后,在国际上影响力越来越大,跻身主要发达国家之列,正是基于国家实力的变化,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了成为政治大国的目标,其中对非外交也成为其实现政治大国地位的重要一环。

日本的对非外交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在国际政治中,国家利益是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日本的对非外交并不是自古有之,而是在二战结束后开始建立并逐步发展起来的,而且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与要求。之所以具备一些阶段性的特点,主要是由于日本国内外的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国家利益的考量是最重要的因素。日本的对非外交政策之所以日益加强,其目的性非常明显,这其中包括了资源、市场、政治等各方面因素的考虑:日本既要从非洲获取石油等能源,又要在非洲开拓国际市场,还希望获得非洲的支持以助其实现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目的,并最终实现其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

基于前文的现实主义分析,本文以日本安倍政府对非外交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剖析其现实主义独有的实用主义和逐利特征,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地缘政治等重要因素的考虑,认为其对非外交是实现其政治大国地位的重要抓手。在日本对非外交中,安倍政府的积极和平主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二、安倍政府对非现实主义外交的展开

安倍晋三再次担任日本首相后,高调祭出“积极和平主义”大旗,引起世界高度关注。日本的对非政策也是一个全方位的综合战略,政治上通过举办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扩大对非话语权;经济上通过政府开发援助、投资贷款等形式加快对非洲地区的渗透,日本还在维和、教育、环保等领域采取多种形式,树立在非洲的良好形象。此外,日本对非外交还有着制衡中国在非

洲的影响力的考虑。

#### 1. 日本对非洲的政治拉拢

冷战结束后,日本借助欧美国家对非洲态度冷淡的时机,大力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外交,将非洲作为其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以扩大其国际影响。日本认为,非洲是其“外交的资产”,因为在联合国当时的所有 192 个成员国中,非洲国家数量占了 1/4 以上,而且当时的多种世界性难题,诸如南北问题、地区争端问题、贫困问题等均集中在非洲,日本希望在非洲外交的过程中对这些问题有所作为,这样就可以在非洲国家乃至全世界面前提升自己的形象。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对非洲外交进行了重新评估与定位,在之前经济外交的基础上增加了“大国外交”的政治意味。不仅如此,日本还主办了“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TICAD),日本的非洲外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安倍政府上台后,在政治领域主要通过首脑外交加强政治联系。日本外务省为了创造专门的非洲外交窗口,增设了“非洲审议官”一职,专门负责对非外交。日本对非洲的战略地位如此重视,被外务省官员称为日本外交的“新开端”。安倍政府之所以重视非洲外交,与日本提升全球影响力及国际地位,与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密切相关。安倍政府积极宣扬日本在解决非洲贫困问题上的决心,加强同非洲国家的感情联络。日本又向非洲派出选举监督员,出资选举管理费,介入非洲民主化进程,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同时,安倍政府积极借助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提高日本对非洲的影响力。2013 年 6 月初,在横滨举行了第五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此次会议主题为“与更具活力的非洲携手”,议题包含三项主要内容:一是推动经济发展要保证健全与可持续原则,二是构建有活力的、平等包容的社会,三是国际环境实现和平及稳定。据此提出了七项具体措施,体现在两个成果性文件中,一个是《横滨宣言 2013》,另一个是《横滨行动计划 2013-2017》。

2016 年 8 月,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在东非国家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这也是该会议首次在非洲举办。安倍首相亲赴内罗毕出席会议。安倍在本次会议中表示:“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是日本与非洲的共同目标。”非洲国家在联合国会员中的比例超过四分之一,2002 年非洲联盟成立后,非洲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日本显然是想通过赢得非洲支持,塑造“政治大国”形象,进而推销日本价值观与发展模式,为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拉拢人心。在主旨演讲中,安倍还提出要与非洲在海洋安全问题上合作。以反海盗为由,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吉布提建立了海外首个据点。安倍政府打着“积极和平主义”的幌子,本质上就是要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谋求成为政治军事大国。

#### 2. 日本对非洲经济援助的渗透

冷战时期,日本与非洲的关系主要是以经贸关系为主,日本也只是把非洲作为其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冷战结束之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的意识不断增强,不再满足于过去充当国际社会的配角,努力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非洲对于日本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非洲在日本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和分量有了显著提升。日本提升非洲地位的一个重要手段和途径就是加大对非洲的经济援助力度,增强日本在非洲的影响力。从现实主义视角来说,日本所采取的对非政策从根本上是服务于本国的国家利益的。

在 2013 年 6 月举办的第五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日本公开承诺将在未来五年内投入 140 亿美元用于对非洲国家的 ODA 援助,其中用于水电建设、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金额为 65 亿美元,用于贸易与投资的金额为 65 亿美元。日本宣布将改善非洲投资环境,扩大在

非洲的贸易领域,将在农业、能源、制造旅游业等更广泛领域扩大投资;同时注重人员培训,将成立 TICAD 产业人才培养中心,在非洲国家开展广泛的培训工作,完成 5 年内培训 3 万人的计划。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日本又宣布未来 3 年将向非洲投资 300 亿美元,其中 100 亿美元将投向与非盟合作的基础设施项目。安倍首相表示,这一投资是对非洲未来的信心,会议期间日非签署了 70 多项合作协议。

迄今为止,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历经 20 余年的发展,共举办了 6 次,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形成了对非援助的长效机制,在日本的外交战略中意义重大。日本通过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让世界关注非洲发展,形成了日本特色的国际 ODA 援助范式,使得对非洲国家的国际援助摆脱了“华盛顿共识”中所形成的以贷款为条件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模式。同时,日本外务省在《国际合作大纲》(2015 年 2 月颁布)和多期《外交青书》中强调,日本会继续把非洲地区作为国际援助的重点地区,会继续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作为非洲发展最高级别国际论坛加以推进,在此基础上与非洲国家积极开展外交活动。<sup>⑫</sup>

可以看出,安倍政府上台之后,日本在经济领域加快对非外交步伐。日本对非援助的形式主要包括无偿援助、日元贷款、派遣海外合作志愿者等。通过国际援助,日本在非洲经济、环境、人才培养等各方面施加影响。日本大幅提高对非援助额度,同时增加日元贷款项目,从经济上增加非洲对日本的依赖程度。

### 3. 日本对中非关系的“再平衡”

冷战结束以后,中国与非洲加强往来,经济、政治活动均有增加,这个现象被西方学者描述为非洲大陆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事情。<sup>⑬</sup>中非合作论坛始于 2000 年,据说中国当时受到了日本从 1993 年开始举行的非洲开发会议的启发,然而其存在感和影响力现已远远超过老牌的日本。日本不甘于落后中国的步伐,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的同时又在效仿中国。为了超越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日本政府力求使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在规模和内容方面超越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第五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日本仿效中国将召开的周期改为每三年一次,2016 年第六届会议的地点也改在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

安倍政府对非现实主义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内现实主义政治思潮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安倍提出的“积极和平主义”理念,存在着“利益至上”和“实力支配主义”的现实主义思想。同时,安倍政府的战略目标不单纯在于谋求维护和扩大日本在非洲地区的现实利益,更意图在非洲地区建立起高于中国、有自己现实主义利益诉求的基本战略目标。基于日本在非洲地区的利益诉求,安倍政府采取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维度对中非关系采取“再平衡”战略。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日本现实主义外交的出发点存在严重扭曲,日本对非外交的意图过于明显,且日本外交存在着不够独立自主的天然缺陷,导致日本自身的战略视野存在一定局限,使安倍政府意图将非洲变为牵制中国的基本设想不切实际。可以说,日本对非外交短期内虽然会取得一定成效,但从长期来看,安倍对非外交很难从根本上超越中非外交。

## 三、安倍政府调整对非外交的原因

安倍政府上台后,日本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加强与非洲的外交力度。总结起来既是受到国内政治因素制约,又是受国际环境的影响;既是出于帮助非洲发展的人道主义考虑,同时又有获取能源和市场的利己主义因素;既是配合西方国家的要求而加强对非外交,又是出于自身

与中国、印度等国争夺外交资源的需要。纵观日本对非外交政策的发展历程,无不体现了现实主义外交的决定性影响。根据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理论,“政治权利实际上很可能是经济实力所赋予的。在和平年代,大国间不再倾向于以军事冲突解决国际问题,则国家的国际地位的高低将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实力的强弱。”<sup>④</sup>

### 1.“政治大国”权欲进一步膨胀

日本力求通过加强非洲外交,摆脱其战败国地位的制约,在国际上获取更多的话语权,为实现其“普通国家”和“政治大国”的政治目标添砖加瓦。日本在冷战时期大力发展经济,其经济实力达到了可与欧美齐头并进的地位,但其国际影响力相对较弱。80年代起,日本在外交策略上便加入了增强政治力量的目的性;但冷战时期由于受制于特定的国际环境,如东西方对峙、美苏争霸等,日本很难将这一诉求付诸实践。

安倍政府上台后,日本面临的国际局势也发生了巨大改变,日本加强政治力量的欲望随之膨胀,更强烈的希望获得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政治大国”形象。日本外务次官栗山孝和早在90年代初就发表了关于日本未来外交战略的言论:“今天的日本,应该以自身的经济实力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为自己的繁荣和安全提供保护力量。鉴于此,日本的外交应向大国外交转变,而不是局限于中小国的身份。”<sup>⑤</sup>安倍政府上台后,推行积极和平主义和“俯瞰地球仪外交”,日本的外交便不再受制于冷战期间的外交框架,而是试图实施“大国外交”战略,为其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服务,对非外交便是其中的重要部分。非洲对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目标有潜在的价值。安倍政府对非洲的重视,固然有表面上的经济动机的因素,但其中所包含的政治图谋也是显而易见的。<sup>⑥</sup>

### 2.应对非洲自身外交政策调整的需要

非洲人口众多,有相当大的市场潜力。进入新世纪后,非洲政局趋于稳定,经济状况趋于好转,非洲国家逐渐意识到要加强自身的稳定和发展。这些都预示着非洲经济的增长有可能进入一个全新状态。首先,俄罗斯不再参与非洲事务,美英法等大国对非洲也较为冷落,国际上对非洲的政治干预几乎出现真空,安倍政府抓住这一时机加强对非洲的外交,增强其在非洲的影响力。其次,日本身为西方联盟成员,美国希望它在国际社会能够承担更多的责任。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初期,美国不再有热情关注非洲政治。因此美国希望日本能够对非洲国家在政治及经济上予以关注和支持。再次,非洲国家也希望与日本增强外交往来,安倍政府对非洲外交政策的调整,也是作为对这一要求的回应。

非洲国家对日本的期望包含如下几个方面:(1)希望日本对其施以国际援助。日本在实行国际援助方面与欧美国家不同,欧美国家在实行对非洲的援助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均会有较为苛刻的附加条件,而日本在这方面则较为温和。(2)争取日本的投资。非洲的债务压力较大,经济发展力不从心,非洲国家普遍希望通过吸引外国投资来刺激本国经济的发展,日本是其所要争取的目标之一。(3)与日本加强贸易往来,扩大贸易规模,尤其是增加对日本的出口。

### 3.日本“入常”需要非洲国家的支持

安倍政府不断加强非洲外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其内在的政治、经济动因。经济方面,日本一是希望从非洲获取丰富的自然资源,二是希望在非洲开拓国际市场;政治方面,非洲在联合国中的成员国数量众多,若获得非洲支持,则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愿望将更容易实现。这也是安倍政府加强非洲外交的最主要驱动力。

日本于1991年顺利当选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1992年日本即对42个非洲国家进行了援助。在加纳、肯尼亚、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日本是它们最大的援助国。1994年日本申请入常,有41个国家持支持态度,这其中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占了26个,都是当时日本施以国际援助的对象。日本外相曾对媒体公开表示:“非洲的发展与日本的安全和繁荣关系尤其密切,因此日本应在非洲的发展过程中以大国身份发挥作用,以承担其大国的责任。”<sup>⑩</sup>安倍在第六届非洲发展会议中表示:“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是日本与非洲的共同目标。”非洲国家在联合国会员中的比例超过四分之一,2002年非洲联盟成立后,非洲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有日本领域研究学者明确指出,日本显然是想通过赢得非洲支持,塑造“政治大国”形象,进而推销日本价值观与发展模式,为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拉拢人心。

对安倍政府来说,日本在联合国的地位和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受日非关系的影响,日非关系成为日本能否成功“入常”的重要因素,在日本“入常”之路上的作用非常重大。因此,安倍政府将是否支持其“入常”作为在非洲选取援助对象的重要参考条件之一。日本希望通过在非洲国家加强经济援助,在联合国大会上得到他们的支持,以达到加入常任理事国的目的,为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铺平道路。

#### 4. 在非开展意识形态外交的需要

冷战后,日本开始将意识形态因素和政治民主化思想加入对非援助的内容。日本列出4个基本条件,以此作为是否批准援非项目的标准,其一是有利于环保,其二是发展市场经济,其三是经济援助不用作军费,第四就是实现政治民主。不过,与欧美国家相比较,日本这种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表现出了一定的心理矛盾性和手段的两面性,即其态度相对温和且手段并不强硬,这表明日本在拉拢非洲国家支持其战略目标的过程中,既有强烈的愿望,又因担心得罪非洲国家而表现得小心翼翼。

日本还颁布了《政府开发援助大纲》,提出政府开发援助的四原则,明确规定在国际援助的实施过程中应注意在发展中国家引入市场导向型经济,助其促进民主化进程,并关注其在自由和基本人权保障方面的状况。<sup>⑪</sup>因而日本对非洲并不是单纯进行经济援助类的交往,而是经常有意识地向非洲国家宣扬其价值观,从意识形态层面增强其国际影响。安倍政府认为,非洲的落后问题根深蒂固,不可能仅依靠经济援助来解决。若要使非洲摆脱长期落后的状况,必须在政治制度、经济政策两个方面做出根本改变:政治上须实行民主化建设,建设良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规范;经济上则须以市场为导向,建立市场导向型经济政策。如此才是解决非洲国家贫困落后问题的关键所在。

## 四、安倍政府对非外交的前景分析

冷战结束时,日本意欲借助联合国为跳板,通过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并进一步实现其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而当时非洲由于在联合国中占据的席位数量众多,需要非洲的选票支持才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出于这种功利目的的逻辑,非洲开始备受日本的关注,日本开始通过增加援助、强化维和行动等积极参与到了非洲事务中。日本对非洲的关注具有短时期的功利性,并无源自自身、发自内心的长期持续关注的动力,致使其外交战略及相关政策不可避免地陷入现实主义泥潭。

第一,日本对非外交难以摆脱“日式发展模式”的继承性。日本希望借助非洲平台推广其经济发展的“日式发展模式”。日本非常为“日式发展模式”在本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而感到自豪。日式发展不仅是日本提高经济水平、增强经济实力的基础,也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自信,甚至可以说是其国家自信的根源。在欧美的长期援助下,非洲国家并未获得多大发展,日本从这里看到了推广日式模式的机会,有意将非洲发展为日式模式的成功案例。一旦这个目标得以实现,则日本就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发展经济的普遍可行的模式,这在一心想要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日本看来可谓机会难得。在“入常”的诉求下,日本急于展示其在联合国的人员贡献,应欧美的要求派遣人员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然而由于和平宪法的限制,同时和平主义在日本社会根深蒂固,因此日本不可能在短期内通过派遣自卫队参与国际维和来做出巨大贡献,人员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只是辅助手段,相对来说“援助”手段则更为擅长,日本仍需要借助经济援助来参与和推行非洲事务。在实践中,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是日本推行对非事务的主要平台。但日本在非洲投入的国际援助从金额上来看与 1980 年代相比并无质的提高,而是将“日式模式”的正确有效性当成重点而加以大力宣传。其在非洲的投资力度和贸易规模也没有提高。一向以“援助、投资、贸易三位一体”为特色的日式援助在非洲并无体现。

其次,日本对非外交难以解决政治互信的桎梏。日本与非洲的外交在人员往来方面非常薄弱,表现在高层互访上也不积极。政局的不断变化,使得日本在客观上也难以将官方出访非洲形成惯例。进入 21 世纪之后,日本相继有十几个首相就任,但只有森喜朗、小泉和安倍等三任首相对非洲进行过国事访问。另外,日本与非洲之间在政治上互相不信任,高层领导之间没有形成个人友谊,在这个层面上,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具有明显的弱势。安倍政府推行“积极和平主义”和“俯瞰地球仪外交”,将实现“普通国家”作为其政治大国化的路线,而“入常”也成了“普通国家”化的手段之一。以反海盗为由,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吉布提建立了海外首个据点。安倍政府打着“积极和平主义”的幌子,本质上就是要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谋求成为政治军事大国。更值得注意的是,安倍在演讲中称,印度洋、太平洋连接亚洲和非洲,日本有责任推动两大洋成为“航行自由、尊重法治”的地区。事实是,多年以来,这个区域的航行自由从来没有问题。所谓“百巧输一诚”,非洲国家不欢迎强加的意愿,也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合作。

第三,日本对非外交充分反映出其整体外交战略的争议性。对非外交作为安倍政府整体外交的一环,由点到面地反映出其整体特征,无法摆脱现实主义外交“逐利”的基本属性,这也决定了它的对非外交同样难以回避争议性的束缚。尽管日本加强对非合作声势很大,但实际实施中仍存在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政府财政资源有限、日本企业对非投资意愿不足等诸多问题。且日本援助非洲的方式不受欢迎。日本对非合作深受西方国家援助思维的影响。由于援助往往与受援国国内政治问题挂钩,受援国对此多有不满。这样的援助往往不能符合受援国的实际需要。此外,由于安倍政府的对外战略及相关政策存在诸多的争议性,致使外界难以对其做出较高的客观评价,甚至也很难认可其部分的所作所为。可以说,安倍政府的现实主义外交在非洲并没有形成普遍共识,非洲国家对日本政府有条件的外交合作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性。

最后,日本对非外交难以摆脱现实主义的自我中心性。安倍政府外交政策最为显著的特征,也是现实主义外交最为直接的基本特征就是自我性或称自我中心性。地缘政治、经济逐利、政治大国诉求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促使安倍政府高度重视非洲关系。如前所述,安倍政府对

非外交的重要觊觎之一就是经济援助,希望扩大在非洲的政治影响,争取非洲国家支持其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进而谋求政治大国的目标。不仅如此,安倍政府更希望借助非洲政局不稳的时机,不顾国内、国际和平力量的反对,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第九条的限制,强行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等,加快向海外派兵,谋求成为军事大国目标。

注 释:

- ①Nicholas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Harcourt Brace, 1942, p.7.
- ②汉斯·摩根索著,肯尼斯·汤普森改编:《国家间政治:为了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孙芳、李晖译,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385页。
- ③Robert Keohane,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6.
- ④Stanley Hoffmann, “Re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Atlantic Monthly*, November, 1985, p.58.
- ⑤James Dougherty and Robert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gm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p.552.
- ⑥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99-102页。
- ⑦David Baldwin,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3.
- ⑧James Dougherty and Robert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gman, 1997, pp.87-88.
- ⑨Paul Schroeder, “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1994.
- ⑩Robert Keohane eds.,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9.
- ⑪俞正梁等:《大国战略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196页。
- ⑫<http://www.mofa.go.jp/files/000067701.pdf>, MOFA, 2005, Cabinet decision on th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Charter, p.8. (2019年3月22日上网)
- ⑬张宏明主编:《非洲黄皮书 2012 非洲发展报告 No.14(2011-2012)》,《新世纪中非合作关系的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
- ⑭白如纯、吕耀东:《日本对非洲政策的演变与发展——以“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为视点》,《日本学刊》,2008年第5期。
- ⑮Deinhard Drifte, *Japan'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 From Economic Superpower to What Power?*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p.114.
- ⑯钟伟云:《日本对非援助的战略图谋》,《西亚非洲》2001年第6期,第17页。
- ⑰曾强、余文胜:《冷战后日本对非洲政策的调整变化》,《国际资料信息》,2000年第8期,第5页。
- ⑱金熙德:《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页。

(寇建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胡令远)

# 西方的冲击与中、日两国的回应

## ——基于 17-18 世纪“中国礼仪之争”背景下的研究

孙钰欣

**内容提要** 早期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间的利益争夺逐渐拓展到东亚,并且主要的正面冲突更多围绕宗教展开。作为回应,中、日两国都采取了“禁教”政策,但是在对待西方的思想、尤其西方权力对东亚秩序的冲击的具体回应上存在差异。本文从传统东亚国际秩序变迁与“割裂”出发,挖掘“中国礼仪之争”背后的“利益之争”本质并基于此对中日回应政策进行比较分析,讨论产生这种不同的原因及对东亚国际秩序带来的冲击。

**关键词** 中国礼仪之争 禁教锁国 东亚国际秩序

### 一、导 言

“中国礼仪之争”是指 17-18 世纪在华传教士围绕中国信徒的祭祖、敬孔、译名等“礼仪”问题展开争论。<sup>①</sup> 清朝康熙帝在礼仪之争之后下令禁教,于 1717-1840 年全面实行闭关锁国,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百年禁教”。日本从 1614 年开始了第二次全面禁教,并且在 1633 年到 1639 年连续下达五道“锁国”令,早于中国开启了禁教政策。19 世纪中期,中日两国的禁教锁国政策均被西方国家以“武力”的方式终结,并且走向“开国”。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冲击下,日本进行明治维新建立起了近代资本主义,并开始挑战中国:传统东亚国际体系的中心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从国际体系视角来看,“礼仪之争”不仅是西方国家内部的宗教教派斗争,还是海外商贸利益、西方国际体系对东亚国际体系影响力上的争夺。其中,1793 年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以英国特使身份来华,就发展中英关系和扩大对华贸易与清朝展开谈判,双方在“觐见礼仪”问题上展开争论,最后这场“礼仪之争”以马嘎尔尼的无果而返结束。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宗教之间的争夺,其背后的实质“利益之争”在“中国礼仪之争”中有着很好的体现。

为什么在同一时期东、西国际秩序相遇的历史氛围中,西方国家在东亚开展利益争夺,对此中日两国都采取了相似“禁教”、“锁国”等政策回应,却有着不同的结局? 首先,需要探讨和明晰中日两国在“中国礼仪之争”背景下的回应具体有什么不同。其次,基于此追问为什么中日面对西方而来的权力冲击会存在不同的回应。因此,本文将比较中、日两国在此事件背景下对待西方的态度及具体回应,并对费正清等学者提出的“冲击-反应”分析框架进行调整,解释两国提出实质上不同的“禁教锁国”政策背后的机制。

## 二、文献综述

早期围绕“闭关锁国”对中日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多落脚于对中国闭关自守导致落后的结论,并没有对中日看似相同回应下的实质不同进行分析。对“中国礼仪之争”背景下的中日回应研究,学者们分别从历史文化、宗教与政治、国际关系等视角展开研究。

以李天纲为代表的学者从历史学视角出发,围绕“礼仪之争”的核心主题:天主教礼仪与中国传统礼制如何妥协展开研究,并介绍了西方思想界学者的研究成果。<sup>②</sup> 在李天纲看来,中国统治者面对“礼仪之争”的思想经历了从“为我所用”,到当北京成为礼仪之争的中心之后,开始排斥并禁教的过程。<sup>③</sup> 此类研究关注到了中国国内政治因素对“礼仪之争”的回应,对中日的比较分析具有借鉴意义,但是在解释东亚普遍范围内基督教的传播中有所欠缺。

随后,不少学者将“礼”与权力联系起来。学者吴莉苇提出关注到礼仪本身与权力的关系,<sup>④</sup> 就西方传教利益为核心展开讨论。学者赵德宇侧重分析了日本封建统治者与天主教势力冲突的国内因素,认为日本“禁教”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外来文化的取舍是统治者的“专利”。<sup>⑤</sup> 学者毕敬关注到了礼仪之争背后的利益之争,并从决策高层出发,指出中国对于西方输出宗教和文化的“器用”诉求,认为中西之间存在利益收获逆差,因此礼仪之争中,禁教结局发生在中国存在必然性。<sup>⑥</sup> 以上学者都关注到了权力与国家利益之间的联系,并为对中日进行比较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但是在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同时,忽视了国家本身在东亚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以及与东亚其他国家间的互动。

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费正清学者分析中国在应对东、西国际体系“首次相遇”事件中的回应,开创了“冲击-反应”作为分析近代中国架构的核心,他认为原先静止的中国是在西方社会的冲击下形成自己的身份并加入国际社会。<sup>⑦</sup> 该模型包含假设:一旦中国的传统制度发展定型后,就产生很大的稳定性,只有在外部作用下才会发生变化。中国长期处于闭关自守状态下,并没有能力积极应对西方的冲击。<sup>⑧</sup> 该框架因为将中国看作静止的实体,并没有考虑中国的内部因素。学者宋念申在分析“礼仪之争”的背景——东亚的区域权力格局时,批判了费正清的“西方中心主义”,并将分析的核心对象放在了中、日、韩三国,认为东亚三国并非静止等待西方权力的冲击,而是自身发展着东亚国际秩序。但是宋念申也将传统东亚国际秩序做了“去中心化”分析,认为17世纪起,东亚的“中华”意识形态与“天下”格局就开始分离:“天下作为一个多元化的帝国和世界秩序,不再需要明朝意义上的‘中华’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边疆和周边各个政治体可以用自己理解的方式,参与到这个‘天下’中。”<sup>⑨</sup> 但是这种完全的“去中心主义”忽视了当时东亚国际秩序维持稳定的现状。不能解释在东亚各国实际上存在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上的互动。

学者但兴悟分析了马嘎尔尼访华事件,认为觐见礼仪发生的争执代表了近代民族国家体系和朝贡体系之间的冲突。<sup>⑩</sup> 何伟亚指出,“马嘎尔尼事件并不是文化间冲突,而是帝国建构的冲突。”<sup>⑪</sup> 但是这种体系的分析视角,没有具体区分体系内部不同国家的特殊性,因此无法解释同作为东亚国家,日本与中国走上不同结局的原因。

对于东亚的中、日两国在具体政策上存在的差异及背后的原因。葛兆光学者以“黄嗣永帛书”为中心,同属于“东亚”的中、日、朝三国在政治结构、社会、宗教上存在差异,并认为传统东亚国际秩序因西洋因素而变得复杂和交错。<sup>⑫</sup> 给本文的分析框架提供了一定的启发。本

文将在调整后的“冲击－反应”的分析框架下,比较分析中、日两国在具体回应“礼仪之争”政策和表现的不同,并且从国际关系视角探讨背后的原因。

### 三、比较研究:礼仪之争背景下中、日的回应

尽管“礼仪之争”发生在中国,但是其不同阶段均是西方势力对东亚利益争夺的具体体现。从“禁教”的结果上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均感受到了这种“冲击”,并且对其做出了“反应”。同时,作为主动带来“冲击”的西方,欧洲国家间也在发生着权力争夺与西方国际秩序的变迁。

可以看出,西方国家间内部的斗争变迁,也影响着他们在东亚的利益争夺。从宗教上来看,新兴英、荷新教国家就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西、葡老牌殖民地国家在东亚的传教以及背后的商贸利益。(见表 1)

表 1 “礼仪之争”背景下中、日、欧洲大事年表

年份	欧洲	中国	日本
1610 年	1602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	礼仪之争在中国拉开序幕	派田中胜介交涉与新西班牙(墨西哥)通商事宜
1618 年	1618 年欧洲开始 30 年战争	处于 1616 年反教运动余波中	1618 年下令禁止利用通商传教
1623 年	荷兰西印度公司获取并经营新尼德兰	/	禁止葡萄牙人定居日本
1630 年	1633 年宗审判中,强制伽利略废除地动说	1632 年多明我会士到达中国福建福安	发布禁书令, <sup>③</sup> 禁止含耶稣教书籍入境(包括中译书籍)
1639 年	1642 年,荷兰人将西班牙人逐出台湾	多明我会黎玉范对耶稣会提出质疑	发布第五道锁国令,驱逐葡萄牙人、传教士;日本锁国体制大致完
1648 年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1644 年清军入关	1641 年“荷兰风说书”开始
1720 年	/	嘉乐来华与康熙禁教	与基督教无关的汉译西书进口解禁
1793 年	巴黎人民起义推翻吉伦特派政权	英国使节马噶尔尼使华	1794 年俄罗斯进驻得抚岛,兰学家组织新元会,庆祝公历新年
1796 年	拿破仑远征意大利	清朝禁止进口鸦片	英国探险船来虾夷
1825 年	沙皇尼古拉一世继位;英国修建第一条铁路	/	西博尔德在长崎东郊开设兰学塾,幕府发布外国船驱逐令
1842 年	英国宪章运动爆发	中英鸦片战争签订《南京条约》	幕府允许向外国船只提供燃料和水
1853 年	克里米尔战争	太平天国占领南京	美日“黑船事件”
1868 年	普鲁士在德国进行统一战争	浦安臣率“中国使团”出访	日本明治维新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材料整理<sup>①</sup>

西方国家在东亚地区的传教，根本目的是希望从思想和信仰层面上对东亚各国施加政治影响力，扩大在这些国家的利益，特别是西方国家内部发生的宗教势力争夺，对东亚国家中日带来了不同程度上的冲击。

宗教的传播还伴随着更为显著的西学技术、商业贸易等其他形式的交流。因此在“礼仪之争”的背景下，比较两国应对“禁教”的具体不同政策与表现，切入点应该分别为：中日两国在传教西学思想、商贸政策上的不同、两国对外部威胁的认知和应对。

#### （一）中日对西学思想的回应

其一，中日知识分子对本土儒学文化和作为西方外来的宗教之间的心态存在差异。

在中国，耶稣会士在礼仪之争中，曾向中国奉教士大夫了解他们对礼仪之争的看法。中国士大夫的态度为：要明断中国事，必须详查中国书籍，并且认为“风土人情，理体文章，迥然相殊，不能强合。未可以掉三寸之舌，遽欲变中土为西洋也。”<sup>⑤</sup>而日本在看似比中国更早更激烈的“禁教”政策下，还是存在“平静中的潜流”<sup>⑥</sup>在幕府开辟的长崎一港中“一部分信徒制作有关基督教信仰的作品，不能认为长崎人从心底抛弃了对基督教信仰……可以说幕府的禁教令距离具体的实施相去甚远。”<sup>⑦</sup>

相比之下，中国的奉教士大夫在宗教和儒学之间心态较为复杂，他们在忠于外来信仰的神圣性同时，捍卫儒家思想正统性。可以看出，儒家礼制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比日本知识分子心中更为根深蒂固。

其二，中日统治者的“禁教”态度存在不同。

礼仪之争中表面上不同修会之间的矛盾还是其背后国家之间的矛盾，为了各自的利益勾心斗角，葡萄牙当局把法国人传教的到来看成是“入侵者”。在中国，面对这种政治色彩浓厚的斗争，中国统治者康熙皇帝开始却并没有很警惕得做出回应，相反他强调中国礼仪的社会意义，希望平息礼仪之争，是在遭到了教皇的置之不理的结果后，才下令禁教。<sup>⑧</sup>且中国的“禁教”措施仅限于对传教士在华宗教活动的限制，但是并没有像日本那样严禁天主教，甚至是为了文化的纯洁性迫害天主教徒。直到1805年，嘉庆皇帝翻阅《教要序论》时，才觉得西教不得不防，“与其日后酿成巨案，莫若先事予为之防。”<sup>⑨</sup>

日本统治者则要求全国范围内严禁新教，铲除教会，对教会的迫害还扩大到了一般教徒身上。“从1619年到1635年，被处刑的日本教徒为数约达28万人；1622年屠杀外籍及日本教士后，驱逐葡萄牙人出境。”<sup>⑩</sup>日本统治者为加强思想统治，还在1787年（天明七年）至1793年（宽政五年），对西洋学的兴起实行了“宽政异学之禁”。除朱子学外，将其他学派称为“异学”，维护朱子学世界观。<sup>⑪</sup>可以看出，中国统治者面对礼仪之争，起初有着“让所有在华传教士忠于自己，脱离与罗马梵蒂冈的联系。”<sup>⑫</sup>的心态，这与长期以来中国的“西洋之用”思想有关。整体而言，中国的回应较日本而言，更为温和。

其三，日本以“兰学”为代表的西学日益兴盛

日本尽管在18世纪20年代才官方宣布解禁与宗教无关的汉译书籍“在江户时代，与输入汉译西洋学术书籍的同时，渐渐洋书，最初是荷兰文书籍也得以舶载输入，为洋学研究的发达做出了贡献。”<sup>⑬</sup>实际上，对于书籍的输入，有关医药、外科、航海等学科书籍是放行的。因此即使是在更为彻底的“禁教”锁国中，德川幕府也不像清朝中期统治者那样闭塞。<sup>⑭</sup>文化交流中，取缔天主教，严格限制外国图书进口，日本学习兰学始于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时期，并进一步促进了兰学研究。

日本兰学的兴起作为禁教体制下的“透气口”,可以看出中日两国西学上的不同。1744年《解体新书》出版,标志了兰学时代的开启,这也被认为是日本科学近代化的起点。兰学发展到天文学、地理学、理化学等等。通过“兰学”日本人不断接触和了解到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兰学”并非“荷兰之学”,很多科学文化来自德意志、法国、英国……库尔姆斯和海因斯著作的兰译本到达日本学者手中的速度比中国文化到达日本的还要快。“到了十八世纪中叶,日本列岛已不知不觉地,慢慢地进入了东西世界文化共时性的圈内。”<sup>⑤</sup>“地球为一大球,万国分布其上。”<sup>⑥</sup>地理测绘学的发展,也使日本对世界和自身所处的东亚国际秩序有了更好的了解,日本社会中出现了用地理上学新知识来攻击中国文明中心说。<sup>⑦</sup>

## (二)中日在对外贸易政策上的回应

两国对西方国家贸易及其背后的政治影响感受相同。中国在“礼仪之争”背景下,其对外商贸交涉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马嘎尔尼访华。中英两国的第一次政府间交往,为中国历史上“国际通聘”<sup>⑧</sup>的开始。马嘎尔尼的要求主要有四点:在北京常驻使节;增加通商口岸;在中国舟山群岛划出一地作为居留地归英商使用;减免收税。<sup>⑨</sup>但在清朝看来,这并不是正常“来贡”提出的要求。尽管不少学者评论此次事件中,中国统治者以天朝自居,错过了与西方国家间自由贸易,与西方沟通的机会。其实,清廷对英使的回应正体现了清朝统治者感受到了西方国家在经济层面上的扩张中,将世界纳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潜在威胁。尤其是体现在英国的通商政策中,“划地”给英国商人居住,在中国通商本就是对清朝国内统治的一种侵犯,统治者也觉察到了其对清朝国内社会带来的潜在冲击,因此乾隆对英王的请求全部拒绝。

但对日本来说,对外贸易政策在外显的层次上,体现了对外接触背后重要的经济收益;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也与传教密不可分。如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旧教国家,两国在传教的过程中,均带有殖民扩张的目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注重“商教一体”,商贸作为传教的手段和经费来源,吸引日本的主要是军需品和商贸利益,日本最初以获取商业利益为主——当统治者意识到对外贸易的发展和武器的进步尤其是平等思想会动摇他们的统治时,便在“礼仪之争”并未开始就启动了锁国禁教政策。

就财政收入而言,中日之间的贸易也十分繁荣,中国商人在长崎也受到欢迎和保护。<sup>⑩</sup>日本国内对中国商品如生丝、丝织品以及附件的砂糖等有强烈的依赖,同时也有对财政收入的需求。“如1611年到1646年约有1100艘“唐船”赴日。”<sup>⑪</sup>但是在1685年开始对清商船进行限制,特别是1715年颁布商法“正德新例”后,中日贸易下降。锁国之初只是为了财政收入的需要而鼓励清商,但是之后就限制。1641年-1671年锁国之初,日本为了财政收入的需要,日荷贸易虽然不像从前一般自由,但是并没有萎缩,但是持续不久,由于便于管辖长崎,开始限制清商并走向制度化,原因在于日本的重要出口物资铜产量减少。

从对稳定国内统治的角度看,在日本的幕藩体制下,将军对大名的统治在经济上的直接优势,因此大名通过商贸获得财富则会威胁幕府的统治,伴随着基督教带来的意识形态上的离心力。尤其是1637年的岛原起义,是带有天主教性质的农民起义,此时幕府的禁教原因有传教者偷渡、天主教结党叛乱、传教士与信徒间私传物件三条。<sup>⑫</sup>

而之所以选择与荷兰人和中国保持商贸关系,原因在于荷兰作为新教国家,并没有使日本感受到传播天主教的威胁。同时在岛原起义时,荷兰人还与德川幕府采取合作协助幕府镇压起义,更让日本人笃信他们完全是为了通商而来;<sup>⑬</sup>中国作为传统东亚秩序中朝贡贸易的中心国家,尽管日本对其存在离心力,但是主动加入朝贡体系还是可以获利。

由此可见,日本对贸易的控制,则更多的是以现实的国家利益为中心。而中国作为以礼治秩序维护东亚国际秩序的中心国家,在贸易上也属于朝贡体系的中心。其对于外国的对中贸易持有较强的“贡使”意识,因此会与马嘎尔尼在“跪拜”的礼仪上产生争论,同时中国面对西方势力在经济层面上对东亚体系带来的冲击也有了很敏感及时的排斥,具有维护体系的主观意识。

### (三)中日对外部威胁的认知与回应

中国的危机意识产生的较日本晚。从马嘎尔尼访华事件看,英国政府来到北京,要求清朝开放商埠。尽管“跪拜”礼仪争论只是事件中的插曲,但是在清廷的认识中,“此等外夷输诚慕化,航海而来,岂转虞有他意。”<sup>③</sup>乾隆看来,“至商俗等设计勾引,密约商串,私来潜往、贸易交通等事,最为可恶”。<sup>④</sup>中国的警觉不在于西方的军事入侵,而是在社会层面担心中国百姓与外国人接触导致“中外勾结”。但是整体而言,此时并没有引起清政府的警觉,特别是在1802年和1808年,英国分别派兵船前往广州和东南骚扰,试探中国的海防能力,并没有引起中国的警觉。

日本尽管限制国民出海远洋,其对外部世界的信息搜集没有停止。日本禁教锁国政策目的在于防止外部势力威胁国内统一和稳定,但是并没有闭塞对外部的了解。《荷兰风说书》,《唐风说书》等等,向日本官方提供外部世界的情况。他们通过中国的商船还有荷兰人了解西方。

兰学草创者新井白石在当时就了解到了日本在国际上孤立的事实,对日本的国防十分不安,特别是他对荷兰也有很强的危机感,认为“把经商一律看成是对国家有利,是一个可怕的国家。”<sup>⑤</sup>这与其作为兰学创始人的身份密切相关,全力研究兰学,是对西方危机认识的深刻体现。欧洲人认为只有火器才是战争中最重要武力,这与依赖策略的中国人和沉湎自身大和之魂的日本人不同。<sup>⑥</sup>林子平著作《海国兵谈》中,强烈主张“作为没有陆上邻国的日本,必须相应的海防,海防是日本民族的任务。”<sup>⑦</sup>特别是对武器危机意识的萌生在1765年写的《富国建议》中就被提及:“日本与朝鲜、琉球、虾夷三国邻接,万一由此三国发生不意之变,金戈铁马蜂拥而至。日本将迅即崩坏,彼时设法操练天下之兵马,自为力所不逮,至少为国之大计,现当操练人马耳。”<sup>⑧</sup>

特别是在1840年,中国发生鸦片战争并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日本对于中国的失败有着更敏感的认知,并且用充足的时间调整对外政策,近代中国的遭遇向日本国民发出警报,从闭关自守中苏醒。幕府于1842年8月下令撤销“异国船驱逐令”,日本体现出了灵活性。在12年后与美国签订《神奈川条约》的时候,避免了像中国那样被割地赔款的境遇。同时日本试图通过条约的形式,加入西方国际关系体系。

## 四、对“冲击 - 反应”解释框架新的尝试

从东亚视角看,实际上“冲击 - 反应”的框架中的中国、日本乃至东亚各国都并非静止的,需要对原有的“冲击 - 反应”模式进行调整,关注东亚国际体系的同时还要关注不同国家间的互动及对自身在东亚国际秩序中的定位认知。西方势力的冲击对于传统东亚秩序的核心国家中国、边缘国家日本感受到的“冲击”是不同的。赵汀阳成对中国的“世界观”进行分析,并提出“天下帝国是一种制度性的存在,在制度上是共享的,但是各个地方在经济、政治

和文化上是独立的。”<sup>④</sup> 基于此,下文将从社会、国家、体系的分析视角对中日两国产生不同回应的原因进行讨论。

### (一) 社会思想基础

尽管早期传教士成功深入中国统治阶级高层,特别是在天文学为皇帝服务。<sup>⑤</sup> 但是中国社会对西学存在深层的排斥,如康熙初年间的历法之争中,杨光先就说过:“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就文化理论来看,西学、武器等科技属于外显文化,信仰、习俗等数据内隐文化。本就较难吸收与接收。中国对西方传教的反对,将作为传教手段之一的科学知识这一外显文化一并反对。<sup>⑥</sup> 因此,中国社会对西学的看法多为“等闲视之”,好奇多于实用,且容易中断失传。

追根溯源,日本“自古便形成了崇尚和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传统”,<sup>⑦</sup> 学习中国。因此“作为西洋学学问的市民权的获得及西洋学的发展,日本都远比中国要快。”<sup>⑧</sup> 在受到“冲击”与西方势力威胁的现实面前,日本更容易主动接受“西学”,特别是对于武器等安全领域的“器”,可以说在此形成了雏形。<sup>⑨</sup> 特别是江户时代中期,日本的西学进一步兴盛,这也使得日本在被迫开国的时候,因为有着近一百年的兰学奠定了向西方学习的文化基础,日本在明治维新中向西方学习更彻底也更成功。

同时,西方也对日本民众产生了巨大影响。民族意识具有可塑造型,日本的阶级并没有系统完整的形成中国儒家礼制的观念,因此具有可塑性。尤其是伴随着兰学的发展,“18世纪末期,日本比任何非西方国家都更了解欧洲文明……正因为其不利的地理位置和幕府的锁国政策,使日本很好地吸收了西方文明。”<sup>⑩</sup> 日本向外学习的好奇心使日本的中心主义思想逐渐孕育,社会内部对外部环境危险的感知发生敏感的变化——其中,代表人物就是本多利明。<sup>⑪</sup> 在他的著作《经世秘籍》中,认为日本最要紧的四件事是:火药、金属、海运、殖民。<sup>⑫</sup> 尤其是在中国鸦片战争爆发后,日本对西方的学习更加主动,“日本人对夜郎自大的‘华夷’思想产生怀疑……首先是在科学技术这一角冲垮了锁国制度与‘华夷’思想的壁垒。”<sup>⑬</sup> 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日本相对于东亚核心的边缘地理位置,使岛国日本拥有了吸收融汇大陆文明的热情。

### (二) 国家政治制度

清代中国皇权可以对国家实行有效的中央集权统治。特别是在被迫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中国由于制度上没有进行政治变革,西方的思想和政治制度与封建统治本质上排斥,且学习停留在器械层面上,即使是戊戌变法和洋务运动,也没有认识到制度变革的重要性,向西方的学习是片面的。而且在打开国门的学习之前,中国文化处于世界文明前列,使中国知识分子有较强的优越感,也极大影响了吸收外来文化的视野。

而日本在幕府体制下的封建秩序中,天皇尽管保持影响力,但是各藩国一方面在政治上服从幕府,另一方面又具有很强的独立性。由于幕府对藩国没有经济上的关照,因此大名藩主对土地具有极强的欲望,以各种途径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因此,将对外商品经济加以限制变成封建统治阶级的“御用商业”,客观上可以直接削弱大名的实力;也为避免国内反抗力量(如岛原农民起义以宗教作为掩护动摇幕府的封建统治)保持幕府政治上的稳定和统一。外加日本没有统一的王权,因此外来的意识形态具有更好的生存空间;同时统一国家的,因此对天主教禁绝相当彻底。

由此可看,日本的锁国是为了从思想上加强意识形态的统治,经济上削弱地方大名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从耶稣会和葡萄牙人手中获得对外贸易的主动权。因此“锁国就是幕府垄断地掌握了物质流通与信息流通的体制。”<sup>⑤</sup>

### (三)东亚国际秩序

东亚传统秩序是由中国和周边国家及地区构成,中国长期形成“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sup>⑥</sup>的秩序思维。因此,马嘎尔尼的通商请求是对统治者心目中“华夷模式”的偏离。中国运用“礼”维护秩序的稳定,当外来的权力冲击时,秩序的维护者会更处于维护秩序本身的角度。同样需要注意到,中国的“天下”观源于“家-国-天下”框架,因此作为传统东亚秩序的核心,中国更多是以文化与“礼”为核心,而不是统治性的帝国。<sup>⑦</sup>

同样,对“华夷”的正确意识是产生危机意识的前提,鸦片战争以来,林则徐将禁烟期间搜集到的有关外国资料交托给魏源,嘱咐魏源编撰《海国图志》。1840年-1860年这20年间出现多部介绍“夷情的著作”,著作多限于介绍性质,但是作者动机还是体现了对危机意识的萌生与发展。

而日本在东亚是传统东亚秩序的周边国家,但是一直对体系存在张力,且居于边缘地位。日本对华夷的定为有所不同,“以日本为中心把邻国划分成了不同的层次,这是日本型的‘华夷秩序’”。<sup>⑧</sup>特别是幕府时期,日本开始出现“大国文化心态”,随着兰学的发展,日本对西方的文化价值有了更多的认识,进一步产生割裂。其中,林子平《海国兵谈》打破了对中国的依赖心理,认为有必要降低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地位。<sup>⑨</sup>在明治维新时期,天皇权威的树立也进一步加强了日本对东亚国际秩序的离心力。

## 五、结 语

通过“礼仪之争”背景下中日两国不同回应的比较,可以发现两国在社会思想基础、国内政治制度上有着区别。特别是在东亚传统“华夷秩序”中,两国实际上始终是把自已放在东亚国际秩序中,并且对自身的定为认知不同,因此才在西方对体系的冲击下做出不同的回应。

在传统东亚国际秩序中,中国基于自身国体与对周边施加影响力而成为核心,中国作为中心国家是依靠实力和先进文化(儒),也一直试图维持着这一秩序。传统东亚国际秩序具体而言,东亚体系是中国与邻国一种非正式的平等关系,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周边国家与中国采取通商和文化交流,但是并没有实际上的政治从属关系和义务。<sup>⑩</sup>因此,在西方的外来权力冲击着东亚传统秩序的过程中,中国曾经企图将西方纳入自己的轨道,与西方的国际关系体系有着相同的目标。

而日本却在思想、外部威胁的到来与试探中很快就感到了对外来压迫做出反应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中日两国在国体和国家实力上的客观差距,使其面对西方带来的“冲击”,日本的回应无论是在“禁教”还是驱逐外国人的行为上,都比中国体现的更加敏感和激进的反应。

中国运用“礼”维护秩序的稳定,当外来的权力带来冲击时,秩序的维护者会更站在维护秩序本身的角度进行回应。而日本对西方势力的到来,无论是出于对枪炮武器和商贸利益的需求与西方人接触,还是出于国内统一的目标而实施禁教锁国,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仅停留在国家层面。

日本所产生的“小中华”思想,实际上一直是以中国作为坐标。西方文明的到来,使日本

在对西方的敏感回应与学习过程中,加强了对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割裂”,此时的日本在与先进的欧洲比较时,无意中也在与被视为“落后”的中国进行着比较,从中获得危机意识与满足。<sup>⑤</sup>使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有足够的实力和信心向中国发起挑战,企图取而代之其“中华”的地位。

#### 注 释:

①中国礼仪之争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1610—1628年,利玛窦死后,其创立的“利玛窦规则”遭到质疑,耶稣会长龙华民认为祭祖、敬孔为异端因此应当被禁止,由此引发耶稣会内部讨论,影响范围有限。(二)1632—1692年,托钵修会认为中国传统祭祀利益需要禁止,并由此与耶稣会展开斗争,结果教皇发布通谕禁止中国礼仪;由此围绕禁谕的执行,两派又展开争论。(三)法国加入争夺海外布道势力中后,礼仪之争,随着康熙皇帝的卷入,礼仪之争达到高潮。结果面对教皇严厉的敕令,康熙禁止天主教,并在嘉乐来华后,清政府以更为严厉的禁教政策代替了原来的辩论。(四)1722年,雍正皇帝继续奉行禁教的政策,礼仪之争暴露出了罗马教廷与殖民主义世俗国家争夺东方利益的矛盾。参见:林金水:《明清之际士大夫与中西礼仪之争》,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20页—38页。

②伏尔泰总结性地认为,“中国礼仪之争”,其实只是欧洲内部宗教争论的衍生。参见: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4页。

③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

④吴莉苇:《文化争议后的权力交锋——“礼仪之争”中的宗教修会冲突》,载《世界历史》,2004年3月,第91—100页。

⑤赵德宇:《论16/17世纪日本天主教的荣衰》,载《南开学报》,1999年第6期,第116—124页。

⑥毕敬:《“礼仪之争”背后的中西利益之争》,载《哈尔滨学院学报》,2016年4月,第37卷,第4期。

⑦Deng, Frai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转引自: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⑧【美】:费正清著,张沛译:《中国:传统与变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294—359页。

⑨宋念申:《发现东亚》,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年7月版,第83页。

⑩但兴悟:《从马嘎尔尼使华看国际体系之争》,载《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2期,第1—27页。

⑪【美】:何伟亚著,邓常春译:《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⑫葛兆光:《19世纪初叶面对西洋宗教的朝鲜、日本与中国——以“黄嗣永帛书”为中心》,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12—20页。

⑬禁书政策是禁教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实际上,禁书政策只是对于基督教有关的汉译西书禁止。

⑭表格由笔者整理得,参考资料来源:【日】唐纳德·金著,孙建军译,《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李晓燕:《日本锁国新论》,载《贵州文史丛刊》,2010年,第1期,第31—36页。

⑮《书札》,转引自林金水:《明清之际士大夫与中西礼仪之争》,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20页—38页。

⑯葛兆光:《19世纪初叶面对西洋宗教的朝鲜、日本与中国——以“黄嗣永帛书”为中心》,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12—20页。

⑰【日】:箭内健次:《锁国与日本和国际交流》,吉川弘文馆,1998年版,第251页。参见:李晓燕:《日本锁国新论》,载《贵州文史丛刊》,2010年,第1期,第31—36页。

⑱林金水:《明清之际士大夫与中西礼仪之争》,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18—29页。

⑲《清实录》(嘉庆朝)卷一四二,第951—952页,参见:葛兆光:《19世纪初叶面对西洋宗教的朝鲜、日本与中国——以“黄嗣永帛书”为中心》,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12—20页。

⑳赵曼婷:《日本德川幕府的禁教与锁国》,载《中国校外教育》下旬刊,2009年2月,第45页。

- ②①沈世培:《中日近代化过程中文化比较问题探讨》,载《日本学刊》,2017年第3期,第129-159页。
- ②②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58页。
- ②③【日】箭内健次编:《锁国日本和国际交流》(上),第285页。参见:冯玮:《重新认识“锁国”政策对日本吸收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载《世界历史》,1992年第5期。
- ②④吕万和:《西学和明治维新》,载永井道雄、M·乌鲁带阿编:《明治维新》,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版,第193页。参见:冯玮:《重新认识“锁国”政策对日本吸收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载《世界历史》,1992年第5期。
- ②⑤【日】江上波夫编:《民族的世界史(2)日本民族和日本文化》,第456页。参见:冯玮:《重新认识“锁国”政策对日本吸收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载《世界历史》,1992年第5期。
- ②⑥【日】沼田次郎、松村明:《日本思想大系 64 洋学 上》,东京:岩波书店,1976年版,第230页。参见:范业红:《关于日本江户时期思想家‘华夷之辨’思想演变的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3月,第80-85页。
- ②⑦【日】唐纳德·金著,孙建军译,《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8页。
- ②⑧见“英使马嘎尔尼来聘案”按语,载故宫博物院馆藏:《掌故丛编》,1930年版,第1辑第1页。参见:张之毅:《英国马嘎尔尼使华与乾隆对策新探》,载《外交学院学报》,1988年4月,第43-45页。
- ②⑨但兴悟:《从马嘎尔尼使华看国际体系之争》,载《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2期,第1-27页。
- ③⑩张荫桐,《凯姆贝尔论荷兰对日贸易》,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18页。参见:李晓燕:《日本锁国新论》,载《贵州文史丛刊》,2010年,第1期,第31-36页。
- ③⑪湛贵成:《闭关锁国时期日本对清商的政策》,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3月第2期,第139-141页。
- ③⑫张中载,王逢振,赵国兴:《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参见:周韬:《日本江户时代“禁教”与“锁国”体制的再探讨》,载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9年2月,第9卷第1期。
- ③⑬【日】唐纳德·金著,孙建军译,《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版,第2页。
- ③⑭《谕军机大臣著沿海督抚妥善办理英贡使事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汇编》,第28页。参见:但兴悟:《从马嘎尔尼使华看国际体系之争》,载《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2期,第1-27页。
- ③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汇编》,第28页。参见:但兴悟:《从马嘎尔尼使华看国际体系之争》,载《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2期,第1-27页。
- ③⑯【日】杉本勳:《日本科学史》,郑彭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65页。
- ③⑰【日】唐纳德·金著,孙建军译,《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4页。
- ③⑱【日】唐纳德·金著,孙建军译,《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 ③⑲【日】《日本思想大系·38》,东京:岩波书店,1976年,第218页。转引自:陈景彦:《西风东渐与中日知识分子的回应》,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150-168页。
- ④⑰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 ④⑱事实上,皇帝更多是对天文异象感兴趣而不是本身天体运动的规律等相关知识。参见:Udias, Agustin (1994). "Jesuit Astronomers in Beijing 1601 - 1805" (<http://adsabs.harvard.edu/full/1994QJRAS..35..463U>).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 35: 463. Bibcode:1994QJRAS..35..463U (<http://adsabs.harvard.edu/abs/1994QJRAS..35..463U>). 访问时间:2018年12月28日。
- ④⑲杨光先:《不得已》下卷,《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第3册,台北,台湾学生数据,1986年影印本,第1248页。参见:陈景彦:《西风东渐与中日知识分子的回应》,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150-168页。
- ④⑳徐静波,陈建安,王少普主编:《中日文化与政治经济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页。
- ④㉑【日】依田熹家著,雷慧英译:《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第124-126页。
- ④㉒王家骅:《幕末日本人西洋观的变迁》,中国日本史研究会:《日本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1982年,第272-273页。

④【日】唐纳德·金著,孙建军译,《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4页。

④在本多生活的年代,维系人们经济、社会生活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旷日持久的稳定和锁国。【日】唐纳德·金著,孙建军译,《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4页。

④【日】唐纳德·金著,孙建军译,《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85页。

④王家骅:《幕末日本人西洋观的变迁》,中国日本史研究会:《日本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272-273页。

⑤【日】依田熹家著,卞立强译:《近代日本与中国:日本的现代化——与中国的比较》,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

⑤《明太祖实录》卷二六,参见:沈世培:《中日近代化过程中文化比较问题探讨》,载《日本学刊》,2017年第3期,第129-159页。

⑤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⑤安善花:《中朝日近代世界秩序观的形成与外交取向比较研究》,载《日本学论坛》,2006年第1期。

⑤【日】唐纳德·金著,孙建军译,《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3页。

⑤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3页。参见:夏立平:《近代欧洲国际体系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比较研究》,载《国际观察》,2006年第3期,第17-24页。

⑤【日】沟口雄三著,王瑞根译:《中国的冲击》,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9页。

(孙钰欣: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本科生 责任编辑:王广涛)

---

(上接第43页)

注 释:

①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

②《日本新版防卫大纲架空“专守防卫”理念》,新华每日电讯3版,2018年12月15日。

③日米「インド太平洋戦略」表明へ 中国の権益拡大を牽制:朝日新聞,小野甲太郎,2017年11月1日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KC15CN3KC1UTFK00X.html>

④日本内閣府、第3期海洋基本計画、平成30年5月、<https://www8.cao.go.jp/ocean/policies/plan/plan03/pdf/plan03.pdf>

(复旦大学中日关系(年度)战略报告书课题组)

# 中心大事记

## 2019 年上半年

- 1月18日 胡令远出席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中日关系发展与东亚秩序的调整”研讨会,并做基调报告。
- 2月27日 中心举办《中日关系2018:回归常轨 蹒跚前行》报告书发布会。
- 2月28日 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校长资深顾问、《三田文学》编集长关根谦先生访问日本研究中心,商讨两校合作事宜。
- 3月1日 高兰结束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学任务回国工作。
- 3月7日 关西大学国际教育中心副主任古川智树教授、国际部西垣敦子访问日本研究中心,商谈进一步合作事宜。
- 3月7日 复旦大学校友、日本国会参议员候选人丹羽大先生在日本研究中心作题为“平成时代之后的日本政局与中日关系走向”演讲。
- 3月13—20日 胡令远访问日本山口大学,做“中美贸易摩擦与中日关系”学术演讲。
- 3月15日 徐静波在山东大学外语学院作题为“佛教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流变”的学术讲座。
- 3月16日 中心与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联合主办第13届“博士生日本研究论坛2019”,主题为“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愿景与挑战”。来自三校的20余位博士生参加论坛,开展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学术交流。
- 3月26日 徐静波在浙江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作题为“东西文化交流中的日本食文化”的学术讲座。
- 4月12日 徐静波在西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作题为“和食的往事今生”学术讲座。
- 4月15日 徐静波为复旦大学学生学术社团“北辰社”作题为“和食中的日本文化”的学术讲座。
- 4月22日 中心举办复旦大学·三井物产系列讲座“日企在华经营活动中的法律保障实践与课题”,由上海市成功律师事务所主任、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留日分会会长臧广陵律师主讲。
- 4月23日 徐静波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团学联第112期“国风讲座”作题为“五四:历史现场与东亚视阈”的学术讲座。
- 4月25日 徐静波在湖南大学外语学院作题为“东亚文化圈的实像与虚像”的学术讲座。
- 4月27日 高兰出席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的“第六届海洋论坛研讨会”,会议发言题目:“中日海上治理的问题与前景”。

- 5月6日 日本茶道里千家事务局局长、平安女学院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所长关根秀治教授一行三人来访,徐静波接待,并与其就今后的文化学术合作进行了会谈。
- 5月9日 西安外国语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陈曦副教授、王辉副教授一行来访中心。
- 5月12日 胡令远、贺平、王广涛赴北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论坛“全球变局下的中日关系:务实合作与前景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胡令远做《中日关系:内在逻辑与多边主义》大会主题报告。
- 5月14—17日 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田村晓彦主讲《国际通商政策与中日经济合作》系列讲座。此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年度项目,共四讲,复旦师生200余人次参加讲座。
- 5月17日 东京大学教授、日本国驻上海前总领事小原雅博访问中心。
- 5月17日 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林泉忠教授访问中心。
- 5月17—18日 贺平参加哈佛上海中心区域研讨会并做发言。
- 5月19—25日 王广涛赴日本东京大学、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上智大学等进行调研访问。
- 5月24日 中心举办复旦大学·三井物产系列讲座“中日经贸合作与中美贸易摩擦”,著名旅日媒体人、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先生主讲。
- 5月25日 胡令远、高兰、贺平出席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举办的“2019中日关系研讨会”,分别作《调整中的中日美关系:功能与理念》、《日本令和时代外交政策的历史基因特征及展望》、《日本自由贸易战略的新动向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主题报告。
- 5月27日 中心举办校庆学术报告会,主题为“2019:新时代中日关系行稳致远的关键之年”。
- 6月11日 中心举办复旦大学·三井物产高端讲座“全球治理与多边主义——中国的时代担当和挑战”,由杨洁勉教授主讲。杨洁勉教授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原院长,担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政协上海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对外友好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等职。
- 6月14日 日本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河邑忠昭先生访问中心。
- 6月14—16日 中心与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上海市日本学会共同举办“中国日本史学会2019年年会暨建国70年来日本史研究成果与新时代课题学术研讨会”。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武寅做基调演讲、驻日大使程永华夫人汪琬参赞做《回顾与展望:中日关系能否进入新时代》的特别纪念演讲。来自国内近百家高校及科研单位的130余名代表出席了本次年会。胡令远、徐静波、高兰分别在开幕式和分科会做发言。 (王广涛)